



# 天主教史

卷二

穆启蒙编著

生命意义出版社印行

# 天主教史

卷二

穆启蒙 编著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I

*by Rev. Joseph Motte, S.J*  
*Translated by Kuangchi Press*

光启出版社译  
生命意义出版社印行

# 天主教史卷二

## 目 录

### 第三期：近代教会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	1
第十二章	誓反(或抗议)教的改教运动·····	17
壹	马丁路得在德国的改教运动·····	17
贰	瑞士的改教 慈运理 加尔文 加尔文主义 ·····	28
叁	英国的改教·····	33
第十三章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革新·····	46
壹	自发的改革·····	46
贰	特利腾会议·····	52
叁	天主教在特利腾会议以后的革新·····	60
肆	特利腾会议后的教会·····	76
第十四章	文艺复兴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	83
壹	新地的寻获与保教权·····	83
贰	美洲和菲律宾的传教·····	85
叁	非洲开教·····	90
肆	圣方济·沙勿略·····	91
伍	圣方济·沙勿略以后日本传教的情形·····	100
陆	利玛窦在中国·····	103
第十五章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繁荣·····	117
壹	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的修会·····	118
贰	十七世纪的教友生活·····	125

叁	智识生活·····	129
<b>第十六章</b>	<b>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宗教纷扰·····</b>	<b>136</b>
壹	杨森异端·····	136
贰	法兰西主义·····	141
叁	寂静运动·····	143
肆	誓反教的问题·····	145
<b>第十七章</b>	<b>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b>	<b>151</b>
壹	十八世纪无信仰的气氛日增·····	152
贰	教宗权力的低落·····	159
叁	十八世纪的教友生活·····	165
<b>第十八章</b>	<b>十七及十八两世纪的传教情形·····</b>	<b>170</b>
壹	传信部的建立·····	170
贰	法国第一批传教士·····	171
叁	辣丁美洲的传教情形·····	174
肆	印度的传教情形·····	177
伍	陆德神父与代牧的创立·····	179
<b>第十九章</b>	<b>利玛窦逝世后中国的传教情形·····</b>	<b>186</b>
壹	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	186
贰	满清初年·····	198
叁	礼仪之争·····	207
肆	十八世纪中国传教的情形——一个教难的世纪 ·····	215
<b>结    论</b>	·····	<b>223</b>

## 插图目录

一、马丁路得象	19
二、亨利八世象	35
三、多玛茂禄象	37
四、圣方济各·沙勿略及其出生地	92
五、上川岛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纪念小堂	97
六、利马窦象	105
七、利马窦在中国之墓	111
八、利马窦与徐光启	191
九、汤若望象	200

# 第三期：近代教会

## 概 观

历史由中古而渐入近代，世界也呈现了新面目。教宗在教会内仍保持着无上权威，但在中古世纪彼此紧密联系的政教两权，分立之势已逐渐明朗化；教育已非神职人员的专利品；自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和知识业已普及民众。教会也不能再靠各国政府保卫，应赖真理的力量自行卫护；此后教会所面临的泰半都是思想的斗争了。

信仰的一致，本是中古奉教国家的基础，也因誓反教（或称抗议教）的分离而惨遭破坏。教会赖教宗、修会，特别是特利腾大公会议的努力，也开始自行整肃革新。因新地的寻获，传教事业的活动，也向新的领域展开。

##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

自十五世纪中叶，为教会和西方世界，都展开了一个新时代；最重要而且具刺激性的一件事情，便是所谓「文艺复兴」( Renaissance )；原因是欧洲人民，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杰作，由更深的接触和研究产生了惊叹羡慕，于是又因发见了许多以前所不认识的国家 and 民族，便对古典文艺发生了新兴趣。这种文艺复兴的运动开始于意大利，至十五世纪中叶已达到了最高峰；又逐渐推展至西欧各国。

## 人文主义 (Humanism)

中古世纪最突出的典型人物是神学家，因为天主是当时一切研究的中心；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则是「人文学者」，因为研究的兴趣已转移到「人」的本身了。神学家更注意思想而不注意文体；他们首先所注意的是思想的正确和表现的清晰。人文学者则特别重视文体的美妙文雅，因此视中古时代的作品为粗俗，反而羡慕古代的作品了。中古时代的人，对古代的学者并非茫然不知(辣丁学者的作品所以能保存到今日，乃是有赖隐修士们的抄写之功)，不过因为厌恶其中异教的思想而不加研读而已。古代的著作所以引起人文学者们兴趣的，是文体的优美，语句的和谐；因此视为无可比拟的模范。能写优美的辣丁文被认为是文人的标志，也是成功的捷径；谁能以辣丁文的演讲颂扬王侯的光荣，便能名利兼收。

于是人们开始发掘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手抄本；努力辨认古代作者的正确原文，予以印刷传扬，批评辩论，设法把其中有历史根据的叙述同说部分开。人们也尽力搜寻埋藏地下的建筑物和碑碣等；当人发现一件古代雕刻的杰作时，说不上是多么兴奋。为实行仿古，人们便努力地观察自然，务使维妙维肖地表现在美术上。对于思想，人也非常爱好；于是兴建了许多研究院，为使有教育的人在其中辩论研讨文学或哲学。

### 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

不可讳言的是过于兴奋地钻研异教的作品，为教友的精神不无危险。

这种危险究竟在那里？是在恢复古典文学吗？不是，教父们也曾研究古典文学，并且自文艺复兴以至今日，西

方民族常以古典文学作为青年文学修养的基础。是因崇尚形式吗？不是，无形式便谈不到艺术。是因注意观察自然吗？不是，观察研究自然是一切科学艺术进步的条件。那么是因它唤起了批评的精神吗？绝对不是，因为圣教会决不怕人寻求真理。

那么它潜藏的毒素究竟是什么呢？不在乎恢复古代的形式，乃在恢复异教的精神，在过分褒扬自然甚至肉体的美，和肉体的一切贪欲；也在它无限制地揄扬人的理智，打破一切拘束，自我陶醉。

在人文学者中，知道防范异教的传染，而实行所谓「基督教式的复兴」者，固然也不乏人；但大多数的人却染上了异教的精神。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所特别显著的事实；由于爱好古典，道德也随之而低落。有一种完全相反的人生观，与教友的人生观相对立：人已不象是完全系属于其他的了，先系属于天主，然后系属于他所属的社会团体；人已视为是自己的目的，应当在世上寻求个人的最大幸福，摆脱天主和人类的一切系属，抬高自己的身价，满足自己的贪欲，不但是荣耀的贪欲，甚至最卑鄙的贪欲：这就是人文学者们的理想。

许多在意大利各城建立了他们领域的王侯们，我们知道他们是实现了这种理想。这些文学和艺术的显赫保卫者，决心享尽人生；只要能表现他们的伟大，便可不择手段，一切方法，甚至谎言、欺诈、毒药、残杀，都认为是好的。❶

面对着这种情势，教会应持什么态度呢？真是非常困难。她对这吸引人心复古的强烈运动该表示反对吗？教宗们没有这种企图；他们深知在圣教初兴时，圣巴西路，圣

若望金口，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等教父们，是在研读异教学者的作品中陶冶出来的，但仍不失为教会的大圣，并且因此还成了优美的作家，以他们的才学对教会立了很大的功绩。所以教会并未反对复兴运动，反而由接受而进于鼓励，并且加以提倡领导。

### 提倡人文主义的教宗：尼各老五世

公元一四四七年尼各老五世(Nicholas V)被选为教宗，他不但热心且是一位学者，他能使爱好文学的心与教会的思想相配合；因此他的膺选极受人文学者们的欢迎。新教宗对各种学问：如神学、法律、政治、历史、地理、数学等都很开明；他是一位通才也是从事文艺复兴的人们所爱戴的典型人物。

他在位时期的大理想，就是要使罗马成为世界的学术首都，文艺复兴的中心，整个文化的母亲。这并不表示他有无羁的野心，因为他看的更高更远：他所着眼的是文学艺术能给教会确保无比的声望，而这个声望能使她对人灵发生更深的影晌。因此他便着手修缮并美化罗马城；各种技术人员，如建筑师，雕刻家，绘画家，以及刺绣、金银等工匠，都纷纷自意大利各处和德、法、班等国源源而来，从事装修圣堂和宫殿。其中最著名的是道明会士安日里哥(Fra Giovanni Angelico 意即天使)，他这个徽号的来由，是因他的绘画都呈现一种超然愉快的光辉。罗马真成了艺术荟萃的中心之一。

罗马也成了知识运动的中心之一。尼各老五世不但把艺术家，也把文人吸引了去。为汇集和保存古代作品，他建造了梵蒂冈图书馆。自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土耳其人手中后，大批的希腊人迁来意大利，并携带珍贵的手抄本俱

来；尼各老购买了一大批，其他也命人誊抄了。从此梵蒂冈图书馆可说变成了西方思想的宝库，将古代、教父和中古时代的各种作品，都搜罗收藏其中，供世界文人学者前来研究。

当知教宗尼各老五世虽对优秀的人文学者优礼有加，但他们当中有些因品行的不良，实在有忝于他的礼遇；不过他虽提倡学问艺术，却能阻止文艺复兴的洪流冲激教会。他最光荣的头衔，是恢复了教会已丧失的权威，且表现了天主教的信仰能与文艺的爱好相融合。

### 土耳其的威胁

君士坦丁堡在尼各老五世作教宗时沦陷于土耳其人之手(一四五三年参阅卷一·三四二页)。教宗对此受创甚巨，二年后即谢世。他的继承人是一位西班牙人，系出玻尔日亚(Borgia)名门，取名贾理笃三世(Callixtus III 一四五五—一四五八)；他心心念念的只是组织十字军，想拯救教会于土耳其人的威胁。刚一即位，即矢志牺牲教会的一切财富以收复君士坦丁堡，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他联合奉教君长同仇敌忾，聚敛金银以装备一支舰队，为去援助最危险的地带；他为达成这些目的发挥了最大的活力；无奈奉教的君长们你猜我忌，不为所动。此时敌军却前来猛攻。穆罕默德二世将教友的最后防线贝尔格勒城(Belgrade)团团围住。这时匈牙利的英雄胡尼亚德(Joseph Hunyadi)率领一支军队，在方济各会士贾比斯坦(John Capistran)热烈鼓励之下，奋勇守卫，予土耳其人以致命的打击，大获全胜；因此拯救了奉教的欧洲，未陷于回教徒之手。

贾理笃三世于二年后去世。可惜这位教宗对家人过分

宠幸，是他生平一大污点，否则他拯救欧洲之功，要受到更大的赞扬。他有不少的子侄辈，他都滥事提拔，甚至将其中一名升为枢机，日后竟成教宗，使其家族及教会均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贾理笃三世的继位人比约二世 (Pius II) 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人文学者；但他即位后一如他的前任，立即以全力组织十字军去征讨土耳其人。他同欧洲的君长磋商、敦促、辩论，结果到处碰壁；因为他们都很怯懦自私，只顾自己的国家，和他们商业的利益。最后教宗自行组织了一支军队和一个小舰队，但同土耳其的武力相较，实在高下悬殊。但他虽年已老迈，且抱病在身，竟不顾罗马人民的劝阻，离开了罗马；他到达安科纳 (Ancona)，想在那里开始指挥十字军，不料因病势转剧，悲伤其计划未能实现而逝世；出征便这样结束了。

继任的保禄二世 (Paul II) 是一位保护文艺的教宗；但他也未放弃十字军，只因奉教君长的互相对立，致令他的美妙计划中途搁浅，未能实现。

### 罗马教廷内的腐化衰颓

土耳其的威胁耗尽了教宗们的精神，致使他们不能专心致力于教会内部的整顿，而此项整顿却极其重要。不但不能整顿改革，自西斯都四世 (Sixtus IV 一四七一——一四八四) 以来，文艺复兴的恶劣影响且渗入了教廷，使教会的中心沦于衰颓腐化。教宗西斯都四世原为方济各会总长，他的私德固属无瑕可指，但对其侄男侄女未免过分溺爱，一思想把他们致之贵显，于是不顾他们是否称职，竟教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甚至升为枢机。教宗意诺增爵八世 (Innocent VIII 一四八四——一四九二) 赋性也很懦弱，且

爱奢华，驯至神圣的教廷，秽德彰闻，墮落日深。有几位枢机，更是肆无忌惮，恶声四扬：言之令人痛心。

所幸意诺增爵八世临危时，深悔自己之失职，请求大家宽恕，并恳请枢机们遴选一位孚众望的人，继承大统。可惜他这种哀求未能生效，他们竟选了贾理笃三世的一个侄子劳得理格坡尔日亚 (Rodrigo Borgia) 继任，取名亚历山六世 (Alexander VI)，这真是教会历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朝。

亚历山六世并非没有才干，他对人对事都有长足的经验和，而且坚毅有为，是一名擅长治理的人物。可惜他在任枢机的四十年中，生活即开始糜烂，他登上教宗宝座的选票也由贿买而得，此后的生活更变本加厉，秽声四闻。他如世俗君长一样，只是想借他崇高的地位为家庭谋福利，最坏的是他助长了教会的腐败。

### 撒未纳劳图挽狂澜

在这教会历史上的阴霾时期，出现了一个拯救教会光荣的有力而且热烈的呼声，就是撒未纳劳 (Savonarola) 的呼声。他是人文运动的中心也是风俗败坏的中心佛罗伦斯 (或译翡冷翠城 Florence) 的一个道明会士；他以热情的演讲呼吁人民刻苦补赎，他自信负有天上来的使命，预言教会要遭受天谴，但随即复兴而且不久便要实现。他因演讲的成绩良好而更加胆壮，措词日益激烈，对教会的腐化分子，尤其是教宗亚历山，詈骂得更加大胆了。

在他的影响之下，这座迷醉于声色娱乐的城市，竟一变而为忏悔的城市：日逐酒色的青年变为贞洁，不解的冤仇也公然和解了，商店和钱庄也退还了不义的财物，圣堂也充满了信众；但在这位革命者的要求下也有些矫枉过正

的举动。他和翡冷翠的居民同样地兴奋，日事怪异的表演；有时在圣堂前点燃大火，教城内的贵妇们把她们的奢侈装饰品、脂粉、项炼和不端的图画等投掷火中，然后神职人员和教友围绕着火堆口唱着圣歌跳舞。

撒未纳劳被他的成功冲昏了头脑，逐渐由宗教的领域转移到政治的领域；幻想着使翡冷翠成为天主的城，再以此城为中心，把改革推及整个教会去。

尽管撒未纳劳为移风易俗而工作，亚历山六世却无动于衷，对他大胆的言词充耳不闻；但当他一心干预政治，且与教宗的政治采取鲜明对立的姿态时，亚历山便改变了态度，且命他去罗马解释他的预言。撒未纳劳拒绝前去，于是他便下令禁止他演讲。本来对这项命令撒氏理当服从；亚历山虽然私德不佳，毕竟还是教会的领袖，为此有服从的义务。撒氏缄默了一时，但以后更变本加厉，对教宗猛烈攻击。教宗在再三警告之后，终于把他开除了教籍（一四九七年）。从此许多追随他的人也抛弃了他。可是撒氏仍固执己见，并声言愿受天主的裁判：倘他经过烈火能安然无恙，他认为便是负有天上使命的证明。一位反对派的方济各会士且出而挑战，愿同他联合接受考验。但在接受考验时撒氏却犹预退缩，由此名誉扫地，声望全部坍台；以前给他喝采的反起而攻击他，他于是被捕羁押。教宗要求引渡，但被翡冷翠政府拒绝，愿自行开庭审讯。他终于被判处绞刑，死后又遭焚尸，将骨灰投掷河中。

这个非常的人物竟遭如此的下场。他的才干，他的严肃生活，和他那移风易俗的热情，都应受人尊敬；可惜过分冲动，不知节制，致遭不测。他的历史显示当时的人心是如何不安，而且容易燃起宗教革新的火焰；但也显示这

样的运动如果想由反抗罗马的权威着手，势必要走入歧途而惨遭失败。

### 一位精通政治而又好战的教宗——儒略二世

亚历山六世死后，众枢机选了一位盛德的人士继位，取名比约三世；可惜数星期后即去世。于是又选了西斯都四世的侄子继位，取名儒略二世 (Julius II)。他的个性很强，爱发号施令，不过也堪称伟大。在一个崇拜武力的时代，儒略深知，如果教宗对自己的领土不能掌握无上权威，就只好作王侯们的奴隶。于是他利用他那暴烈的性格，决意恢复教廷的独立和威权。他认为有必要时，可借他所擅长的政治，或借着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有人评论说：「以前一个小小的男爵也敢轻视教宗的权力；但在儒略二世时，教宗的权力甚至能迫使法兰西的国王尊重。」儒略也是艺术的伟大卫护者。他开始兴建圣伯多禄大殿，把当时最伟大的天才如布拉芒 (Donato Bramante)，米开兰基罗 (Michelangelo)，拉斐尔 (Raphael) 等都罗致来给他工作。

如果教宗只是世俗的君主，儒略二世无疑地当跻于最伟大的教宗之列。但看他毫不迟疑地穿盔戴甲，率领军队攻城，与其说是教会元首，勿宁说是一员战将和一位政治家了。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忽视教会的事务，甚至也想从事整顿；可惜战争和政治已使他日无暇晷，因此未能有所建树。所以他为此而召集的第五届拉特朗 (Lateran) 大公会议 (一五一二—一五一七)，实在也无多大成就。

### 一位卫护艺术的教宗——良十世

教宗良十世 (Leo X) 出身梅地奇望族 (Medici)，性格和平，以温良慷慨著称。他是一位文艺和「新学」的倡导

者，对教廷政务和家事都很操心，对日益需要整顿的教务却无暇关心。

### 最著名的古典学者艾拉斯穆

文艺复兴运动在十五世纪初叶开始于意大利，许多意大利的人文学者都染上了异教的思潮。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法、荷、德、英等，文艺复兴的运动较晚；但一般说来，却对宗教的特性比较保守。对天主教真诚系恋的人文学者，企图革新教会以适应当时热烈的思潮；他们更向往宗教内修的生活，摆脱具侵蚀性的外表工夫，对圣人们的敬礼不甚注重，更直接向往基督，直接由福音经中汲取灵感。例如法国的哀达布( Lefèvre d' Etaples 一四五〇——一五三六)，英国的多玛茂禄( Thomas More 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因忠于圣座而被处死)都是这类的典型人物。然而最著名的人文学者却是艾拉斯穆( Erasmus 一四六七——一五三六)，他要求革新教会而不用激烈手段。时人称之为「人文学者的巨擘」。

艾氏生于荷兰鹿特丹城(Rotterdam)，没有得到真正的圣召便贸然加入了奥斯定会为司铎(后由教宗恩准变为俗人)。以他著作的天才得名很早，被尊为当时最伟大的辣丁文作家。在一个辣丁文尚为西方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时期，艾氏虽生于荷兰，实在可说是欧洲的公民。他个人的旨趣虽只愿埋头研究学术，环境却引他周游了全欧；他和当时的每位伟大的作家都保持着广泛的通讯关系。很少有象他那样生前即被人尊敬称赞的。他的理想是想把古人的智慧同福音经溶于一炉而使之实现。因此他为出版古典作品—辣丁和希腊异教人的作品，以及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贡献了艰钜的工作。然而他的思想却很难捉摸；宗教

为他特别是一个道德生活的向导，他愿把信条减缩到最少的数目；他嘲笑士林派的神学家；士林派那时的确已普遍式微，对琐细和无聊的问题无尽无休地争辩，旷费时间；他也讽刺隐修士和他们实在有的短处。

艾氏诚恳地希望见到教会改弦更张，不过他的攻击也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为了讥讽当时神职界的缺陷，对修会生活未免有些曲解；为了嘲弄士林派的烦琐，而攻击神学本身。艾氏虽始终未与教会决裂，但无意中却给抗议教会改革铺了路；他在末年也深悔他青年时代的作品未免太孟浪了。②

### 文艺复兴的结果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真呈显了异常蓬勃的现象，恐怕历史上任何时期也没有出现过那么多的天才，真是指不胜屈；这里只提出三位最杰出的巨人，以概其余而已：雷翁那多芬奇(或译达文齐 Leonardo da Vinci)，真是一名渴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艺术天才，著名的「最后晚餐」就是他的杰作。还有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也是多方面的天才；他是可爱的诗人，无比的雕刻家，他曾以大理石雕刻了梅瑟和达味的象；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曾以大幅的壁画装饰了梵蒂冈宫西斯汀圣堂的墙壁和承尘；他又是伟大的建筑师，计划了圣伯多禄大殿那巨大无比的圆穹。此外还有拉斐尔(Raphael)，他虽不幸短命(于三十七岁逝世)，却有不少的杰作留给后人，作古典绘画的模范；例如多帧温良的圣母象，梵蒂冈宫的各种装饰等。

说教宗们曾提倡鼓励古典文艺复兴，并使罗马成为艺术生活的中心，无疑是一种光荣的头衔。教会曾保护文学

和艺术，也是继续古代的传统。不是教会曾在蛮族入侵的浩劫中拯救了文化，又在整个中古世纪期间启发了艺术吗？然而在以上两个时期却大有分别。在文艺复兴时期并非象中古时期，艺术完全是向敬礼全能天主方面发展。同是一支笔，画了圣经的故事，现在艺术家又拿它来表现异教的神祇；而他们所寻求的——即使在宗教性的工作中也不例外，——不仅是天主的光荣也是他们个人的光荣。

然而艺术的辉煌所带给教宗们的光荣，也不当使我们忽视它们对圣教会的玷污。不断地宣称教会应在她的元首和肢体上从事改革，真正的改革却未见诸实行。元首固然应该倡导，但自西斯都四世以来，历任教宗在威胁教宗国土的争执中，似乎忘记了教会和人灵的普遍利益。与其说他们是神圣的元首，勿宁说是世俗的君主。中世纪的大教宗们用他们的最高神权给他人服务；文艺复兴时的教宗不但委自己的亲属们以职任，还设法使他们贵显，作意大利的公侯。教宗被卷于政争的旋涡中，也和世俗的君王一样用同样的方法：征兵，联盟；为保持军队、舰队、外交，为发展艺术，为建筑等，在在需要金钱，而且用费日繁；因此不得不加重赋税；自然各处怨声载道，屡起反感了。这一切都大损圣座的威望。加之教廷人员上行下效，更使人民大失所望。

至论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神修生活也随着时代衰颓：往往一位主教兼管几个教区，一位院长兼管数座修院；于是将管理的职务委之属员，而自己却保留了大部分的收入。这样一来，就无怪乎教务废弛，司铎的教育水准不够，修会的纪律松弛而热心日见低落了。

以上的情形虽极严重，但尚不至绝望。历史证明，虽

在最危险的时期，教会仍是「圣教会」，继承着吾主的许诺，屹立不动，「地狱之门不能战胜她」。

首先当注意的是，有几位教宗虽然不孚众望，但在信仰方面却从未堕落；教会所训示的道理，也常保持纯洁，从未蒙受染污。好象天主的照顾有意给人证明：人虽然能损害教会，但绝对不能毁灭她。连亚历山六世，也从未在纯宗教的事上贻人以口实；他曾奖励修会，卫护对圣母的敬礼，且在寻获新大陆时，派传教士去宣传福音。

何况神职人员和教友并未集体堕落，几个历史家的歪曲报道，不能令人置信；决不可以一概全。当历史家提到某时代发生了几件不幸事件时，人很易认为该时代已完全败坏；至于普通的生活和一般循规蹈矩的行为反不能惹人注意，历史家也不想予以叙述；能刺激他注意的，却是那些反常的事件。（倘有人欲写现在的历史而向报纸搜集材料，一切罪恶，伤风化，贿赂败德等事件触目皆是，如果只写这一类的事件，而不宣扬好人好事，很能给后人一个错觉，认为这个时代只有坏事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确有些野心贪婪的枢机，行为不够标准，而表演那些可悲事件的也正是他们；然而卓荦不群而为圣教增光的，并非没有哇；③傲慢不羁优游自在，只知游猎而不理教务的主教固然也有，但热心拯救人灵，努力改善自己教区的更不乏人；修规废弛的修院不能说是没有，但谨守会规，热诚不衰的更比比皆是（马丁路得所进的修院，便以严谨热心著称）。

文艺复兴对圣教会所以未酿成重大的危机，是因为它所波及的只是少数人；民众的大部分仍保持着坚强的信德，对宗教的本分也奉行不辍：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

朝圣的地点有时虽然很远，却常吸引着大队的信友前去巡礼；戏院常公开表演宗教性的戏剧，无论工人或市民看了，都感动得流泪；许多新的敬礼蓬勃发展，例如为敬礼吾主的苦难而拜苦路等。自印刷术发明以后，成千累万的圣经，祈祷的经本，圣人的行传等相继问世。「师主篇」一书，此时成了人最爱读的书籍。但最足以表现当时教会活力的，是教会正式册封了许多具有英豪圣德的圣人，数目不下百位，各种生活地位的人都有；如圣女加大利纳(Catherine)，出身于热那亚(Genoa)的望族，她嫁了一个轻薄的少年，但赖她的努力，终于使他弃邪归正而死；她在居寡时英勇地献身服侍病人和染疫的人。会士中有我们已提过的圣若望贾比斯坦(St. John Capistran)；但此时最著名的是圣芳济保辣(St. Francis of Paula 一四一六—一五〇七)，他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贫苦人家，度了很长时间的隐修生活，并创建了一个修会，名「微末兄弟」(Minims)。他的圣德和显灵迹的名气很大，致使法王路易十一世把他召去法国，为能在临终时有一位真正的圣人在侧扶助；他因此留居法国建立了许多修院，作为希图改革者的模范。

## 结 论

自十五世纪中叶至一五一七年，中古世纪末年的社会秩序已濒临崩溃，而新生的近代尚未稳定，真是多事之秋。工商业尤其在德国，突飞猛晋，大部分财富已入少数财阀之手，广大的民众则在贫困中挣扎。圣教会虽给所谓伟大美丽的人文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却被异教的自然主义所染污；她虽不断产生圣贤，但不少的分子也为贪污野心

所腐化。于是深思熟虑的人士，对喧嚷了一世纪之久的改革，更加不停地呼吁，希望领袖与属员都洗心革面；无奈效果甚微，只有部分的改善。奉教的世界，期待着更好的日子。

果然五十年以后，改革就要着手啦。特利腾会议结束时，圣教会好象业已革新，但只是在一个可怕的悲剧以后才实现。圣教会这种革新迟迟不着手，几个强有力的人：一个德国的会士路得，一个法国的文人贾尔文，便在教会以外，并且是反对教会，试图实行改革。于是圣教会被分裂了，而且这种分裂至今尚未能合拢。

注解：

- ①应当注意，这种异教精神的感染，特别在意大利最为显著；在其他国家，如法兰西、英吉利、荷兰、德意志等，普通还保持着宗教的特殊优点。
- ②对艾拉斯穆很难下正确的评判，至少少数人的评判自相矛盾：自他生时一直到现在，抗议教和天主教都有热烈赞美他的人，但两方面也都有视之为死敌的人。有些抗议教徒看他是一位改革家，只是他没有公然揭叛旗的勇气；有些天主教人士则目之为叛教者。有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教会人文学者；其他的人则视之为教会最大的敌人。其实他既不算英雄，也不是圣人；当他相信双方能以在信条上互相让步而达成和解时，那是他的错；不过他也和当时少数的人同样明白，教会的裂痕不能用武力，只能用爱德弥补。
- ③我们这里只提几位以概其余便了：枢机白撒利翁(Bessarion 一三九五—一四七二)生于小亚细亚，是一位博学鸿儒，曾为联合东方教会重归统一而积极努力；枢机尼各老古撒(Nicholas of Cusa 一四〇一—一四六四)是近代科学的前驱，当代最有名学者之一，曾为改革德国教会而积极工作；西班牙枢机济迈乃(Ximenez 一四三六—一五一七)他是政府中的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也是对神职人员道德的一位改革家，他提倡人研读圣经比马丁路得更早。

## 第十二章 誓反(或抗议)教的改教运动

(参阅44页注)

### 壹 马丁路得在德国的改教运动

#### 十六世纪初叶的德国

改教的悲剧是在德国爆发。假如不是因为该地的社会和政治情形供给了它有利的环境，也决不会成功。缘自教宗与德意志皇帝斗争以来，反对罗马的情绪总未完全消除。尤其当时，德国充满了矛盾，比任何其他地域更甚；高级神职人员的富厚已腐化至从来未有过的程度，他们的生活非常奢侈。反之，普通司铎却因贫困而情绪不佳，对一切革命运动都很容易表同情。在工商业兴盛的城市，新生的资本主义使市民阶级日富，平民百姓的生活却日趋不幸；工人被剥削，小商人倒闭，农民被赋税拖垮，人人都希望着改革。

政治方面也异常紊乱，大小有四百余国，真如一团乱麻；这些小国固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但他们都觊觎独立自主；被三位宗主教和四位王侯所选举的皇帝，对这一盘散沙很难施行他的权力。路得所面临的皇帝查理五世 (Charles V 一五〇〇——一五五八) 年轻而任性，十六岁时便作了西班牙王，并兼西班牙在美洲及菲律宾所征服的广大土地的主人，奄有现在的比利时，奥地利及意大利南部；一五一九年被选为德意志皇帝，为此他曾自负地说：「他的领土上没有日落」；他被视为当时权势最大的国君。其实领土广大，统治困难，更是一个弱点，他得常提防外在的敌人：东面有土耳其人不断的威胁，西面有权势日增的法兰西。因此查理五世虽有志保持帝国内信仰的一致，对新生的教派也无力镇压。

一切情形虽供给了改教的有利条件，但仍不足，倘无象路得那样特殊个性的影响，改教恐尚难以实现。

### 路得早年的情形

路得 (Martin Luther) 于一四八三年生于萨克森省 (Saxe) 的埃斯勒本 (Eisleben)，父亲系一矿工，为人正直而勤奋，因其坚强的毅力，地位得以改善；母亲行止端方，心窄而虔诚。当时对子女的家教甚严，路得成年后，尚忆及他曾为鸡毛小事而屡受鞭笞。他的学校生活因家境贫穷而颇感苦恼，后得某贵妇的接济始得完成其学业。他天资聪颖学业日进，父亲为他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因命他去研究法律；他便进欧福 (Erfurt) 大学去攻读。光明的前途正在他面前展开时，不料他竟进了奥斯定会修院。原来一五〇五年七月二日，他曾为一异常猛烈的暴风雨所袭击，周围雷电交作，使他饱受虚惊，深怕为雷电所殛死；于是便向天主许愿：倘能脱险，便去作隐修士。虽经友人劝阻，终于在十五天后入会去修道。这种未成熟的圣召成为他终身之累。

一五〇七年五月二日路得晋铎；次年便被任为威丁堡 (Wittenberg) 神学教授。一五一〇至一五一一年因办理本会事宜而有罗马之行，教廷的奢侈生活使他深受刺激，但他依附教会及服从圣座的心情并未因此动摇；实际引致路得改教的，并非如人所推测的教会的腐败现象，乃是困扰他心灵的悲观心情，和他对罪过、圣宠、以及救灵等神学问题所持的成见。

### 心灵的悲剧

路得在教授神学的同时，曾潜心研读圣经；主要的是对他心灵内潜伏的问题寻求解答，以便获得安慰和平靖。



马丁路得象

他在修会的生活中，并未获得安宁。他虽十分谨饬，但自一五〇五年遭受风暴的袭击以来，对天主的审判常怀恐怖之念；他因畏惧天主而感觉局促不安，于是对自己是否能救灵便开始怀疑。因为他相信对心中的恶念应该负责，于是便希望能摆脱心思的烦扰，并希望能感觉出自己确为天主所宠爱。每次感到猥亵、暴怒或对某端道理怀疑等思想冲击时，便认为已犯重罪而应受严罚；祈祷、苦工、告解都不能解除他的恐惧不安。他曾说：「我虽厉行苦工，但失望的心仍不能祛除。」

某日看圣经时，看到圣保禄致罗马人书中这一句：「义人由信德而生活」，他相信发现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他按照自己心情的需要去解释，认为其中的道理是：人已彻底败坏，无法复义，虽然外表符合法律全遵守了天主的诫命，仍旧还是罪人。人即便努力行善立功，也办不到，因为整个儿的人已为原罪彻底败坏，由人自己不能获致复义(得罪赦)，复义是由外烁，那就是因基督的圣宠。圣宠能将我们的罪污遮盖起来，但不能改变我们。不是善行拯救我们，乃是对耶稣的信心，是祂用自己的功劳把我们掩盖起来；我们根本用不着立功，基督已替我们立了功。他曾这样写道：「人已被法律压倒，根本无法遵守它；他该做什么呢？基督已完成了法律，用不着我们再去完成它；只须信赖基督，用信心将我们符合于祂便够了，因为祂是我们的复义，我们的圣化和我们救赎主。」

路得的道理与教会传统的道理抵触的地方在那儿呢？圣教会训示我们：天主是公义的，不能命令人做不到的事；祂一方面给众人公平分施祂的圣宠，告诉人没有天主圣宠的帮助，人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另一方面教人与圣宠合作，自己去努力行善，才能救灵升天。信心只是复义的开始，因为按圣雅各伯所说的：「信德而没有善行是死

信德。」为得救只信不够，还得有爱德，爱德该由善行表达出来。人应该努力行善修德，赖天主的助佑是做得到的。

但他同圣教会的破裂是逐渐积累而成的。起初几年，他只是攻击神学家们的意见，并没有攻击教会传统的信德。当人反对他所说的信德时，他回答说：只有圣经（还得是按照他的解释）是一切真理的泉源和准绳。大赦事件实造成了他同教会决裂的机会。

### 大赦事件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教宗儒略二世开始在罗马兴建圣伯多禄大殿。路得任教时，亦即良十世做教宗时，大殿距离完成还相差甚远，建筑所需要的费用太大，一时决不能筹措。于是教宗派人到各处去募捐，谁告解领主并肯为修建大殿献捐者，教宗便颁赐他若干大赦。颁赐大赦并非不合法<sup>①</sup>；在第十一世纪时，已给参加十字军的人颁赐过全大赦。从那时起，大赦更容易获得了，例如朝圣、拜圣堂、施舍都能得大赦。这种作法，获得的成效很好：许多慈善事业因以兴办，许多圣堂医院等也得以建造；灵修方面也有不少的收获：教宗指派专人为此事去演讲，许多罪人办了妥当告解，因而去旧更新。

当知自中世纪末叶，大赦颁赐得太易，未免有滥用之嫌；而且借捐款的机会颁赐大赦，难免被视为交易。宣传大赦的人和收集捐款的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拯救人灵呢？还是收集银钱？真是有口难辩。最坏的是歪曲了教会的道理。宣讲员们竟有扬言大赦的效力是由它本身而来者。当时有一种流言，说：「银钱在捐献柜中叮当一响，炼狱的灵魂（为她而捐献的那个）便应声而出。」这显然是夸大之词，今日的任何神学家也不敢支持这种论调，然而在德国宣传大赦的一位道明会士名帖次勒（Tetzel）者，竟

那样演讲！

宣传员在德国尤其最易引起众怒的，是眼见德国的银钱源源流入罗马而不快；因此有人控诉教廷剥削德国人民，榨取他们的金钱，而对罗马所潜藏的忿恨也因之而日增。

路得用他那演讲的天才，对这些忿怒发表了骇人的反映。他于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一次激烈的演讲之后，在威登堡教堂门首张贴了九十五篇短论，反对大赦。那些短论中，许多攻击滥放大赦的理论，固非无的放矢，但其他的攻击则损伤了大赦的道理。

争辩于是展开。路得发挥了他那演讲的天才：他有动人的声调，活泼的想象力，外加扣人心弦的言辞，时而表现细腻的热情，时而大胆地痛骂，连最粗鄙的词句也不怕运用。

### 路得被开除教籍

这种争辩，起始在全德意志，继而在整个教会激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情他的如潮似涌，反对他的也象排山倒海。教宗良十世起初不加重视，以为只是修士之间的争辩而已，但不久便晓得事关重要了。

一五一七年路得尚自视为教会驯顺的子弟，但逐渐被神学士们的批评所激怒，便不惜以恶言相加；不久大赦的问题已转为次要，进而讨论救灵的基本信条：路得声言为得救只需要信仰，用不着善行，甚至他想改革整个教会。教宗召他去罗马答辩，他拒绝前往。良十世试图以温和手段从事，乃命当时一位最大的神学家迦耶坦 (Cajetan) 枢机去说服他。迦氏对路得很和善，但请他撤消自己的谬论。路得要求开大公会议来裁判他的道理，不过他说大公会议也能错误。(那么就不必多此一举啦！)

这样一来，路得便难逃绝罚了。良十世将问题与枢机

等深长研讨之后，乃于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颁布了「主，请起！」(*Exsurge Domine*) 诏谕。对路得的道理已经正式宣判；不过限他在六十日之内悔过，否则将被开除教籍。

路得在尚未获知罗马这种决定之前，曾于七月十五日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已痛下决心；无论罗马摒弃或怀柔，我满不在乎！」他在此时所散布的著作中，声明教友一律平等；人人因圣洗圣事得分享司祭之权；人人都该以圣经为真理独一无二的来源；皇帝和王侯比教宗更有召集大会之权；除圣洗和圣餐外，一切所谓「圣事」都应放弃。

此时教宗诏谕抵达德国。为表示轻视，路得公开在威登堡大学全体学生面前将它焚毁(一五二〇年十二月十日)。于是良十世便于一五二一年一月三日将路得开除教籍。

按照当时的习惯，这个裁判应由皇帝执行。查理五世要怎样处理呢？他本来信仰很深，路得的倔强对他的宗教信仰实是一种侮辱，加之他又深怕见到帝国的分裂。于是他便在沃木斯(Worms)召开会议，命路得赴会申辩。路得毅然前往，沿途被民众喝采欢呼。在催促他撤消他的理论时，他要求给他一日反省的时间；以后便作了如下的声明：「除非由圣经提出的证据和显明的理论使我折服(因为我也不信任教宗，也不信任大公会议，他们的错误矛盾不一而足)，我坚持我所引证的圣经，我的良心已为天主的圣言所俘掳；我不能也不愿意取消任何声明，因为反对良心我认为不妥也不相宜。望天主助佑我。啊们！」

誓反教的分离可说自此声明正式开始。

照当时的习惯，被教宗开除教籍后再被皇帝判罪本来限期过后，便能交付刑役焚死。路得在返回威登堡途中，一队骑兵把他劫去。那是想救他的友人所为；他被秘密带

至瓦特堡 (Wartburg)。当在德意志盛传他已死时，他在该堡垒中脱去会士的衣服，穿上了骑士的服装，改姓易名躲藏了十个月，被深心的不安与烦恼折磨着。他曾承认：「我的心战栗；我自问说：只是你一人有理吗？其他所有的人都错啦？假如是你错了呢？那么不是你把许多人都引入歧途了吗？」

他虽深感良心不安，但仍致力将圣经翻译为本国语。这个译本的文字很美，仍为近代德语的标准之一。

### 路得与人文学者

然而此时，有意整顿教会却无意背叛她的人文学者离弃了路得。起初艾拉斯穆对路得也表示称赞，但自沃木斯会议以后便公开对他表示反对。路得说人性已根本败坏，丧失了自由；艾氏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反驳路得；一时不胫而走，纸贵洛阳。路得激怒之下，写了一篇「论奴隶意志」来反击；从此对艾拉斯穆恨之刺骨。

### 社会革命

在宣判路得后十个月，暴风雨似乎已平静；拥护他的人已经太多，许多有权势的人都保护他，致使裁判无法执行；但在改革运动的中心，也有人反对他。他猛烈攻击神职人员，声言必须改造教会，把教会所有的财产充公；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社会的革命。他们徒中的极端分子摒弃了一切权力，甚至连圣经，及一切外表的敬礼，一切法律，全行抛弃；他们只承认天主对每人内心的启示。于是还有冒牌的先知起而宣传天国。为穷困所迫的农民，从他的道理中缙绎实际结论；既然无所谓权力，无所谓社会阶级，人人一律平等，那么财产自然也该大家共享了；于是对他们的统治者，对神职人员，群起革命；废除圣事和弥撒，捣毁圣人们的圣象。②

不久便兴起了真正的革命，即所谓「农民战争」；成群武装的乱党以「上帝的公正」(God's justice) 相号召，起而强占封主们的土地，焚烧隐修院……路得认为这些过激行动有碍革命，于是促使王侯们镇压革命。他曾写道：「亲爱的王侯们，拯救我们吧！保卫我们吧！尽力歼灭，杀死他们吧！这样的人非以拳头对付不可……蠢驴需要鞭答，百姓也非以武力驾驭不可。」镇压的手段实在残酷，暴民被屠杀的，数以万计。

这个农民革命对路得的运动制造了严重的后果：他从此与王侯们联合一气，使宗教的改革变成了政治运动。路得不准人民作的，却准许王侯们去作；他们霸占了教会的财产，美其名曰「俗化」，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充公。改教的结果是使王侯们因以致富，利之所趋，自然吸引了多人附和新教。从此路得便放弃了他那纯心灵的宗教的意念。为阻止重洗派走极端，他认为非倚靠政府的力量不可，他说：「为教育人民，非以法律和刀剑命令他们热心不可。」这种改教运动剥夺了教宗在宗教问题上的权力，却代之以世俗君长的权力。

此时有不少的主教司铎修士改了教，也结了婚。路得本人也于一五二五年与一位还俗的修女名迦他林·芬·波腊 (Catherine von Bora) 者结婚，她给他生了五个孩子。

### 誓反教(或抗议教)

德皇查理五世渴望在帝国内重建和平，并愿尽力限制路得派进展。他于一五二九年在斯拜尔 (Speyer) 召集了一个帝国会议。但路得的运动业已广泛展开，想窒息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为天主教人；于是议决对已建立的路得派新教暂时采容忍态度，留待大公会议去解决，但不容它再事扩张。五个王公及十四座城市的代表

反对这项决议案。这是誓反或抗议 (Protestants) 名称的由来。③

### 奥格斯堡信条 奥格斯堡和平

德王仍不放弃在天主教和誓反教间达成协议的希望。为此一五三〇年又在奥格斯堡 (Augsburg) 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誓反教徒被邀去陈述他们的教义。路得的一朋友墨兰顿 (Melancthon) 代表编纂了一件包括二十八项的信条；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奥格斯堡信条 (Confession of Augsburg)。这是誓反教教义第一次汇集的正式纲要。墨兰顿，赋性和平，主张调解，把那些能使天主教人不爱听的事情尽力减轻，但也足以表明路得的思想，就如说，人性被原罪彻底败坏了，善功、圣事及敬礼圣人等都属徒劳无功，只有圣经才是唯一的权威等等，因此无法达成协议。

直到现在所有的都是神学的辩争和社会的动乱；此后誓反教徒感觉人数已多，其中且有有势力的王侯，于是便组织了军事同盟 (即一五三一年的驷马开得联盟 League of Smalkald)。誓反教便成了一种政治势力，且有一支军队；德意志也分成了势同水火的两个阵营，因此便造成了延绵不断的内战。直到一五五五年在奥格斯堡签订了一个条约，才建立了暂时的和平。在条约中承认誓反教徒能把从天主教徒手中所攫取的财产予以保留；一切王侯，无论其为天主教或誓反教徒，都有权调整其国内的宗教事宜，并有权勒令其国民信奉自己的宗教；凡拒绝改教者，只好迁徙出境。王侯也成了人良心问题的决定人。此后「属谁管辖，便得信奉谁的宗教」(Cujus regio, illius religio) 一语，便成了德国公民权的惯例。这样便否认了信仰自由；日尔曼帝国内宗教的统一遂被正式破坏。

## 路得教派在斯堪的纳维亚

产生于德国的路得教派，不久便获得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普遍支持。不过这种发展乃得力于政治，而非由于宣传。瑞典、丹麦、挪威、冰岛，都由国家元首勒令改奉路得教派，并宣布其为国教；天主教的财产全被没收。但为避免拂逆民意，对外表的礼节尽量减少更动，只逐渐在不觉中散布路得的道理。这就是何以这些地方，天主教几乎已完全被取缔，而外表的礼仪却仍同天主教最相似的原因。

## 路得去世

奥格斯堡条约签订时，路得已在故乡埃斯勒本去世九年（一五四六），享年六十有三。此时德国、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都已改教；法国也正在进行。他对自己的改教运动似乎应当知足了，然而事实上他的末年却为愁闷所笼罩。

他的工作在许多点上失败，实在他不能佯为不知。第一他能看清，无数的社会动乱，他虽无意，却是真正的导因；他也曾为他所目睹的祖国道德的衰颓而悲伤，他曾说：「德国连在这福音的大光照耀之后，它的道德还完全象在魔鬼势力之下一样。」他蓄意改造教会，但实际却予以分裂，这显然非他始料所及；他愿意使教会摆脱罗马的权力统治，结果却把各国的教会放在世俗君长的权力之下。更有甚者，他很忿恨在他门徒之间所起的争斗，连他所坚持的「只由信德复义和基督实在圣体中」的道理也遭他们反对；他确实不愿意见到分歧，然而他所倡导的道理本身，注定非分为若干派系不可。

路得的心灵非常虔诚，那是不容怀疑的；他洞悉天主的伟大，因此对基督教的理想怀着崇高的观念，对天主的

照顾和基督的救赎工程也怀着庄严伟大的依恃。我们决无意否认他的工作实在也有些有益的收获：他曾对当时的教会精神化而致力，经常劝神学家直接求助于圣经，对教授儿童教义曾给以很大的鼓励。然而在这些优长以外也有显明的缺失：他的脾气暴躁，不能平静有节，在辩论时出言粗野；尤其傲气冲天，咄咄逼人。他在遭遇良心的困扰时，自信在圣经中发见了能解除他良心不安的道理；而且一走上了这条道路，便坚持到底；常坚信不疑地以天主的名义发言，擅自反对基督所建立的圣统代表，并抛弃教会的权威。竟敢在这样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神学系统，且以天主的名义命令人们接受。他所自诩的自由解释圣经，却拒绝他人尝试，不但拒绝天主教人，且拒绝誓反教其他宗派取用。他自以为精研圣经，其实只是管窥，只承认他个人所见的真理。他实在缺乏圣人们的谦虚。他掘开了教会分裂的洪流，给教会留下了四百多年来的遗憾。

其实教会已开始改革，即使没有路得她也要负起革新的责任；路得去世时，教宗已在特利腾召开大公会议，以便完成天主教的革新工作。（参阅第十三章）

## 贰 瑞士的改教

### 慈运理 加尔文 加尔文主义

#### 慈 运 理

慈运理(Zwingli 一四八四——一五三一)对瑞士就如路得对德国一样，同为改教的创始人。他是苏黎世城(Zurich)的一位本堂司铎，很负盛名的宣讲员；他所宣传的道理确与路得的近似，但比他更为彻底。他不但取消了天主教的一切礼仪，摒弃了弥撒，捣毁了圣象苦象祭台等，甚至抛弃了一切圣事。路得尚信耶稣实在圣体内，慈

运理只认「圣餐」为纪念基督圣死的一种仪式而已。

慈运理的道理自苏黎世赢得了瑞士大部分人的拥护，但联邦中的七个仍坚持天主教的信仰，也同德国一样，由信仰的分歧演成了政治的战争。慈运理率领其教徒攻击天主教联邦时阵亡。从此瑞士联邦遂分为天主教和誓反教两派。

慈运理派遂在瑞士扎根，但已与加尔文派合流。

### 加 尔 文

最堪注意的是，自路得改教时起，誓反教即分为各个不同的派别，教徒彼此对立，有时甚至彼此猛烈地攻击。路得教义的本身便有不少的矛盾；路得总未敢由其所持的逻辑结论中，提出原则来，他把组织敬礼和教会之权，委之于世俗君长去办理。至于加尔文呢，却根据路得教义的原则，作了确切而清晰的综合，给誓反教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以确保她的生存。

加尔文 (Calvin) 公元一五〇九年生于法国北部皮喀第省 (Picardy)，小路得二十六岁。出身中产阶级的家庭，曾攻读法律与神学。因与路得教派人时相过从，遂被他们争取过去。当法王芳济一世 (Francis I) 开始镇压誓反教徒时，他便逃往瑞士巴塞尔 (Basle) 去避难。他在该城先以辣丁文编了一本书，随即译为法文而加以申说，取名「基督教原则」(L'Institution Chrétienne)；这是誓反教主要著作之一。他掇拾路得只信圣经及善行无益之说，强调专靠信心便能得救，又以吓人的「预定」(Predestination) 之说加以补充；按照他的说法，天主自永远便已选定；因此在创造人时便预定某些人升天某些人下地狱，而且天主这种决定是不能更变的。这种骇人而抹煞人自由的道理，今日的誓反教各派几乎都已抛弃。

## 加尔文在日内瓦

加尔文于一五三六年初次定居日内瓦 (Geneva)，当时他只二十七岁，但马上便成了该城的领袖，从事整顿庶政，改善风俗。他的独裁作风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甫经三年便被驱逐；然而二年以后又被驱逐他的人召回，而以胜利的姿态返回日内瓦。

从此以至去世(一五六四)一直是日内瓦的教主兼君王，他的独裁是世所罕见的。他开始组织城邑。他同官员们取得协调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而由牧师去执行。有一个由六名牧师和十二名长老所组成的「法庭」(Consistory) 实行专断的裁判权；这个严厉的法庭有褫夺参加圣餐权，禁止参加会议，放逐，并将不肯悔改者交付世俗法庭等权；这种种裁判和一切严厉的处罚，都以加尔文的马首是瞻。他的健康虽然欠佳，但精力充沛，律已甚严，生活淡泊；待人也极严厉。在日内瓦娱乐是犯禁的；跳舞，掷骰，夜间喧哗都在禁止之列对玩纸牌，看小说和刻意修饰发辫者，往往逮捕下狱；听道时瞌睡也视为犯罪行为，圣经为惟一奉准的阅读物。尤其严禁异端，因为加尔文是一名固执己见的人；他认为应对日内瓦人谋幸福，不顾他们的反对；至于所谓异端人即其思想异己者，非处死即放逐。例如有一西班牙医生名瑟维特者 (Michael Servetus)，曾刊行一书否认三位一体，加尔文即命将其处死。

加尔文教派决不囿于日内瓦或瑞士，凡誓反教所在之地皆有影响。有许多所谓善男信女，为他的名气所吸引，竟弃家抛业去日内瓦，以便亲炙这位他们认为拥有天主圣言的人。他不知疲倦地给英、法等誓反教团体为了无数的信，其中有的是长篇大论，予以指导，鼓励或斥责。

他的组织力特强，曾在日内瓦创办了一个研究院

(Academy)，是造就誓反教高等人材的中心，同时也是一座秧田学院，由其中派出了许多布道人员。因此赖加尔文之力，日内瓦竟成为改教的一座模范城，被称为「誓反教的罗马」。尤其誓反教得以传至法国、荷兰和苏格兰，大都是由于日内瓦所派出的传教士，及其所出版的书籍。

加尔文是一位天才筹划家，且具有一个神秘的心灵，他是聚征服者、布道使徒和领袖的才智于一身的。可惜这位无匹的天才缺乏教徒的两种基本德性：即真实的谦逊和福音的慈善，甚至使我们爱及仇敌的慈善。用他那清晰的脑筋和坚强的意志，在他所曾受洗的天主教和他所愿创建的新宗教之间，努力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壁。当他在一五六四年精力枯竭而死于五十五岁时，重见信仰一致的希望，只好俟之数世之后了。

### 加尔文派在法国

路得改教后不多几年，他的著作便开始传入法国，但不久便被由日内瓦来的加尔文教义取而代之了。

新教起始发展得很慢；法国当时不象德国那样混杂，已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国王的权力能及于全国各地。国王芳济一世 (Francis I) 最初对新思想表示相当优容，但当誓反教徒竟把侮辱天主教徒最宝贵信仰的宣传品开始张贴至王宫的大门，甚至掠夺圣堂，捣毁圣母及圣人们的圣象时，他便对他们采取了断然的手段，将誓反教徒逮捕烧死。但此种措置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加尔文教徒竟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受刑，他们的榜样且吸引了许多同情者。

誓反教先在小民、工人和小商人中宣传；至一五六〇年间便开始在贵族，且在王族中赢得了信徒：甚至组成了一个政党，大有危及王权和国家治安之势。天主教和誓反教之间的战争于是爆发，这种残酷的内战延长了几近四十

年，其间政治的因素多于宗教。至誓反教的亨利四世 (Henry IV) 依国法当继承王位时，危险达于极点。其时大多数的国民仍为天主教徒，他们誓死反对他。亨利四世一方面深知法国决不能容忍一名异端教徒为王，一方面在神学家的辩论中他也因誓反教的理论不充足而信心发生动摇；于是毅然放弃誓反教，诚心重返本国人民所信奉的天主教。

在当时的君主中，只有亨利四世开明，准许国民信教自由，不加强迫。他在一五九八年出了一道所谓南特谕令 (Edict of Nantes)，誓反教徒虽占国民中的少数，也给他们信仰的自由，并享有公民的全部权利，可膺受一切职任。但在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内，国民则必须信奉自己元首所信奉的宗教，法国却由此谕令开始了信仰自由。

### 加尔文派在低地

誓反教产生时，今日的比利时及荷兰统称为低地，隶属于西班牙王查理五世 (Charles V)。就当他在位时，路得教派由德国传入了低地；虽遭皇帝严禁，仍获得了许多信徒。及其子斐理伯二世 (Philip II) 自一五五五年继承王位后，便更不能钳制新教了：西班牙政府压制越严，人民的反抗也越大，驯至群起而驱逐西班牙军队。最后于一五七九年，北部七省—荷兰—宣布独立。加尔文教团已在各处形成。在加尔文派执政的省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被禁止，违者处死；殉教者不少，最著名的是一五七二年在高尔孔 (Gorkum) 有十九位会士和神父被屠杀。路得教徒也和天主教徒同样被清除。天主教徒的抗拒徒劳无功，加尔文教派终于获得胜利。反之，组成今日比利时的南部七省，暂时仍受西班牙的统治，却仍保持着天主教的信仰。

## 加尔文派在苏格兰

公元十六世纪苏格兰 (Scotland) 尚未合并于英格兰，而为独立王国。在苏格兰建立誓反教的是诺克司 (John Knox 一五〇五?—一五七二)；他是一名大胆豪强而言词动人的人物；他皈依誓反教后，曾因参加屠杀苏格兰首席总主教的阴谋而被囚于法国，以后被释，在日内瓦加尔文身边度了五年，将圣经译为苏格兰文，并以函札怂恿其同胞反抗教宗派(服从罗马教宗者)。他返抵苏格兰后，终于导致了誓反教的胜利。他和他的老师(加尔文)一样，具有法律和组织的天才，按照加尔文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牧师由人民选举，行政由牧师与长老会组成的议会执行。这是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名称的所由来。同样的组织也流行于其他誓反教教会中。

## 叁 英国的改教

英国改教的性质特殊。路得以及加尔文改教是由于宗教本身的动机，世俗的君王是事后参加的，他们对新兴教派的攻击或袒护，是依政治的利益而定的。英国则反是。国王对誓反教的观念原无丝毫倾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迫使国家走上了改教的途径；因此誓反教的观念，经过了多年的反抗，才逐渐注入。

### 亨利八世 安立甘教派与罗马的分裂

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于一五〇九年即位，时年十八。他生得很英俊，又善锻炼身体，且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久便博得了国成民的爱戴。至少外表，他表现得很虔诚。当路得教派开始传入英国时，他为表示反对，曾亲撰一书卫护七件圣事；教宗甚为嘉许锡以「信德保障」的徽号(英王至今仍保留此徽号)。直至此时尚看不出他有与罗马决裂的形迹。其实这位爱奢华耽逸乐的国王，骨子里是

一个骄傲而嗜好声色的人，对任何反对他权力和嗜好的事决不宽容：如果遭受反对，他必以全力对付。

导致他与罗马教廷决裂的是一件私事。当他同一位宫女名亚纳·波麟 (Anne Boleyn) 者发生盲目的热恋时，他和一位西班牙公主加大利纳阿拉公 (Catherine of Aragon) 一他的寡嫂——结婚已十八年。他决心非娶亚纳波麟为后不可；但为达到目的，先得解除第一次的婚约；他便请求教宗格来孟七世 (Clement VII) 正式声明他的第一次婚姻无效。④

经过细心检讨之后，教宗声称国王第一次的婚约有效，为此他无权解除。教宗虽深恐开罪这位有势力的君主，因而导致教会的分裂，但碍于良心，不能破坏婚约神圣不可离异的法律。教宗认为亨利是感情的一时冲动，尚能拖延时日，问题自会解决。然而亨利并不让步。是由于国王的宠信而得为坎特布里 (Canterbury) 总主教的克蓝麦 (Cranmer) 竟声言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无效。亨利便悍然与亚纳波麟结婚，且以隆重的典礼册封她为后。

教宗认为恶表昭著不容忽视，既经警告无效，乃对他开除教籍。于是亨利迫使议会通过「最高权力法案」(Act of Supremacy)，声称国王为英国教会元首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英国教会遂与罗马教会分裂。随后亨利又将各隐修院的大量财产没收，将其中一部分分赠于贵族；他这一着很聪明，于是中饱自肥的贵族便俯首贴耳地对新秩序表示服从了。

### 英国的殉教者

英国当时也和欧洲大陆一样，人民的信仰深厚，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大致都很低落。这样一来，主教和神父们和政府官吏一样，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不服从国王便被视



亨利八世象

为叛逆。大部分都屈服了，但为了天主的光荣，也有不少忠贞的神父——尤其是会士，率多英勇抗拒，甚至致命殉教。他们为了拒绝承认国王的宗教最高权而被逮捕、审讯、判处卖国的极刑：吊死和剖腹。

在这些殉教者中有两位最著名，也是英国当代最显赫的人物：一位是主教费舍尔(John Fisher)，一位是世俗教友多玛茂禄(Thomas More 一四七八——一五三五)。

### 多玛茂禄

多玛茂禄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与艾拉斯穆友谊甚笃，至死不渝。他也是著名的「乌托邦」(Utopia 或译理想国)一书的作者。他的生平显赫，曾为英国大法官；但自亨利改教后，便毫不迟疑地辞职，以示抗议。他原想退隐后安静读书以终天年，但对他拒绝宣誓承认「最高权力法案」而盛怒的亨利，决不让他逍遥法外；于是被逮下狱，受了无数的折磨，家产全被没收。但他决不屈服，连他女儿的哭求和他被迫变卖衣服度生的老母的苦况也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志。他被审讯时答称：「我对国王效忠……我未损伤过任何人……我对任何人未出过恶言……如果这都不能免我一死，我也不希望活得更久。」当他被宣判时，曾这样抗议说：「……我研究这个问题已达七年之久；但在任何书上，任何教会圣师的著作中没见过，一位世俗君主有作教会元首的权利。」——新大法官怒喊说：「什么？你自以为比全国所有的主教和贵族还更聪明更正气吗？」——「大人，赞成你的有一位主教，我这边却有上百的圣人，你有国会作后盾，我却有千年以来所有的大公会议为凭依……」

对这样的言论，只能以行刑作答复了！他于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赴刑场。刑架摇摆不稳；他至死保持着英人所



多玛茂禄象

特有的幽默，便对刑役说：「请帮我上去吧，至于下去，我可以自己来。」于是便被斩首。

### 斐设尔主教

十五天以前，斐设尔主教已同样英勇地赴死。教宗保禄三世在他坐监时升他为枢机；亨利矢言在他接受枢机的红帽子以前，立即教他人头落地。他在刑架上念了天主教的信德誓文，然后跪下念了「赞颂天主经」(Te Deum)及「我曾仰望于主」那篇圣咏。<sup>⑤</sup>

次年，这一切灾祸的原因—亚纳也失了宠而走上了断头台。亨利前后娶过六个女子，除亚纳外另有一名也是被杀身死的。

### 誓反教思想的渗入

亨利八世虽然抛弃了教宗的权力，还没有擅改天主教的道理；反而先后公布了三种信条誓书，确认誓反教所否认的主要信条，拒绝接受这信条的路得教徒，被视为异端而惨遭火刑，天主教徒则视为大逆不道而被吊死剖腹。

亨利八世于一五四七年逝世时，遗下三个子嗣相继为王，每人的宗教政策都不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一五四七—一五五三)嗣位时年仅九岁，政令悉出摄政者之手。加尔文的思想因此开始传入，牧师是由外国来的，加尔文从日内瓦指挥。一种新的礼仪自一五四八年借一本所谓「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传入，此书至今仍为安立甘教会所通用。以后一五五二年，坎特布里总主教克蓝麦又编辑了一种「谛言」，内载加尔文所传授的四十二信条。但为表示不反对旧习已深的民众，仍保留着天主教的组织，即主教神父和主教区本堂区，以及天主教表面的礼仪。

### 天主教的反应

亨利八世第一王后的女儿玛利都铎尔 (Mary Tudor) 继爱德华六世位而为君。她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从未改教，她于是决意在国内恢复其祖先的宗教；被亨利八世所放逐的主教悉被召回，外来的誓反教牧师全被驱逐。可惜的是女王对誓反教徒仍采用以前对不信奉国立教会者所施行的暴力，将他们投火焚毙。何况玛利都铎尔的王朝只延续了五年，这为复兴天主教未免太短了。

### 新教在伊丽莎白朝决定性的建立

玛利都铎尔死后无嗣，乃由亨利八世和亚纳波麟的女儿伊丽莎白 (Elizabeth) 继承王位 (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安立甘教会乃在她治下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女王受过严格的教育，很爱艺术和文学，从她父亲继承了一份儿政治的天赋；但对道德和宗教的情绪几乎完全缺乏。她除了奢靡放肆外，还很残虐。宗教为她只是政治的机缘而已。她虽深恨教宗的神权，但在她姐姐当权时却深自韬晦。她爱天主教礼仪的庄严排场和她那坚强的组织；对加尔文教义，和它那严峻的仪式及民主的管理方式则毫无兴趣，她因此细心保留着天主教的组织—即加尔文所取缔的主教神父，但将忠于天主教的主教们革职，代之以改宗的新教徒。⑥

女王于一五六三年使议会通过三十九款，作为英国国立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的信条，其中大多数与天主教的道理相合，其他则属路得或加尔文派的道理：如圣经为信仰的惟一标准；人因信称义不需要善行；人姓已完全败坏，受洗后仍然一样，对炼狱大赦及敬礼圣人等道理尽行抛弃；除洗礼和圣餐外无其他圣事；不过信条的文字多处意义不明，能有不同的解释。这种教义，全部来说是一种模糊而具伸缩性的调合；由此可以明了，何以今日在安

立甘教会内有截然不同的倾向：有的与天主教很相近，其他则更趋向极端。

此外不奉国教不接受那三十九款信条的誓反教徒 (Dissenters)，在国内不断出现，他们和天主教一样常受折磨。

### 伊丽沙伯朝的教难

一五七〇年教宗比约五世将伊丽沙伯开除教籍。狂怒的女王便对天主教人制定了极残酷的法律：主日不参加安立甘敬礼者，受很重的罚金。这样一来，反抗者不久便破产了；一切天主教的举动都以叛国罪论，不但做弥撒者，连望弥撒及接待神父者都可判死刑。虽然如此，仍有许多英国青年到专为他们建立的国外修道院去攻读神学，升神父以后便秘密返国；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巡视教友，鼓励他们。在伊丽沙伯王朝，有三百来位神父潜入英国，半数以上登上了绞架；其他因忠于信仰而被处死的教友甚伙。

殉教的牺牲中最著名的是艾德孟·坎庇恩 (Edmund Campion 一五四〇—一五八一)；他是当时一位最著名的学者，前途非常光明，以前他误认为可对「最高权力法案」宣誓，不久良心发见错误；尤其当他傍听了一位殉教神父的审讯后态度更为坚决。他于是便出了国，进了耶稣会也升了神父，然后返回祖国，结果被奸人告发而遭逮捕，虽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尚对审判他的法官侃侃而谈，将法官驳倒。女王深知他的价值，便对他甘言利诱，希图使他屈服，然而白费心机。他一听判他吊死而分尸，立时喜形于色。一位参观他受刑的贵族青年名亨利瓦保尔 (Henry Walpole) 者，被溅了一身血；他因此反省而进了耶稣会，在坎庇恩殉教后十四年，在同一地点走上了刑架。⑦

如此持久而顽强的迫害当然使多人背了教，但少数忠

贞的信友，经历了许多考验和折磨，反而更纯洁且更坚强了。

### 爱尔兰坚决拒绝改教

当天主教在英格兰逐渐被窒息而硕果仅存时，爱尔兰虽隶属英国，却忠于罗马。首先亨利八世，继之以伊丽莎白，都试图以武力强迫爱尔兰人改教，但神父与教友对祖传信仰忠贞不渝，一致坚决反对。于是长期的蹂躏便宣告开始；信友的土地被剥夺，转赠于英国誓反教徒；爱尔兰人不但丧失了财富，连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违反正义的高压政策延至十八世纪末叶，终不能使顽强抵抗的爱尔兰人屈服。

## 结 论

在十六世纪末叶，欧洲大致可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区域：南为天主教，北为誓反教。路得派在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占优势，加尔文派则夺去了瑞士、荷兰及苏格兰；至于英格兰呢，则是硬性杂揉的混合体。他们也渗入了法兰西和匈牙利，但未能命令大众信奉；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坚决拒绝誓反教侵入；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正教也没受改教的影响。除了轻微的变动以外，各教派这种分配的情形至今仍维持旧状。

无疑地，改教的领袖们都怀着一种严正的思想，就是希望使宗教的一切虔诚举动都恢复福音的精神，成为一种更纯洁更内心的宗教，尤其要强调天主圣宠的能力。照路得的想法，一切问题都在罪恶与圣宠的对立：人常犯罪，而且不可能不犯罪，天主看在耶稣基督面上宽恕我们；所以只须信赖救主和祂的仁慈便够了。至于加尔文呢，骨子里是同样的理论，不过他特别强调造物主的普遍统治权，而为一一切的主宰而已。

然而统观十六世纪改教的全部历史，有一件事不能不使人认为遗憾的，就是在改教的过程中，政治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德国、瑞士、丹麦、瑞典、抢掠教会的财产认为是促成誓反教成功的主要因素，然而贫民百姓并未得沾润，誓反教却使王侯们更肥了。

另一方面，誓反教徒并不比任何人更懂得容忍，君王以权力勒令属下崇奉新教，他们变成了国教的元首；然而福音所给人带来的大进步之一，却是政教分离啊！（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

誓反教的基本特点，是想抛弃天主和人类之间的一切中介，解释圣经不是教会的事。为获得光照，只须以信仰的眼光阅读圣经便得，不需要任何媒介：这是誓反教徒所持的态度。这样便在教会内产生了主观派；自由讲解圣经的自然结果，便是产生各种不同的解释，因而导致无数的派别；这种现象，自改教的开始便已显明：路得和自己的门徒，在教义的许多点上发生过争执，而他的门徒们又彼此对立，于是路冲动了；他自以为得了天主的光照，可以解释圣经，并批评天主教的道理，可是他不准人批评他的道理；加尔文也是一样。这样一来，是把路得、加尔文等对圣经的解释，代替了圣教会的解释……抛弃了教会传统的权威，而建立了许多其他的传统；这些传统却非上承宗徒，而是来自后人的。

基督的圣意是要祂的门徒合而为一，而改教最显著的结果却是破坏奉教世界的统一。人不免就要追问这种分裂的责任应由谁负了。伯雅 (Bea) 枢机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下面的话：「对这个问题，曾经屡次声明过：天主教自己负起了这个分裂的责任，为此她应该怀着忏悔的心，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一想这些分裂是由于自爱，骄傲或由于拒绝尊重吾主的教

训：『你们该向我学习，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无疑地要感觉非常痛心。然而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说的天主教；并非指教会全体，是教会的一部分人员，是那些过去几个世纪领导或管理某处教会或整个儿教会的人，或者更好说是曾生活于教会中的人。

再一说，也不可把信仰的责任和道德的责任混为一谈。教会在道德方面当时实在需要革新，然而在教义方面，她仍旧被圣神领导，实际也没犯过错误；她是不能错的。

何况我们今日也没权裁判那些早已作古的人；让天主自己去裁判吧！分裂以后的人，在这宗教正确灵感的纷乱中，有人情的偏私和卑鄙的自身或政治的利益在作祟，已不易认清当时的真面目；实在也无法衡量每人所应负的责任。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为重获那失去的致力吧！这是一切基督徒，一切领受洗礼者的合一。」

注解：

- ①按照天主教的道理，大赦是圣教会交给信友们运用的方法，为帮助他们补偿自己的罪过。吾主耶稣，童贞圣母和诸圣者的功劳构成了一个神恩的宝库，委托给教会管理支配。教会能规定若干条件，如念经、施舍或行其他善功，使信友能分享这些宝藏，把吾主和诸圣富余的功劳贴合在自己灵魂上。所以凡满足了规定的条件的，便能获得大赦。当知大赦并不能赦罪，只是宽免罪过所应受的暂罚，就如本人实行了重大的补赎一样。一大赦的根据是「诸圣相通」，就是教会的各个肢体都能分享共同的财富（神恩）。
- ②这就是所谓的「重洗派」(Anabaptist)，他们声言婴儿的洗礼不妥；所以凡在孩提时受洗者，一律当重受洗礼。
- ③誓反或抗议(Protestants)一词，虽只代表消极反抗的一面，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在西方各语文中仍保留使用，代表自十六世纪改教以来的各教派。在中国他们自称「基督教」，其实基督教(Christian 或 Christian Church)一词实包括一切信奉耶稣基督的教会，连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包括在内。因此我们不得不暂用「誓反或抗议教」一词，以免误解。
- ④按天主教的法规，两位已受洗的男女之间的既遂婚姻，除非一方已死，绝对不能离异；教宗亦无权解散。倘某项婚姻外表视为有效，但经合法的手续证实，结婚时因某种阻碍存在而根本无效者，教会有权声明其为无效；不过在此种情形下并非教会解散婚约，只是证实婚约根本未曾成立而已。亨利明知此点，声称加大利纳系他的嫂嫂，有婚姻的阻碍，因此婚约不妥。其实教宗儒略二世(Jules II)早已解除了这项姻亲的阻碍。
- ⑤二位殉教四百年后，教宗比约十一世于一九三五年将他们

列入圣品。

- ⑥一名加尔文教徒名帕克尔 (Matthew Parker) 者实被任命为坎特布里总主教，但祝圣他的那位主教本人所领受的祝圣礼是否有效，其属可疑，他根本不信神品圣事。但安立甘教会的一切神职人员都由帕克尔及他所祝圣的主教而来；这是主要的问题。如果帕克尔的祝圣礼无效，那末自一五五九年至今，所有安立甘教会所付的一切神品圣事自然全属无效了。所以教宗良十三世对英国教会付神品的实在情形深入调查之后，乃于一八九六年声明全属无效。
- ⑦坎庇恩于一八八八年被教宗良十三世册封为真福。伊维林·瓦夫 (Evelyn Waugh) 为他所写的行传，光启出版社有中文译本。

## 第十三章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的革新

### 概 观

前章我们已叙述了所谓「誓反教改革」的情形(其实正好说是「改教」,因为在天主教以外创立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督教派)。这时在圣教会内部也正从事一种革新运动,结果给因中古世纪末叶和文艺复兴的动乱而衰颓的教会,加上了一种活力和焕然一新的气象。为清晰起见,我们不得不分别叙述这两种改革,实际上它们却是同时并行的。人往往误认天主教的改革,是誓反教改教的后果,时间也在以后;那实在是一种错觉,至少难免头脑冬烘之讥,与历史的事实完全不符;至多能说誓反教的改教给了教会改革工作一种刺激,使它加速进行而已。①

十六世纪表现教会活力最明显的是修会的蓬勃兴盛,有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修会,也有重整的修会;实在是当时兴起的大批正牌的圣人,也是向外方传教最澎湃的时期。天主教革新的工作,由特利腾大公会议获得了决定性的推动,使圣教会的纪律更明确而坚定了。

### 壹 自发的改革

#### 新 修 会

教宗良十世在位时,在路得尚未闻名以前,已经有些热心人士,包括神父和有学问的教友,在罗马团结起来,开始发起教会革新运动。他们共同组织了一个「神爱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最初的目的只是以勤领圣事,习行爱德,树立善表来刷新自己的内修生活。其他类

似的团体也在意大利和其他各城纷纷成立起来。在这些团体中培植了许多对革新教会最有影响的人物。

神爱会形成了一种很热心的气氛，但没有稳定的组织；为使它的影响能向外展开，必须获得更大的团结力才成。这种思想启示了两位成员，一位是温良的加耶坦 (Cajetan of Tiene)，一位是性急的伽拉法 (John Peter Carafa) (他后来被选为教宗，取名保禄四世)，他们更创立了提阿停修道会 (Theatines)。

在教会历史的各时代，常有新兴的修会，以适应新的需要。以前的修士，多是隐居修院中，同外界很少来往；于是十三世纪有方济各和道明二会的兴起，便与教友接近得多了；他们肩起了布道和在大学中教授的责任，但他们所树立的德表，对本堂区神职人员并未能发挥激励的作用；好象要作一位虔诚而积极的司铎，必须先作一位会士不可。在教会的缺陷中，神职界缺乏真正的内修精神，和他们拥有过多的财富，确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创立提阿停修道会的人所得的灵感：他们所抱的观念是要会中的神父们如同一般会士一样要发神贫、贞洁、服从三愿，却生活在教区的神职界中；服装生活和他们一样，帮助他们尽教会的职务，努力作标准的神父；庶几能以自己的榜样来吸引他们度更热心积极的生活。

提阿停会员正符合这个理想；他们的人数虽然总不很多，但热情蓬勃，从他们中选拔了二百多位主教，在他们的教区内提倡革新。

这种修会生活证明适合当时的需要，因此有许多同样的修会同时兴起：例如圣安当匝加利亚 (St. Anthony-Zaccaria 一五〇九—一五三九) 所创立的巴尔纳伯

会 (Barnabites)，圣热罗尼莫·爱尔连( St. Jerome Emilianian 一四八一—一五三七)所创立的索玛斯克会 (Somaschi) 等。

但这些修会并未发展到意大利以外，与向外特别发展的耶稣会不同。

### 圣依纳爵劳耀辣

耶稣会祖依纳爵劳耀辣 (St. Ignatius of Loyola) 于一四九一年生于西班牙北部一个信德很深的天主教家庭。他在年轻时从未想过度修会生活，只是醉心名利，想在军事上崭露头角而已。三十岁时率领一支军队英勇地保卫旁普罗纳 (Pamplona) 抵抗法军，为炮弹折股；他为此吃了很大的苦，因为他接受手术不只一次：第一次接骨痊愈后，发现接得不对，不但要变成瘸拐，而且甚不雅观，为此他命重行手术。他在漫长疗养的期间，为了消遣解闷，他要求家人给他找些小说之类的读物，但除了耶稣和圣人们的行传，一时找不到其他书籍。他阅读这两本书使他认真地从事反省，于是感觉在心灵中有两种强烈的思想交战起来：是追求世间的荣耀呢？还是效法圣人们英勇的榜样？他本善于作心理的分析，于是便细心衡量这种内心的交战，而他这种分析的能力为他将来的事业也大有裨益。最后他下了决心，要摆脱世俗而追随基督，并为基督去争取人灵。

### 「精神训练法」旧称「神操」或「灵修法」

但依纳爵深知传教救人的第一个条件是自身内部的彻底革新。因此他先去著名的蒙赛拉 (Montserrat) 圣母堂，退隐在无人的岩穴间准备一个总告解；然后把华美的衣服和佩剑脱去，在一山洞内隐居了十月之久，专心祈祷作严

厉的补赎。天主也赏了他丰富的神光。那本「精神训练法」小书—「神操」就是在这时构思而成的；那在他和他的门徒手中实在是一具征服人心的利器。「精神训练法」是一连串精心结构循序渐进的默想，能清洁人灵，准备遵循天主的意旨，增进爱主之心。根据数世纪的经验，证明这种训练方式确有改造人灵之力。②

### 创立耶稣会

依纳爵编写「精神训练法」时，决没想创立修会，只是准备个人去宣讲基督而已。他首先要实现他那朝拜耶路撒冷圣地的志愿。继而一想，为能使人灵实沾神益，非研读神学不为功。他虽年已三十，却以惊人的毅力，杂在少年中，在课堂开始学习辣丁文；以后攻读哲学神学；最后赴巴黎，于七年之中顺序完成了学业。

在巴黎，他的圣德吸引了几位同志；他便按照「精神训练法」使他们作退省以陶冶他们。不久同志已达七人，他们都终生追随他未变；其中有伯多禄法倍尔神父(Peter Faber)，还有一位热血沸腾的青年，后成为当代最辉煌的传教士，就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七位同志于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同赴致命山上的一座小圣堂，矢志神贫贞洁圣愿，并约定在完成教育后三年之内到耶路撒冷去为拯救人灵而工作；如遇阻碍不能成行，则听凭教宗措置。

他们在维尼思候船去巴力斯坦，空等了一年；于是按照所发的誓愿前进去谒教宗；当时教宗乃保禄三世，是一位对教会革新极具热心的人；他很快便认清了，依纳爵和他的同志们为服务圣教会所能获致的神益。从一五三九年起，依纳爵和他的同志们便决心组成一个修会团体，定名

为耶稣会。教宗立即予以批准。

从此依纳爵便从未离开过罗马；一方面领导他所创立的修会和他派遣到欧洲及世界各地的会士，一方面致力编写会宪；他深然当时的需要，恰到好处地订定了新修会规条的细节。耶稣会阶级组织严密；由大会选举的总长为终身职，会员须严格服从；但依纳爵同时也要求长上们，以慈父的态度施行管理。最特殊的一点是在修会的三愿之外，显愿会士另发第四愿，即特别服从教宗的圣愿；听任教宗按照圣教会的需要，派遣至世界任何地区。

所以耶稣会就象一支军队一样，常准备着应召去给教会服务。这又是圣依纳爵所首创的一个重要的革新。在他以前，一个不天天在圣堂内公诵日课的修会，简直是不能想象的。耶稣会士只是同一般的神父一样私下诵念日课，不负任何定时的集体工作；他的一切时间都该贡献给他所从事的传教、读书和祈祷。这个新型的修会不与世隔绝，轻快活泼，随时可动员出发，与近代的需要非常适合，后起的修会往往以它为法。

### 耶稣会的发展

依纳爵原想用他的会士去到外方传教，并在欧洲挽回教友的热心；实际上他们已从事宣讲和指引人灵的工作了。但最重要的却是当对付誓反教的进展。教会的衰颓源于神职界的衰颓；因此欲革新教会，也得由革新神职界着手。依纳爵乃于一五五一年建立「罗马学院」(Roman College)，栽培罗马的神职人员，同时也栽培本会修士。一五五二年又为来自德国的修士创办了日尔曼学院(German College)；由其中出身的神父对阻止其本国誓反教的蔓延出力不少。

这样又形成了耶稣会的另一宗旨，即从事教育。为复兴教会当由青年开始，不但准备晋升司铎的青年，在俗的青年也非常重要。十六世纪后半期，耶稣会士在全欧已开办了上百的公学，贫寒子弟可免费，其他则应缴纳学费。这些公学对复兴教会的功效真是难以数计。

当依纳爵于一五五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罗马逝世时，已有会院一〇一座，会士一千名左右，分为十二会省。在欧洲以外，耶稣会的传教士已进入印度、巴西、日本和埃底约比亚等国。以后继续发展，六十年后已有三十七会省，会院四三六座，会士一万三千名。

### 老修会的重整

我们叙述新兴的修会，很易使人相信老修会都已废弛，其实不然。本笃会、奥斯定会、方济各会都正计划重整；而且由方济各会又产生了一个新枝：即嘉布遣会(Capuchins)③；由他们严肃的生活，神贫，对贫穷人的爱德，以及瘟疫流行时对服侍病患者的热情，很快便普及民间；此会发展得很迅速，成立得很迅速，成立百年之后，已有会士三万。

### 女修会——乌苏拉会

女修会也加入了复兴运动。有些新修会形式的原则与新兴的男修会相近。直到此时，所有的修女都是隐居修院，从事默观生活。自十六世纪始有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的修女出现。其中成绩最著的是圣安日辣迈利祺(St. Angela Merici 一四七四—一五四〇)在意大利为教育青年女子所创立的乌苏拉会(Ursulines)。她们对青年女子的工作，正和耶稣会士在公学中对青年男子所做者相同。直至十六世纪，除少数城市中的女子及贵族少女外，大多

数女子都很少受教育。乌苏拉会修女对青年女子，无论贫富，都尽量施以教育；幸赖她们及其他类似的女修会，女子的教育始在社会各阶层中展开。

## 贰 特利腾会议

当路得高举改教之旗时，罗马正完成了教宗儒略二世和良十世为改革教会所召开的拉特朗第五届会议。不过正象我们上面所说过的，这次会议虽然有不少的规定，却几乎无任少具体的成就，原因是缺乏良好的气氛。为实行改革，专靠决议案是不够的，尚须被接受而付诸实施。圣人和修会所自动实行的改革，确能创造良好气氛，人必须先口服心折，才能践诸实行啊。再说无论何种决策，不由教会最高当局推动，决不能令人奉行；但自这一世纪以来之各位教宗一连其私德不足为法者在内，一并非没顾到这点，只是缺乏毅力而已。在路得于一五一七年改教后，又等了二十八年之久，始召开会议卫护教义，重整纪纲，振兴人心，防止流弊。以如此紧急的事项为何竟这样迟缓？除当局的颀顽懦弱外，尚有召集会议的重大阻碍。

### 亚德连六世的失败

继任良十世的，是一位对改革满怀善意而又具热情的教宗，也是最后一位非意籍的教宗：就是亚德连六世(Adrian VI 一五二二—一五二三)。他是荷兰人，曾为皇帝查理五世的西席，意志坚强，严肃得几近僵硬，生活质朴而克苦。他开始改革罗马教廷的流弊；但因不明了罗马的习惯，未免矫枉过正，与教廷已深的积习格格不入，以致全盘失败。假如他在位较久，再能不操之过急，或者尚有成功的希望，无奈他在位仅二十个月便弃世。

## 格拉孟七世—罗马的浩劫

亚德连六世的继位者为格来孟七世(Clement VII 一五二三—一五三四)，他对于改革却没有前任的毅力。他的操行可说无瑕可指，而且热诚可嘉，曾为翡冷翠卓越的总主教，即位之后，对新兴的修会奖励不遗余力，无奈赋性柔弱，意志不坚，未免朝三暮四，以致在位一年无成，且招致了许多不幸。他对政治的配合过分信赖；当德皇与法王互相衝突时，他竟联合法王与德皇作战，结果给罗马和他本人招来了严重的浩劫。皇军内有一部路得教派的佣兵，于一五二七年攻入罗马，大事劫掠，亘七日之久：教宗宫殿被洗劫一空，圣堂被褻渎，圣伯多禄大殿被充作马厩，枢机被殴辱，修女遭狂暴，司铎被杀戮或被卖为奴，真可说是无恶不作。甚至有些为父的宁手刃其亲女而不忍见其落于乱兵之手。这种蹂躏直至无可抢掠无可毁灭时始罢。教宗本人形同囚犯，卑躬屈节地向德皇求和，接受了最残酷的和平条件。

罗马这次浩劫对当时的人心打击甚巨；咸认为是天主的严厉警告，是对已往的腐败及迟不改善的惩罚。这是一次有益的教训，是使教会、教宗及其参谋人员觉醒的一个晴天霹雳，当头棒喝。于是咸认为只有迅速召开大公会议，始能有效地实行所期待的改革。然而格来孟七世至死(一五三四)未作任何决定，面对着种种困难，缺乏所需要的毅力，论者惜之。

## 保禄三世召集会议

格来孟七世所未能实现的，他的继承人保禄三世(Paul III 一五三四—一五四九)却予以完成。他有亚德连六世的毅力，且手段灵活而敏捷，终于克胜了一切困难。

他年轻时行为有些不检，升任司铎后始纳入正轨。他酷爱艺术豪华，且迹近奢靡，故对「文艺复兴」甚表积极；但对教会的改革也堪称为伟大的创始人。他不仅能看出症结之所在，且能不顾年老多病，毅然与困难奋斗。

为确保得力的助手，并准备继承他的事业的适当人选，教宗首先挂心的是卓越的枢机，并由其中遴选担任改革的委员会人员；但他最大的荣衔则是准备并召开了特利腾会议 (Council of Trent)。

若看当时困难的重重，几乎令人相信召开会议决难实现，只不过停顿于计划与希望的阶段而已。私人的利益、野心、难返的积习，在在都与改革为敌。凡想利用流弊混水摸鱼的人——连教廷的内部也不例外——都暗中抵制召开会议；甚至有人怀疑新会议将使巴塞尔 (Basle) 和康和坦士 (Constance 前译公斯当思，今改从通行译音。) 会议时对教宗无上神权的争执，死灰复燃。而且誓反教徒只在难以接受的条件下始允参加。何况当时政治的情形也不乐观；奉教的欧洲正在土耳其进侵的威胁下喘息。然而主要阻碍还是来自奉教的君主；其中两位便是德皇查理五世和法王方济各一世，他们的国土占了奉教世界的绝大部分，不得他们的同意大公会议实际上是无法召开的。但在这两个巨头之间却存在着不能和解的敌视；怎样邀请两个对立的君王协商共同的问题呢？何况他们二人对教宗的计划都持反对的态度：方济各一世是为了和他同盟的诸侯——德国的誓反教诸侯——采同样的态度；查理五世呢，起先赞同教宗的计划，以后他希望自己在德国建立宗教上的和平，随即表示反对教宗召开大公会议；大概他所计划的和平是要对誓反教徒在教义上让步。

只选择开会地点的问题便引起了普遍的反。誓反教徒对在德国境外开会表示坚决反对，无商讨的余地，德皇也坚持同样的意见。教宗当然坚持在德国境外开会了。最后经过了长期而慎重的磋商，才选定在特利腾 (Trent) 召开。该城隶属德皇治下，但居民为意大利人，位置距意大利的边疆很近，可以保障教宗的安全。

就在这样恶劣的情形下，在欧洲被仇恨纷争四分五裂之下，保禄三世硬要召集公会议。几经试探全归失败，最后由于他百折不挠的忍耐与固执，并由于他那灵活的外交手腕，在九年不断的努力后，终于达到目的：特利腾大公会议于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开幕了。但在一五四九年竟因瘟疫流行及与德皇的冲突，迫使会议中途停顿。保禄三世也在同年逝世。

### 儒略三世重开会议

保禄三世的继位人儒略三世 (Julius III) 曾在特利腾会议初期作过教宗的代表，于是即位后便急于一五五一年重开会议。但次年政治情势恶化，又被迫停止工作。

继任儒略教宗的玛塞尔二世 (Marcellus II) 大德不凡，使人对他怀着最大的希望，可惜他于即位后二十六天便与世长辞。

### 保禄四世

继任者为枢机贾拉法 (Carafa)，取名保禄四世，是一位热心而严肃的人，并以全力来从事改革 (我们曾见他如何为改革而创立了提阿停修道会)；但他虽年已八十，激烈的性格却曾不稍减，人深怕他可能僭事。他是一位独往独来的人，除自己的权力外，决不容忍其他权力的存在；他对重开会议不感兴趣，他宁要独力来实行改革。为

了对异端加强斗争，他改组了异教裁判法庭，付以极大的权柄。同时，为防范信友免受不良书籍的影响，他更编制了禁阅的书目；这是「禁书目录」(Index)的第一编。他深知邪说对思想危险的严重，而一般教友又不易发现它的毒素，为了保卫羊群的信德，乃竖起了栅栏。在此点一如在其他各点一样，这位严厉的改革家及有时未免矫枉过正；所不能否认的，是教会的领袖有权利也有责任防卫自己的信友不受危险刊物的侵害。

这位改革家的教宗也受了最残酷的屈辱。他曾把教廷的行政权委任给他擢升为枢机的一位侄子管理，以便自己全心从事改革。这个纨绔子弟实有负他叔父的信任；他利用职权来纵情肆欲，压榨善良。一旦事机败露，秽声四闻，教宗又对他严加鞫讯；于是把他侄子及一切与他共犯的家人完全抛弃，以克苦补赎去度他的余生，以洗刷他身为罪魁的罪恶。保禄四世于一五五九年善终；但他那过火的严厉实在使他大失人心。

### 比约四世结束会议

继位的比约四世(Pius IV)对改革工作比较缓和。他把一位才德兼优的外甥召来作自己的助手，他这位外甥已于二十二岁时被升为枢机。文艺复兴时期，教宗每将自己的家人擢升为枢机，实在是最不智而又对教会最惨痛的流弊。但比约四世这次选拔他的外甥嘉禄鲍劳梅(Charles Borromeo)，却堪称「内举不避亲」的功德无量的措施；鲍氏真是教会改革的一员伟大健将。

比约四世的大德政是续开特利腾会议，并使之圆满结束。停顿了十年的会议乃于一五六二年重开，次年十二月四日隆重开幕。比约四世对此重大的事业本可引以自豪，

但当人庆祝他的成功时，这位充满智慧的人物却简单地回答说：「一切都成于天主的感召。」

### 特利腾会议的重要

既然由果实可以判断果树的好坏，自然由成效也足以衡量特利腾会议的重要了。在教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会议解决，如此多的问题，确定了如许的教条，制订了那样多的法律。

德皇查理五世和其他的人，为了和平起见，希望会议对教议中与誓反教分歧之点不加讨论。然而教宗们对此点决不能接受：和平不能用牺牲吾主所启示的真理去获致！教会是这些真理的委托保护人。誓反教的改教，深深地影响了教友们的思想；因此最重要的是澄清教会传统的道理；另一方面必须实施对教会的首脑和其肢体所久已期待的改革，重建已被动摇的固有纪律。所以特利腾的决议案有关于教义的，也有有关纪律的。

### 教义的规定

公会议并没有制造新道理，只是对教会传统的信仰规定了清晰而确切的方式而已。誓反教徒说人借天主的圣言—圣经一同天主直接接触，便能明了天主的启示。大公会议说明圣经当遵照传统的解释，就是根据教父们的著作、历届公会议的规定及全教会一致的教训。公会议拿团体主义来针对誓反教的个人主义：是圣教会把圣经传授给教友，让他们采取其中的一切果实，除了慈母教会所给的解释以外，谁也不能给予其他的解释。同时公会议还确定了圣经的书目，即何书为天主所启示而组成全部圣经。

然后公会议更针对着誓反教的中心思想，坚决地说明了「成义」的问题。它在坚强有力地阐明了人性的极端脆弱

和天主的无限仁慈以后，确定了圣宠在回心向天主的罪人灵魂上的作用。公会议比路得更有力地说明，罪过只能借吾主耶稣的功劳才能获得赦免；然而它也说明了那些功劳有充分的能力，能使悔改的人获得真实而内在的革新。这是圣若望和圣保禄描写圣宠的功效时，所说「罪过的赦免和灵魂的复生」的真正意义。

路得和加尔文只承认圣洗和圣餐两件圣事，公会议说明吾主耶稣建立了七件圣事，并指定了每件圣事的礼节和它们在救灵的过程中所占的地位。

从此以后，教友对圣教会所宣布的真理，和她明定为信条的，再不准有所怀疑加以辩论了。

### 纪律的规定

圣教会所受的大部灾害，都由神职界的堕落而来，因此公会议首先所努力的是神职人员的革新。

最严重的流弊之一是主教们往往遗弃自己的教区而驻节罗马或王宫内，教区的收入归他们享用，治理的责任则委之属员。公会议乃规定主教及隐修院院长有住在自己羊群——教友或修士——内的严重责任；一人既然不能同时住在多处，因此将往日一位主教有数处主教公署的最大流弊，予以取缔。为对自己的教友更加认识起见，主教应当每年亲身或派代表巡视每个本堂区。

教会不但需要良好的司牧，也需要有才有德的神父。谈到特利腾会议，有人说，即使它没有做别的，只建立了修道院制度，也算完成了一件为教会最有益的大事：这话极有道理。

恐怕有人要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直到一五六三年教会从未想过如何陶冶自己的神职人员吗？以前是怎样作

的？在圣教会初兴的几世纪中，服务某堂区的青年人常帮忙主教神父尽教会的职务，这样由实习便逐渐学会了栽培望教者，讲解圣经，施行圣事。中古世纪时，在主教座堂和隐修院附近，都建立了学校；以后在各大学内又设立了哲学神学和教会法典等科的讲座。不过只有将来领受司铎品的少数人能接受这些学科，他们普通的生活和其他学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并没有什么当遵守的纪律；神职人员的陶冶都由主教们相机处理，一般说来是不够的。到了特利腾大公会议时，流弊已彰明较著，为害已深。因此为改善教友的生活，应由改善神职人员的生活着手。会议规定：教区应开设学校，以收纳有志服务教会的儿童；贫寒子弟得以免费收录。青年在这样的学校内——修道院——除接受理智的坚实陶冶外，尚该攻读教会的学科，并接受品行的训练，以便能善尽神职。

这项规定当然只能逐渐付诸实施。但历年由其中所产生的效果，开始时虽然看不出来，实际上却是难以数计的；因为在修院中培植神职人员，实在是天主教组织中最基本的一点。

对于非神职人员，公会议特别强调了婚姻的不能拆散性。不在本堂神父和两位证人前所缔结的婚姻，不但被声明为犯禁，且属无效。最后它还严禁世俗君长干涉教会的事情。

公会议对誓反教所攻击的圣母和圣人圣女的敬礼，也恢复了它应得的荣耀，只是防范失之过当或走入歧途而已。它也确定了关于大赦的道理，但为避免流弊，它禁止在放大赦时收受金钱。

## 结 论

特利腾会议可说对教会的思想和生活，普遍检讨了一番；也是教会在这动乱时期的一个最幸运的创始。一位誓反教的历史家让克 (Ranke) 公正地承认：「公会议那样奋勇地大声急呼，持续了那么久，被迫停顿了两次，遭受了世俗所兴起的暴风雨的袭击，第三期时已战胜了新的危机，终能在天主教的世界普遍的谐和中结束…从此天主教要以加倍的力量和返老还童的姿态，在誓反教的世界面前屹立不摇了。」

圣座的权力在特利腾公会议后也更加强大了。会议得以召集，又能不顾种种阻碍顺利完成，不能不归功于三位教宗的能干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们虽不是圣人，却深明自身的责任和教会的需要。他们都没有亲身与会，但始终由教宗的代表主席。而且教宗本人在有关信条和圣经的解释上，常被视为最高的权威。会议为表示对耶稣基督的在世代表服从起见，在闭幕典礼时要求教宗，批准所作的「议决案和训令」。

以后我们要看，公会议后天主教的全面复兴和繁盛了。

### 叁 天主教在特利腾会议以后的革新

如果特利腾会议的决议案，仍象五十年前的会议一样决而不行，成为具文，为圣教会便没有什么用处。所以现在当作的是使它渗入实际的生活。庆幸这次教会的革新工作已有了成果。一连几位教宗，伟大的主教和修会的会祖或重整者们，其中有不少正牌的圣人，他们都作了教会

革新的发起人。

是宗座主张召开的会议，也是他领导完成的；会议后的成绩自然也得教宗们施行和保持。

会议是在比约四世在位时完成的，也是由他批准公布的，并在他的外甥圣嘉禄鲍劳梅赞助之下付诸实施。他建立了一个枢机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他又命令编撰了一篇信德誓文，至今所有的主教、本堂神父及大学教授，在就职前仍当宣读。他也建立了修道院，修改了典礼书。特利腾所决定的革新确实已于他在位时着手实行。

### 圣比约五世

比约四世逝世后，枢机们选了一位颇具权威，热心出众，并曾任异端裁判所最高裁判的道明会士继任。他取名比约五世(Pius V)。这次选举最为美满，因为比约五世是一位圣人，于他在位的六年期间(一五六六—一五七二)他严格执行了特利腾的决议案。教宗呼吁枢机和主教们树立善表，应常驻在教区内，并应时常巡视教区，建立修道院。他曾多次严厉地训示他们，甚至使他们冲动，但未有敢违抗者；因他以身作则，躬亲巡视罗马各堂区。在梵蒂冈宫中他仍严守着会士的惯例，有时澈夜祈祷；他那刻苦的生活竟成了他宫廷的公规，一切可视为奢侈者均予以革除。

同时他也推动编辑及出版会议认为必要的书籍，如「特利腾教义」，以辣丁文清晰正确地阐明圣教会的道理，此书立即被译为各国语言；此外也修订了日课和弥撒经书。比约五世的弥撒经书流传至今无大变化。他也出版了圣多玛斯的「神学纲要」(旧译超性学要)，并钦定他为教会圣师。

除整顿神职界及隐修院外，比约五世并从事于攻斥异端的斗争，及保护教友抗拒回教徒的艰钜工作。

### 勒邦特的胜利

占据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和他们在地中海上劫掠的舰队，为奉教的欧洲是一种长期的威胁。起初人都认为他们所向无敌，嗣后更误信无法战胜，只是希望最多能延缓其前进而已。奉教的国家，虽常热衷于独立自主，可惜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总未能团结一致。比约五世乃重拾十字军的理想，使西班牙、维尼思及圣座联盟，共同组成了一支舰队，委嘉禄五世之子董欢 (Don John of Austria) 为司令。但教宗为打击教会仇敌的骄傲，依恃天上的助佑胜于军队的武力；命令全教会的人虔诚祈祷。

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教宗正在同枢机们共同工作，忽然受到灵感，便停止了工作，打开一扇窗户，注视着东方喊说：「我们暂时停止工作去感谢天主吧！奉教的军队适才获得了一个大胜利。」果然数日之后，捷报抵达罗马，证实了教宗的言词。原来十月七日午后一时，奉教的舰队在希腊的勒邦特 (Lepanto) 海湾与土耳其舰队相遇。司令手持苦象鼓励士卒，遂开始进攻；鏖战四小时，为过去的胜利所麻醉的傲慢敌人卒被摧毁，船只或沉或俘，无一幸免，从此一蹶不振。

因了奉教国家彼此的嫉视，虽未能由这次大胜利获得所能由这次大胜利获得所能期待的一切效果，但土耳其侵略的凶焰暂被粉碎，教友的信念也恢复了新的精神。

比约五世却将此次胜利归功于圣母的转求，并于十月七日建立了圣母玫瑰瞻礼，以资纪念。

### 三位革新的教宗

额我略十三世 (Gregory XIII) 继续圣比约五世的工作，但稍为保留。他创建或庇护了委托耶稣会士管理的二十三座修道院；他的名字至今仍在著名的「额我略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 中永垂不朽。

额我略的继位者是一位出身极贫的方济各会士，取名西斯都五世 (Sixtus V 一五八五——一五九〇)，外号「可畏者」。实际他也真是一位坚强不屈的人，令出必行，十分严厉；不过他的治绩很好，他五年的在位期间，对教会的革新实现了很大的进步。后世将他列为「大教宗」之一。他将枢机的人数定为七十名，甚至若望二十三世始行变更。他把罗马圣部 (Roman Congregations) 确定为十五：九部管理教务，六部管理政务。他也同他的前任一样，对外方传教事业多所鼓励。他将罗马城美化，增加了许多建筑。

此后的三位教宗在位都不久，好似昙花一现，未能有所作为，革新的工作留待格来孟八世 (Clement VIII) 去继续。他极热心，刻苦自励，俨然一位隐修士，常邀请穷人与他同桌共饭；但他也是一位作事能力很强的人。他所选拔的枢机都是卓越不凡之士，并完成了修订典礼书籍和辣译圣经「通俗本」的工作。

### 革新的主教

在从事革新工作的人物中，主教们实担任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教会复兴的事业上实为教宗最良的辅弼。其中最堪特别纪念者有两位：一是圣嘉禄鲍劳梅 (St. Charles Borromeo) 一是圣方济各撒肋爵 (St. Francis of Sales)。

#### 一、圣嘉禄·鲍劳梅

当比约四世努力完成特利腾大公会议时，罗马有一位二十五岁的卓越人物，在教宗身边坐着第一把交椅，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比约四世的外甥嘉禄·鲍劳梅。他在升神父以前，便被升为枢机，担任宗座国务卿的职务。他虽富贵尊荣盛极一时，生活也可说是富丽堂皇，但能富贵不淫，足为人所矜式。他当时已是米兰教区的统治者，实际有人代理，他只保留着名衔而已。一六六二年嘉禄的长兄去世。许多亲族劝他放弃教会的职位，回家结婚延续家族的血统。但他却采取了相反的决定，一心服务教会；于是晋升司铎，并被祝圣为主教。他把公会议中一位主教所说：「杰出的枢机，需要杰出的革新」这句话，贴合在自己身上，尽力缩减执役人员，放弃一切娱乐，更加减睡苦身。特利腾公会议规定主教当在教区驻守；他便以身作则：辞去罗马教廷的重要职务，以便对自己牧灵的职务全力以赴；并以其全副的毅力将特利腾的议决案付诸实施。他不辞多方的劳瘁去巡查他那广泛的教区，连山野最偏僻的本堂区也不遗漏。他还时常讲道，建立修道院，恢复了修会原始的纪律，创建了无数的教育机构和慈善事业，组织了讲解教义的机构；并为此征求新修会的协力合作。他也为他教区的神父们创立了一个协会，他还召集并主持了十七次教区或省会议。

他虽出身贵显，事务繁重，生活却异常严厉；他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变卖，以便救济穷困的人。特别在一五七六年蹂躏米兰的一次惨烈瘟疫流行时，更彰显了他那无比的爱德。他不避传染去探病人，安慰他们，给他们付圣事，分施救济品；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施舍了，连家具床铺也没有保留；从此他每夜只在椅子或一块木板上睡两三小时。

嘉禄·鲍劳梅的影响，远达米兰教区以外。他曾被任命为宗座巡阅特使，去巡查并督导革新的工作。他因操劳过度，加以严斋刻苦，力量消耗殆尽，终于四十六岁便不支去世。他的善表照耀各处，他著作的影响尤其广远。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说：「他的事业影响了那整个时代，致使人称为『圣嘉禄时代』，而他那个时代甚至因主的祝福还在延长着，我们希望它将来更延长下去。」

## 二、圣方济各·撒肋爵(一五六七—一六二二)

方济各·撒肋爵(St. Francis of Sales)小圣嘉禄三十岁，生于萨伏衣(Savoy 是介于法、意中间阿尔卑斯山中的一个独立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父亲希望他作一名法律学家和参议员，并曾送他到巴黎和帕度亚(Padua)去读书；但他却选择了神职。升神父后几个月，他便不顾危险，志愿献身去日内瓦湖南面布满加尔文教徒的地方去传教：在六万居民中只有一百多名天主教友。他在冬季开始了布道的行程，先在小村中讲道。他两脚冻裂得流着鲜血，仍到处传布福音。某夜为逃避狼群他爬上了一棵树，几乎冻死，次日才被乡民抬至家中。没有什么人敢去听他讲道怎么办？他是近代报人的前驱，他把演讲印在活叶上，到处散发张贴。人终于被感动了。牧师们避免和他辩论，他却追着他们不放，甚至誓反教的罗马一日内瓦一去攻击他们；于是成效大著，回头者日增；被关闭的圣堂又重新开放了。不久全部地区又都返回了圣教。这是他四年坚强劳力的结果，只有真理的力量和一位圣人的良善才能获致如此的成就。

良善实在是他性格上最突出的一点；他说：「用一滴蜜比用一桶醋逮捕的苍蝇更多。」但这并不该使我们忽略

他那神灵修养的另一面：他一经决定了目标，便以百折不挠的毅力一直向前。当他的父母对他所决定的职任表示骇怪时，他宁愿对他敬爱的人显得冷酷无情，而不愿对自己的理想不忠实。

一六〇二年被任为日内瓦主教，但在那弥漫誓反教气氛的城内无法安身，乃住在安锡 (Annecy) 小城内。从此二十年之久，以不眠不休的精神，尽了特利腾所规定的主教职务：诠释教义、讲道、栽培神职人员，改革松弛了的隐修院。一六〇四年与圣若翰纳·尚达尔 (St. Jane Chantal 一五七二—一六四一) 寡妇相遇；便作了她灵修的领导人，并同她合力创立了慰问会 (Order of the Visitation)。当初的观念很新，欲以对越生活和自由出院慰问贫病的生活而合为一。但教会当局认为这种观念太前进：修女厕足世俗生活，当时被视为不能想象的事。方济各未能打破这种观念，所以慰问会终于成为纯粹从事对越的修会。

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对方济各敬爱有加，目之为圣人，愿罗致为巴黎主教；但方济各不愿离弃他那穷苦的教区，说：「我已与一贫穷女子结婚(意指其教区)；不能抛弃她而与一位更富贵的结识。」

但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教区界限之外。他是一位最受人尊重的讲道员，往往被邀请到很远的地区去讲道，到处听众涌来听讲。他又是一位无比的人灵导师。现在还保存着两千多封信，都是他指导人修德前进的；有写给贵妇的，也有写给贫穷女子的。然而正是借着他这些著作，尤其是他那本「热心神师」(L' Introduction à la Vie Devote) (近译为：入德之门)，他的影响至今不衰。当时

一般人错谬的成见，都认为只有修会中人始能习修全德；圣人力排众议，证明每位教友都能优入圣域，他说：「倘认为联队的士兵；商业界的工人，朝廷上的亲王，家庭中结婚的老百姓，不能度热心的生活，那真是天大的错误，实是异端邪说」。在世俗的生活中，也能完全实行福音的教训。这种热心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难行的。对每日的生活也不是什么负担，也无何妨碍，只在乎灵魂清洁，全心归向天主而已。至于外表呢，每种生活的特殊义务都能靠丰富的圣宠去完成，心中对天主恒持的爱情，便能圣化一切。但不要误会：他的外表虽似轻松，文词也满带诗人的优美风味，但对神修的道理却一点儿也不放松，它要求人对自私自爱，必须完全剔除。圣人在他另一本「论爱天主」的有名著作中，引导人灵进入神秘生活的领域。

圣方济各撒肋爵也实现了天主教的人文主义的理想。他的确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大著作家，乃是因为他针对着路得和加尔文的理论，对人的一切美点一毫不否认；说他是一位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对天主的无限伟大和全能，并未敢稍加减损。他把人看作是天主的肖象，每人都是弟兄，因为人都是降生成人的天主所救赎的，且被天主的圣宠提拔到了他本有的身分以上。

### 罗马的宗徒及祈祷会的会祖：圣斐理伯·耐理

(一五一五—一五九五)

斐理伯·耐理 (Philip Neri) 是翡冷翠一位律师的儿子，二十三岁时，放弃了家产的继承权，前去罗马「为开始奉事天主」。他度的是祈祷补赎的生活。他以畅快人心的姿态，在十六世纪艺术和幽闲的罗马城中出现。爱人的

心火促使他走进医院去服务；当他以服务和慈爱赢得了病人的欢心以后，师向他们谈论天主。罪人回头的很多，病人痊愈后多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和门徒。斐理伯的名声不久便传遍了全城。他在街上行走时，往往以片言只字或几句笑话，便把人吸住。他也常故意到商店或工厂去和人谈话，在言谈之间很巧妙地把人引向天主。斐理伯在罗马攻读哲学和神学，但因谦逊不愿领受神品。在他为拯救人灵热心工作了十二年之后，他的神师才催促他领受了神品。从此他便由晨至午常听告解，然后以动人的热心举行弥撒圣祭。午后把往访的人聚在一起，向他们讲论天主的事理。不久往访的青年人数大增，他的住室已显得太窄，聚会终于转移到一座小圣堂，这就是祈祷会 (L' Oratorio) 名称的由来。Oratorio 一词的原意为小圣堂；他们先静默祈祷一会儿，然后听斐理伯朗诵一段圣书，再讲半点来钟的道理，题目多半是圣人们的行实、圣经、教父或圣教历史。最后以唱歌和音乐作为消遣。④

祈祷会对于革新罗马的道德风气，主要在乎这一点：因为他们是一伙由俗人中特选的优秀分子和热心人士，被引向内修并深切了解教义，然后把他们每人由斐理伯所领受的精神，向自己的四周发展开去。有不少的司铎也进入了斐理伯的门墙。他终于对他们一再的恳请催促让了步，在小圣堂的左近把他们团结在一处，建立了「祈祷会」，这是一个在俗司铎们的社团，在服从之下过着团体的生活，但不发圣愿；爱德是联系他们的惟一锁炼；在斐理伯逝世后，才有人把几条具领导性的原则写了出来，作为祈祷会的会规。

斐理伯本来愿赴印度传教，却在半世纪之久作了罗马

的宗徒；他那在教会心脏的宗徒事业是很广泛的，上由教宗，下至里巷儿童，影响了整个世界。斐理伯在罗马经历了十二位教宗，获得了每一位教宗的信任，不过那一位也未能使他接受枢机的高位。这位教宗们最尊重的顾问，及十位枢机、许多贵族、神职人员和无数信友(成人妇女孩童都有)的听告解司铎，真称得起是罗马的宗徒，和教会最具实效的革新家。

### 重整加尔默罗圣衣会的圣女德肋撒

一五六二年八月，特利腾会议已接近尾声时，在西班牙中部名叫亚威拉 (Avila) 的一座小城中，有五位贫穷的修女建立了一座隐修院。这样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却是精神方面一种重要冒险的开始。小小的一座亚威拉城当时已有不少的修院，为什么又建立一座呢？创办人是谁？就是德肋撒 (Teresa)，时年四十七岁；她父亲原属旧日望族，是他把祖先的活泼信德传给了她。她小时偶阅致命圣人行传，顿萌仿效之念。年方二十，便加入了本城的(圣衣)会，但并不感觉完全满意。因为当时院中的生活，虽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恶迹，但距四百年前初创该修会时的严厉生活，已相差甚远；比如，在应祈祷的时间，修女们往往在会客室内闲谈数小时。德肋撒在这样的修院内生活了二十七年，有时无忧无虑，但多次内心却感到一股强烈的圣宠，提醒她向往更完美的圣德。一五五三年，她偶然看到一尊遍体伤痕的耶稣态象，唤起了她决定性的转变，她曾写道：「我一触目，便觉五内都震动起来，回想救主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默念着我对这些伤痕所表现的还爱之情，实属太为乖戾与冷情，苦痛于是占据了我的心，觉得心痛欲裂；我葡卜在救主的足下，涕泗滂沱的

流着泪，恳求祂给我勇力，使我永不再犯罪得罪祂。」(见德来自传第九章)从此圣女便开始渥蒙天主的奇恩异宠：如神视，出神等，但她的同会修女们认为是魔鬼在作祟；她的听告解司铎们，尤其是十字圣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却向她保证，认定是天主在她身上所行的奇妙化工。德肋撒在隐院的深处，便晓得了路得和加尔文的改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如蹂躏德、法的战争，许多隐修院和圣堂被捣毁等…她认为这些灾祸的深远原因，便是修会深规的废弛。她于是决心加以整顿，誓愿由她自己和她的同会姊妹们去洗刷补偿。她离开了那座近乎安逸的修院，创建了一座新修院，以便遵守圣衣会最初严厉和贫穷的会规：修女们应度严闭在静院内的生活，穿著粗糙的布衣，终身禁止肉食，专务祈祷补赎。

德肋撒创建了亚味拉圣若瑟院，好象要终生在那里度一种禁闭的生活了；但她不能安静，该去散播革新的种子。这位度对越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活力和最善组织的女子。她十八年之久，虽然病不离身，却坐着缓慢的破骡车，巡行西班牙各处，穿过燥热的平原，冰冻的山岳，无间昼夜地奔波，遭遇了不少的痛苦烦恼，却常带笑容，不顾千难万阻，竟创立了十七座修院。这些专务祈祷的隐修院，虽经历了四世纪漫长的岁月，仍能屹立不摇，直至今日，始终为圣教会最坚强的支柱。

这些重整的圣衣会修院，在她死后，仍不断在西班牙国境以外继续建立，特别是在法国，她们对后世重建神修的工作，出了很大的助力。但德肋撒在教会的活动，并不限于建立那些修院，她著作的影响力更能延至今日不衰，不但堪称神修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且是西班牙古典文学的

一位杰出作家。

她在百忙中，遵照长上的命令，写了以下的书籍：自传，建立修院的经过，成德之路等……她虽读书不多，却具有自然而流利的美妙写作天才。她谈论神秘生活的最高级现象，清晰无比，因为她有亲身的经验，处处流露着修理井然而炽烈感人的慷慨大方，及她在严厉而牺牲的生活中所修养的深度喜乐。

### 另一位修会的重整者：圣十字若望

圣十字若望( St. John of the Cross 一五四二——一五九一)曾作过德肋撒的听告解司铎和顾问，他对圣衣男修会，正象德肋撒对女修会一样，作了同样的重整工作。他也和德肋撒一样，一进圣衣会，便感觉当时修会的规矩松弛，常向往着更严厉的生活。他正拟加入嘉都西(Carthusians)修会时，适遇圣女德肋撒。圣女向他表示，为获得他所寻求的，只有严格遵守圣衣会最初的会规便得，不必另觅他途。他于是按照德肋撒的榜样，开始整顿修会工作，但遭遇的反对非常重大，修会几乎分裂，精神方面也受了各种诬蔑与迫害，甚至被同会弟兄们在黑暗的监房内囚禁了他九个月；内心的折磨受的也不少。他由这些痛苦的经验，描述了天主为清洁人灵所加给的考验，他称之为「感官的暗夜」或「灵魂的暗夜」；天主惯常用这样的考锻炼祂所深爱的人，引导他们达到神秘的圣域。他那些著作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神秘神修导师之一，也是一位西班牙的古典文学家。⑤

### 德国的第二宗徒：圣伯多禄·加尼削

在德国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伯多禄加尼削(Peter Canisius 一五二一——一五九七)，他出生于荷

兰，进耶稣会后不久便被派往德国，五十年之久，走遍了德国各地；我们对这位卓越的耶稣会士广泛而繁重的职务，真该愧煞。他初抵德国时，该处天主教的情形实在可悲；许多地方的教友真如无牧之羊，教会的生活已不绝如缕，整个儿德意志面临着变成誓反教的危险。加尼削在德意志、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创办了许多大学和十二座中学；在其中培植了忠于教会且有影响力的另一代：有普通的教友，有优良的司铎，也有修会会士，特别是耶稣会士，使耶稣会迅速地长大起来。看来这已够他忙得日无暇晷了，然而这仅是圣人惊人活力的一部：此外他还得编写重要的辩护学和神学的著作。他著作中最负盛名的是他那部「教义」，到他去世时已翻印了二百版以上，译成了十二种文字。这部书且是在他各处奔走，布道以及日不暇给的各方咨询论难中写成的。好象是天主教当局，无论是俗人或神职界人，对他的建议或忠告，一时不能或缺一样：罗马需要他，屡次召他去作特利腾会议的神学顾问；帝国的国会及宗教的讨论会都需要他去参加；天主教的主教们也不断去征求他的意见；教宗也多次委任他去德国，甚或远至波兰，担任微妙的任务。他无论到那里，常以辣丁或德语，对各种听众讲道、听告解或会谈。

人们常把加尼削在十六世纪和圣波尼法爵第八世纪在德国的活动，前后媲美。他们二位都是德意志的伟大宗徒；一位使它皈依了天主教，另一位断然停止了誓反教的进侵，而使它重返天主教的怀抱。他工作效力最显著的证据是：在德语地区他活动最力的地方，大致也都是现在天主教势力最盛的地方。这位宗徒虽常遭各种攻击和诬蔑，却从未出过一句伤爱德的话。他是第一次称呼由天主教分

裂而改教的人为「我们分手的弟兄」的。⑥

### 信德保障：柏拉明和巴劳纽

教会被攻击，自然当自卫。路得和加尔文及其他改教者，在生时，虽都面对不可轻视的反对者，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特利腾会议后，情势已改观：神学家已能胜利地反击誓反教的攻势。誓反教很会利用当时新发明的印刷术，他们所散布的论文和小册子，对他们的宣传大有助益。特利腾大会结束时，他们在德国出了一本巨大的著作名「马德堡的世纪」(Centuries of Magdeburg) ⑦，实在是攻击天主教的武器，内容学识广博，可惜偏见太深，他说教会的一切不幸都是「罗马的反基督者」(暗指教宗)所造成。

一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名叫柏拉明(Robert Bellarmine 一五四二—一六二一)的，当时在罗马日尔曼学院内任教；他为准备他的学生们应付日后传教时所能遭遇的思想斗争，编著了一本书，名「对基督信仰争辩问题的解答」；那是一本辣丁巨著，很快便译成了各国文字。他先逐条陈述路得和加尔文的学说，然后再以天主教的真信仰逐条反驳。那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使誓反教徒归正者甚伙。

这只是柏拉明活动的一部分而已。教宗不顾他的谦逊反对，终于升他为加普亚(Capua)总主教兼枢机；这位圣德的耶稣会士从此便专心致力于教育众多的门徒，且为罗马圣部—尤其是传信部最受尊重的顾问之一。⑧

另一位答复他们对历史的攻击的是斐理伯·耐理的门徒巴劳纽(Baronius)；他在圣斐理伯·耐理敦促之下写了一部圣教历史。巴氏为编辑「教会年鉴」几乎用了五十年的光阴。这位近代历史家的先驱，到各处图书馆和各档案

室去搜集资料，他惟一关心的是建立真理，深信只有陈述历史的事实，才是对攻击诬蔑圣教会的最佳反驳。

### 神学的极盛时代

这个时代实在是教会学科的普遍复兴时代；原因之一无疑是由于修会的繁兴：各新兴的修会和较早的修会，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圣召大增。耶稣会在十七世初已有几千会士（已见前述），还有道明会，方济各会，嘉布遣会及其他修会增加的人数也不少；从这些会士内产生了很多神学家，圣经注释家，伦理学家等，为当代及后代增加了无比的光辉。⑨

特利腾公会议对教义在基本重点上，作了深刻的研究和确切的说明；因此能以天主教传统的一致来对抗誓反教的变化分歧。道理虽一致，但对尚未下定义之点则任人自由辩论，而神学家彼此的辩论却往往能促进神学的进步。恐怕辩论的风气，从来没有象那时那样激烈的了。这时代的人，对神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最难捉摸的问题，表示非常兴奋：就是人的自由意志怎样能同天主的全知并存不悖？如果人有自由决定的意志，天主如何能预知人将来的行为？假如祂不能确切地知道，怎能算全知的？加尔文以「前定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照他的说法，从太初便注定了某些人一定得救，某些人则一定要受罚。天主教的神学家一致驳斥此骇人听闻的说法，但在试图探测此奥秘的深处时则又意见分歧：道明会士特别卫护天主的全能，强调圣宠的能力；耶稣会士则强调人的自由。

教宗格来孟八世希望澄清此问题，因而成立了一个神学委员会以便彻底研究。教宗本人且愿监督辩论。结果争辩了十年（一五九七——一六〇七），仍未能获致结论。教宗

保禄五世乃结束了此项争辩：必须承认此中有我人无法识破的奥秘；一方面必须承认，没有天主的圣宠，人对救灵一毫不能为力；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圣宠决不取消人的自由；至于二者怎样协调，只好承认我们无法完全明白便了。

### 圣人的世纪

人称天主教的十六世纪为「圣人的世纪」。实在，圣人倍出也真是这个时期圣教历史的最大光荣，教友生活的复兴得能如此耐久，如此深刻，真得归功于圣人们的推动；我们对几位教宗、主教及修会的创建者或重整者，已描述了一个轮廓，那不过只是教会正式承认了他们有英豪圣德中的一部而已，至于其他应当一提的还有许多，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因为这两国受誓反教的影响比较最少。

天主教在西班牙的革新运动，在路得出现以前便已由著名的济迈乃(Ximénez 一四三六—一五一七)枢机开始了；他是神职界应读的学科的改革者，研究圣经的推动者。在圣女德肋撒和圣十字若望以外上该一提圣若望号由天主者(St. John of God 一四九五—一五五〇)。他建立了一个修会，专门照顾精神病患者；圣伯多禄·亚尔刚大辣(St. Peter of Alcantara 一四九九—一五六二)是方济各会士，也是该会重整者，并曾作圣女德肋撒的神师；圣方济各·玻尔日亚(St. Francis Borgia 一五一〇—一五七二)是西班牙的贵族，但加入耶稣会后却过着谦逊苦行的生活，并曾任该会的第三任总长。

在意大利有圣若望·理奥纳尔底(St. John Leonardi 一五四一—一六〇九)，是一位青年教育家；圣嘉弥禄·赖理(St. Camillus de Lellis 一五五〇—一六一四)先是军

人，以后生活浪漫，嗜赌如命；但于一五七五年归正后，加入了嘉布遣会，不久又退出。后在圣斐理伯·耐理领导之下，修成了崇高的圣德。他为帮助病人并为减轻他们神灵的苦恼，创立了灵医会，会士除普通三愿外，并发愿终身服役病人，即在瘟疫流行时也在所不辞。此外还有道明女修会的圣加大利纳·黎齐( St. Catherine de Ricci 一五二二——一五九〇)和圣女玛达肋纳·巴济( St. Magdalen de Pazzi 一五六六——一六〇七)，她们二位都蒙受了最高的神秘恩宠。

最后应当一提的是三位耶稣会的青年圣人，他们实在是公教青年的模范：圣达尼老( St. Stanislas 一五五〇——一五六八)出身波兰望族，他努力战胜了家庭的反对，始得进罗马耶稣会初学院，十八岁时便在初学院逝世；圣类思·公撒格( St. Aloysius Gonzaga 一五六八——一五九一)是罗马帝国侯爵费迪南的长子，他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保持了天神般的清洁，圣若望·伯尔格满( St. John Berchmans 一五九九——一六二一)出生于比利时，因忠实遵守会规而造到了高超的圣德。

至于号称东洋宗徒的最伟大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我们要另条详述。(参阅第十四章)

## 肆 特利腾会议后的教会

圣教会在特利腾大会后是怎样一种面目？已焕然一新了吗？同改革以前大不相同了吗？没有，她还和以前一样，仍旧是传授自宗徒以来的同样信仰；信条祇是在若干点上讲解得更清楚些罢了，但并没有改变。就如一棵树，长大后虽与以前不同，但仍是同样的树；基督的教会在历

史的过程中，虽有不同的表现，但并没有变质。同以前比较起来，祇是自身更坚定了，在信仰上因为信条有了清晰的定义，信徒更团结一致了，教宗的权力也更加坚强，大家对这有形的领袖也更加归心了。教宗现在由十三个圣部辅助(等于政府各部院)，又有驻在各国的使节同各奉教国家经常取得联系<sup>⑩</sup>，对交至罗马的许多问题，更容易研究而谋求解决了。从此产生了对罗马圣座的一种向心力，直至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仍未稍衰。

另一种现象，就是教会显得更庄重尊严了。会议后多为明智而被人尊重的教宗，不象文艺复兴时的教宗那样喜玩政治而且好战了。神职人员也更加慎重栽培；象对大赦案那样滥用职权的事也绝迹了。教友方面，信德也更加活泼；就大体说，信仰更加鲜明，告解领主等圣事，领受的也更多了，甚至每主日领圣体的，也不少见。在教宗、教主、新兴或重整的修会内，以及一般的教友中，出了不少的圣人，对改革教会，表现了很大的活力。此外大批的传教士，随从发现新地的人，有的甚至在他们以前，去宣传福音，可说真的已「直至地极」。

这样说来，一切光明顺利，毫无暗影了吗？黑暗面也得承认是有的。路得改教以后，天主教重整的工作是在奋斗中进行的，现在仍存在着斗争的痕迹。为自卫起见，她对反对派的道理不得不猛烈攻击。特利腾会议自不能不对某些道理宣判有罪；因为圣教会是信仰的寄托人，对破坏信仰者决不能让步妥协。因此公会议之所以召开，就是同异端斗争，所以公会议以后，神学士便把誓反教所否认的真理，特别强调使之突出，对教会的某些重要道理和生活最重要的一面，反而在无意中忽略致令模糊不清了。

这点在论教会的问题上，特别显著。因为誓反教徒不承认有形的教会，因而抛弃教会有形的领袖——教宗的权力；天主教的神学家于是便强调有形的教会，和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反而对另外也非常重要的一面——教会是基督的妙身，忽略多所发挥，遂致隐晦不彰了；直至二十世纪才被彻底阐明，令人深切注意。

另有一例：自古辣丁语就是西方教会礼仪的通用语①，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祇有辣丁语是文明语，凡受教育的人都懂；但到改教时期情形已变，欧洲各国的语言都已成了文明语，而美洲和亚洲的民族也开教。誓反教徒抛弃了辣丁语，同时也把传统的礼仪搅得一塌糊涂，并把若干道理也一并抛弃。为了反击这些弊端，免得道理因翻译不正确而变质，特利腾公会议遂禁止用方言举行弥撒。此禁令一直维持到梵蒂岗第二届公会议，一切礼仪也几乎无甚改变。这样一来，固然截止了擅改礼仪的恶风，但对于使一般教友更易了解礼仪的正常进步，也于无形中阻止了。

### 圣伯多禄大殿

一个时代的艺术，便是该时代思想的反映，特利腾会议以后的宗教艺术也不能例外。文艺复兴时代，一切建筑、文学和雕刻都模仿希腊罗马古代作风。哥德式的圣堂，由它那细长的柱子，高耸的中厅，高插入云的尖塔，给人以飞升上天的印象，继承了宽大的穹窿，粗笨的圆柱，和象征稳健平衡的罗马式。特利腾以后，反对誓反教的情绪，甚至也表现在圣堂的装饰品上：誓反教唾弃对圣人们的敬礼；憎恶圣象及富丽堂皇的装饰；天主教反而在圣堂的正面及内部满供圣人圣女的肖象，并以大量的金银

宝石钳罐，墙壁和天花板也满布图案；认为天主的圣殿，无论如何富丽也不为过分。

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真是一个从来未有的，集天主教革新后的艺术大成的里程碑。从十六世纪初叶便开始修建，持续了一二五年。革新的教宗们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教宗们所开始的工程，其中工作的人员，都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如布拉蒙(Bramante)，拉斐尔(Raphael)，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等；那个庄严而又美观的圆顶阁，就是米氏所设计的。这个建筑，给人以无比雄伟的印象，广阔的穹窿笼罩着硕大无朋的圣堂中厅，中厅的近头处，光明自圆顶阁撒下，有如透明的白练，真是极尽艺术之能事，令人叹为观止。任何巡礼者都感觉到这种伟大印象，究竟由何而来？祇是由于这座建筑的硕大容量吗(它是天主教全球最大型的圣堂，可容六万多人)？或是来自金碧辉煌的装饰呢？这都不足以说明那伟大的印象。艺术家们不断地证明这其中有一种伟大的精神，人人都能感觉得出来，那就是由宗徒所传下来的罗马教会的神圣庄严，是奠基在这个神圣的许诺上的：「你是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镌刻在圆顶的基座上的这几个硕大无朋的字，赋给了这座建筑的意义。罗马教会战胜了改教的惊涛骇浪，面对着一切攻击，仍能屹立不摇，就是因为基督已预许了：「地狱之门(恶势力)不能战胜她。」在那庄严的穹窿下的中央，埋藏着宗徒之长圣伯禄的骸骨，直至今日已证明无误。当一五九五年，教宗格来孟八世(Clement VIII)命令建造那座正在圣伯多禄坟墓上的大祭坛时，不准将十二世纪所建的旧祭台拆毁，吩咐将它包在新建筑内；不过我们知道这座旧祭台，是建在更早的祭台之

上的，位于君士坦丁大帝所建的古老圣殿的中央。⑫这是真是具有深意的象征：特利腾大公会议以后的教会，虽然呈现着一幅崭新的面目，实质上同宗徒和殉教者的教会是同一的，毫无二致的。加里肋亚的渔人仍在这伟大建筑的地基下安眠着，它显示了他的光荣⑬；正因为他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才使这城变成了全球天主教的中心。

注解：

- ① 有些历史家认为，如果没有路得改教的扰乱，教会内部的改革本来能够早已自行完成，也就不至分裂了。反之，其他的人则以为路得的改教加速了教会的改革。这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因为假设既没有实现，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历史究竟会发生怎样的情形了。但确实的一点，是对教会革新影响最大的一些圣人，以前同誓反教徒没有任何接触；例如圣加耶当 (St. Cajetan)，圣斐理伯·耐理 (St. Philip Neri)，圣女德来 (St. Teresa) 等。还有对革新出力最大的修会，也同德国横决的洪流毫不相干。即以圣依纳爵而论，他创立耶稣会的最初意向，也决非如一般人所想的是为攻击誓反教。
- ② 毫无准备的读者，把它从头至尾浏览一遍，未免要感到枯燥而失望。它实在不是供人阅读的书籍；乃是领导人在退省中从事整顿心灵的操练功夫；非在一位能胜任的神师领导之下，至少数日的时间躬亲实习，不能窥见其堂奥；能完全咀嚼其精华、须延长四星期(或周期)才成。
- ③ 嘉布遣之名来自 Capuche 一词，意为尖顶风帽，与衣领相连，可以复盖头部。
- ④ 天才诗人和大音乐家，另外是著名的帕勒斯堤拿 (Palestrina)，常光顾这个「小圣堂」，给这个消遣的时间编写了一种新颖的圣乐；因为是由这小圣堂开始的，便得

了「小圣堂乐曲」(Oratorio)的名称。许多世界性音乐的杰作，如韩德尔神曲(Oratorio of George Frederic Handel)，特别是弥赛亚(Messiah)，海登的「创造」曲(Creation of Haydn)等等都隶属此类。

- ⑤ 一九二六年教宗比约十一世钦定圣十字若望为教会圣师。
- ⑥ 一九二五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将加尼削入圣品，并公布他为教会圣师。
- ⑦ 此书的主编者为弗拉西·依里古(Flacius Illyricus)，取名「世纪」因为它按照世纪叙述教会的历史，称「马德堡」者，是因作于德国马德堡城。
- ⑧ 柏拉明于一九三二年被教宗比约十一世列入圣品，并于一九三一年被封为教会圣师。
- ⑨ 在道明会的神学家中有：加耶坦(Cajetan 一四七〇—一五三四)，他于一五三八年曾奉派去劝导路得服从；维多利亚(Vittoria 一四九二—一五四六)专攻寻获新地者及殖民者所提出的道德问题，人尊之为国际法的创始者；扫刀(Soto 一四九五—一五六〇)和卡诺(Cano 一五〇九—一五六〇)是特利腾会议的神学家；巴聂兹(Bañez 一五二八—一六〇四)对圣宠问题和耶稣会士毛里纳(Molina)持相反的意见。

在耶稣会士中，除加尼削和柏拉明二位圣师外，还有赖乃思(Lainez 一五一三—一五六五)，是耶稣会第二任总长，也是特利腾会议的神学家；莱西伍(Lessius 一五五四—一六二三)；毛里纳是「自由意志与圣宠的协调」的作者；此外还有最伟大的苏亚来(Suarez 一五四八—一六一七)。

嘉布遣会士有：圣老楞佐·布林底希(Lawrence of Brindisi 一五五九—一六一九)，最近被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封为教会圣师。

- ⑩自很久以来，遇有特殊事件，教宗常派代表去办理；自十六世纪初叶，始对各国政府派驻常川使节。
- ⑪这里所说的，祇是辣丁礼的教会，隶属罗马的东方教会不包括在内，因为她们始终保持着本地语；此外斯拉夫民族，在圣济利禄和圣美多弟时，也获得了用本国文的特别准许。（参阅卷一·二四八页）。
- ⑫参阅卷一·一三九页。
- ⑬基督教义的两面，显然是分不开的：即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的光荣胜利。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和同时代的其他建筑一样，更呈现了光荣；它在这上面，代表了特利腾以后的圣教会的全貌，致使梵蒂岗会议的几位代表称之为「凯旋主义」(Triumphalism)。

## 第十四章 文艺复兴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

### 壹 新地的寻获与保教权

直到现在我们所注意叙述的是在欧洲所经历的事情，即：文艺复兴，路得等改教及天主教的重整。现在对我们在前章开始说的，须要重述一下。为清晰起见，须将不同的问题分别叙述，但当注意的是：前章所述的事迹，和我们此刻要写的是同时的事。当教宗亚历山六世继承圣伯多禄的大统时，哥仑布正发现了美洲（一四九二），而大赦的争辩闹得天翻地复时，教宗良十世祝圣了第一位黑人主教（一五一八）。加尔文改教以及英王亨利八世与罗马分离时，卧亚（Goa）主教区适在印度成立（一五三三）。一五五二年特利腾大会的第一期结束时，圣方济各·沙勿略逝世于中国上川岛，而利玛窦也于是年在意大利的一小城里诞生，他要將天主教带入中国的首都。

这是教会历史在誓反教改教时另一方面最惊人的情势。当奉教世界的三分之一不幸与罗马分离时，罗马教会并未因自卫而无心计及其他；她却同时自行净化，借特利腾会议来整顿内部，许多圣德卓越的模范也应运而生，而且比任何时期更认清了自己有将基督的福音传布到万国去的使命；于是便把她最慷慨的子弟派遣到新发现的民族中去了；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最好例证。

#### 重大的发现与传教

向外教民族传教的理想，照现在我们所意识到的意义，那是十三世纪由圣方济各·亚西西的心灵中所产生

的。自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圣人便明了了，决不能再以武力为基督争取新领域，必须靠宣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才成。于是英勇的方济各会及道明会的传教士便前出去征亚洲大陆；如上所述，他们到处建立教区，远至中国。但不久因中亚都信奉了回教，信教的欧洲与远东的交通也因此中断；与罗马失去联络的中国教会，便于无形中逐渐消灭了。不过欧人已晓得在远东神秘的地方，出产香料，宝石，黄金和丝绸；那是意大利的商人由阿拉伯商队手中所买到的；他们便渴望认识出产那些珍品的国家，前去经商致富。但必须经过回族所占据的地区始能达到目的地，而回族却树立了不能飞越的天堑。

然而十五世纪末叶，由于新地的大批发现，这种情形始行改观。因为古人天圆地方的揣测，已被地为圆球的观念所打破；认为人苟不断地向西面航行，便能到达东方。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发现美洲的(一四九二)大胆航海家意大利热那亚人(Genoa)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受西班牙雇佣，为到达印度所经由的路线。①另一方面葡萄牙人，按部就班地探测了非洲西海岸以后，也试图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一四九七年，即哥伦布探险后五年，德伽玛(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果然发现了到达印度的新航路。另一位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卓越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也于一五一九年试作第一次环球航行，先至墨西哥，继而发现菲律宾，不幸在菲律宾被害，其伙伴始完成环球壮举。

最堪注意的是，这些英勇的航海家所以大胆从事征服世界的目的，不只是由于酷嗜冒险或贪图致富，乃是由于广播福音的热望。哥伦布登陆新地的第一动作，便是跪地

感谢天主，然后竖起一座十字架，并命名该地为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 意即神圣的教主)。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美洲时(一四九三)，便有一伙传教士搭船同行，此后每次出航，每次有传教士随行。

### 保教权之由来

寻获新地已使班、葡二国的权力达于极点。自寻获美洲之年，二国对占领寻获的新地便起了冲突。但该二国君主同意推教宗为仲裁人，听其处理。于是教宗亚历山六世(Alexander VI)乃划分二国势力范围：西方之新地即美洲，归西班牙，东方亚、非二洲归葡萄牙。二国应负责保护属地的教会，遣派传教士，并负责运送传教士，筹划其用费，并为之建造圣堂和修院；宗座方面则正式赋予保荐主教之特权以为酬佣：是即班、葡二国对传教区拥有保教权(Padroado)的由来。②

起初君主们在他们属地上传布信仰的慷慨热诚，还能符合宗座的期待。以后班葡两国从事争权夺利，便很少顾及他们所负的使命了；而保教权对传教，遂成了弊端丛生的根源。

## 贰 美洲和菲律宾的传教

### 西班牙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

西班牙人占领了安地列斯群岛(Antilles Isls.)后(古巴海地等)，即开始征服美洲大陆。

阿兹忒克人(Aztec)自一百五十年以前，已在墨西哥③建立了一个广大的帝国。皇帝自建筑在湖中央的首都墨西哥(Mexico)，施行着君主专制的主权。西班牙人为阿兹忒克人的城垣的美丽建筑：宫殿、石屋及建筑在庙宇上

的巨大金字塔所动，亟思取而代之。但这个民族不但建筑术很高，还有一种野蛮的宗教：即杀人行祭。例如一四八〇年，为举行开庙典礼，据说杀了两万俘虏祭神。

秘鲁民族也是大建筑家，由今日庄严的圯垣颓壁便足以证明。自称日神后裔的因加人 (Incas) 所建的帝国，自哥伦比亚延伸至今日阿根廷的北部。他们过的是集体生活，皇帝掌握着一切财富，食粮以及国家工厂所纺织的布匹，都由皇帝分配。

但这些帝国的权势祇是表面的，实际并不坚强；经少数胆大的强人一击，立即粉碎。自公元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二年，西班牙人科泰斯 (Cortez) 率领战舰十一艘，战士七百名，大炮十门，自古巴启程去征服墨西哥。阿兹忒克人的帝国在它治下民族中所种下的怨恨，早已使他们离心离德，于是他们便和西班牙人暗结了血盟。因加人的帝国也未行抵抗，便被彼萨罗 (Pizarro) 在五年之间全部征服 (自一五三〇至一五三五年)。西班牙在半世纪之间，便将美洲除巴西外，自加利福尼亚至南美南端，全部征服。其中当然还有许多足迹未到的地带，但重要及最富庶的区域已尽归掌握。以如此少的兵力而能迅速完成如此的征服，固足以证明远征军 (Conquistadors) 的大胆英勇；但实际却是得力于欺诈和恐吓。④

### 班属美洲的传教事业

随远征军而来的便是传教士：有方济各会士，道明会士及奥斯定会士，稍后也有耶稣会士，这些人只是以传播信仰为目的。他们所遭遇的阻碍也是相当大的：第一是人数太少，其次便是地势的困难。高山峻岭，简直无道路可言，而且地广人稀；有时一位主教，为巡视自己的教区，

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传教士的精力和时间，大部都消耗在行路上了。

然而对传教士最恶劣的困难，还是由殖民者自身而来。自在美洲发现了金银矿以后，冒险淘金的人便蜂涌而至，他们所贪求的祇是财富光荣。哥伦布为使移民定居美洲，首先准许他们强迫印第安土著为他们做苦工，为他们致富；虽无奴隶之名，却有奴隶之实。为开垦种植，为开矿，为搬运担挑，在在需要人工；结果便驱使土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这些苦工。

### 拉斯卡萨斯

终究有些教会人士看不过这种情形，提醒教友听从良心的呼声：这实在是圣教会的光荣。我们不能一一加以引证，祇将他的呼声获得最大反应的一位，加以叙述便了。这人名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一四七四—一五六六)，是哥伦布的一位伙伴之子，他原本也是来美洲淘金的；当他三十五岁时，偶因听一位道明会士讲道，明白了虐待土人的不义，翻然改弦更张；他将五十年的余生，完全献身于卫护印第安人的工作。他升了神父，并加入了道明会。他在美洲既不能赢得人的同情，便渡过重洋，去向西班牙国王陈情。嘉禄五世予以支持，立他为全部印第安人的保护者，并且改订了法律，严禁强迫土人为奴。可惜天高皇帝远，法律变为具文，未能认真推行。但拉斯卡萨斯决不气馁，继续奋斗。他写了不少的著作，描述印第安人所受的痛苦，但未免有些铺张过实。他为卫护印第安人，横渡大西洋达十二次之多。他对爱护印第安人的感情有时竟致使他目盲，比如他们因为人手不足，遂用到非洲去贩卖黑奴的方法来补充，他竟予赞同。

拉斯卡萨斯寿至九十二岁逝世，噩耗传至很远的印第安乡村，各处都为他举行追悼礼，真是如丧考妣。他虽因热情而有时矫枉过正，但仍不失为当时的伟大人物。

### 传教事业的结果

拉斯卡萨斯的人格，并不能把其他传教士的热心和圣德遮蔽起来：例如道明会士圣路易·伯特郎( St. Louis Bertrand 一五二六——一五八一)，他曾在哥伦比亚传教；还有秘鲁国利玛(Lima)的总主教圣多里比约( St.Toribio 一五三八——一六〇六)他在自己广大的教区中，不顾劳苦和惊人的危险，所做革新和传播福音的工作，可与圣鲍劳梅在米兰所做者媲美。

虽然困难重重，传教的工作却很可观；当然在众多的皈依者中，免不了有些浮浅不实的，不过大体来说，信仰已在班属美洲深深地扎了根。自开教一世纪以后，即在十世纪初叶，在中美和南美，已有五个总主教区，二十七个主教区，四百座修院和无数的本堂区；大小圣堂也相继起建，传教士正努力改善野蛮的风俗，在每座修院傍建立了小学，免费教育儿童，也有为栽培印第安领袖们的子弟所建的中学；输入了印刷术，在墨西哥和利马创办了大学；修会的传教士尽力输入文化，他们不但教授土人学习读写和歌唱，还教给他们种植庄稼，造林建屋。为防范土人染上恶习，他们尽力使已进教的土人聚居在建立的农村中，不与欧人杂处。这些农村由传教士们领导，而由土著领袖们辅助，为度教友生活所需要的机构，如圣堂、会士住院、学校、工厂、医院等，应有尽有…

一五三六年，已在墨西哥建立了一座修道院；不幸这种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的尝试竟告失败，连一位本地神父也未

栽培成功。因为本地的青年，在外教的氛围内浸润已深，生活的恶习一时不易改除，于是他们便认为为时尚早，土人不适宜作神父；这样一直迁延下去，致使多年以后还没有本地神职人员。

在照耀美洲新生教会的圣德花朵中，当首推圣罗撒(St. Rosa 一五八七—一六一七)，她生于利玛，是班人的后裔，她的温良，谦逊，刻苦和爱人等德，真是光芒四射<sup>⑤</sup>。还有圣玛而定·保来(St. Martin de Porres 一五七九—一六三九)，是道明会的辅理修士，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乃印第安人，他对医道和药品都很精通，终生拒绝升神父，以便更接近他的种族。<sup>⑥</sup>

### 菲律宾开教

虽然就地图来看，菲律宾(Philippines)距美洲很远，但就它们蒙受福音的历史来说，我们还得把它们拉在一起。麦哲仑由美洲南端绕过向西航行，便于一五二〇年发现了这个群岛；在宿务(Cebu)登陆，在那里竖立了十字架，不久便给一个小王子和他的一些臣民付了洗。四十五年以后西班牙人占领了墨西哥，便由墨西哥出发，正式占领了菲律宾；去菲律宾开教的传教士也是走的同样的路线，这也是班人传教最惊人和最迅速的成绩之一。菲律宾土著相信各物都有精灵，不过没甚么公共举行的敬礼和庙宇，对天主教的道理很容易接受。为此一五八五年新奉教者已有四十万，一六二〇年便增至二百万以上，四十年之间已普及全国。最堪注意的是，农村大部分的本堂区已交给了本地神职人员自行管理。一六一四年道明会士在马拉拉所创办的圣多玛大学，至今不停地繁荣滋长，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 巴西开教

在分划殖民地时，巴西 (Brazil) 划归了葡国。葡人与班人不同的，是班人的征服，深入内地，葡人则在它的广袤领土中，自巴西至印尼，祇占领沿海的战略据点；还有其他不同的一点是：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已发现相当进步的文化，但葡国传教士在广漠的巴西所面临的，祇是些没有成文的法律，没有外表的文明也没有信仰的半游牧民族。方济各及奥斯定会士先作了些开教的尝试，正式将福音传入该地的乃是十六世纪的耶稣会士。土人弃邪归正并非难事，不过稍微一停止监视，立即故态复萌。为施行教育，非使他们在奉教的村中聚居不可。但不久，土人把神父当作自己的主人和保护者，神父们因此不得不接管土人的村政府。耶稣会总长认为当要求自己的会士，不要采取那样的办法，应放弃一切政治性的权力；但这样一来，又遭遇了其他困难；如果神父们放弃维持村政的权力，印第安人深怕被欧洲侨民虐待，便又逃入森林中无法再和他们接近了。费了如此高的代价而获致的传教果实，忍令它毁于一旦吗？最后终于决定一仍旧贯了。

## 叁 非洲开教

一四九〇至一四九一年，首批传教士由葡国到非洲刚果 (Congo) 去开教。他们虽然是用葡语讲道，然后再由人译成土语，效果却奇佳。传教士登陆后的第四日，便给国王付了洗；不久王后也请求受洗。以后他那位洗名亚尔风索 (Alphonso) 的长子继承了王位；俨然象一位文明的君王，而且奉教热心；他在位很久，努力在刚果建立了一个信教的王国。一五一二年，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团去晋谒

教宗，引起了罗马的轰动；随行的有王子亨利(Henry)，他有志晋升司铎；这位青年的才德均属超群出众。他在里斯本完成了学业，领受了铎品，且被教宗良十世升为主教(这是第一位黑人主教，直至二十世纪竟没有第二位)。亨利带领大批黑人司铎回国；虽然不久受洗者已有数千，但天主教尚未打下深厚的基础；民众粗野和迷信的风气并未改除，宗教的教育非常脆弱。所以亚尔风索死后，刚果的教务便逐渐烟消雾散。葡国已以全力去经营亚洲的属地，**⑦**非洲的传教士后继无人；欧人贩卖黑奴之风日炽，致使他们在非洲完全丧失了信用，教会也随之受人轻视，新奉教的人也逐渐放弃了信德。

在非洲沿岸其他地方，例如安哥拉(Angola)和莫三鼻克(Mozambique)情形也正相同，葡国传教士起先在各该处也付了不少的洗；虽然一再努力，教务并无起色。直至十九世纪中叶，非洲的传教工作采取了新的方式，才获得了持久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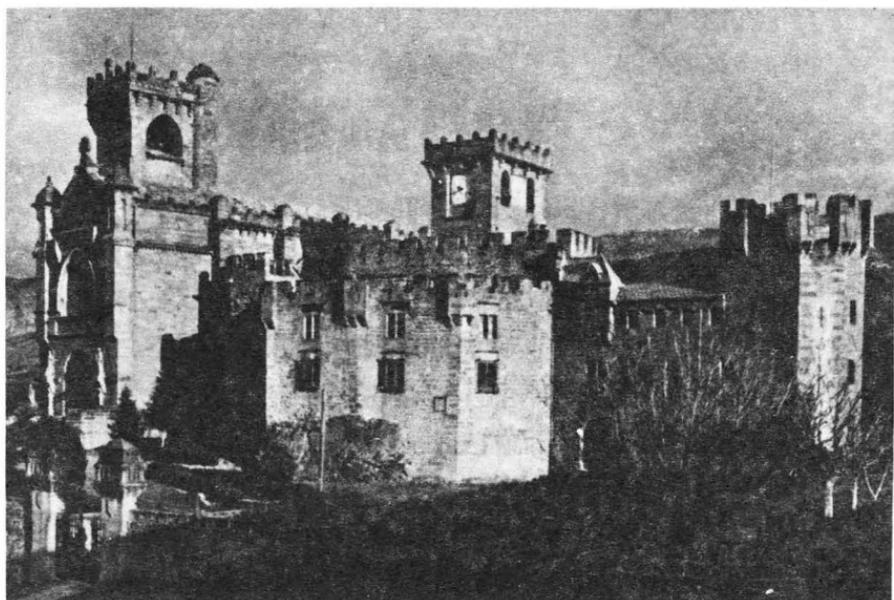
## 肆 圣方济各·沙勿略

### 圣方济各·沙勿略以前的印度

印度的天主教，是由随德伽玛(Vasco de Gama)等航海寻觅新地的人员的传教士进去的。他们在葡人于印度半岛西岸所建的基地上，建筑了圣堂和修院。一五三三年，葡属印度的首都卧亚(Goa)立为主教区；这个主教区可说是硕大无朋，因为它自好望角一直伸展到日本；不过教务的进展却是有名无实，祇是拆毁佛教庙宇而已，决不足以改造人心。继寻觅新地的人而来者是冒险淘金的人，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祖国，唯利是图，往往生活流于



圣方济各·沙勿略——  
一六二三年一帧日本画卷的传统绘象



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出生地——纳华利的沙勿略堡

浪漫，恶声四溢，以致影响了传教的进展。

一五三五年，卧亚的一位热心救人的神父，在印度半岛东南角一个名叫「渔岸」(Fishery Coast)的地方给数千巴拉未(Paravas)渔民付了洗。这个消息传至里斯本，葡王遂决意罗致传教士栽培这批新教友。因此他去和新创立的耶稣会总长商讨。该会甫经成立，会士人数无多，但依纳爵仍同意派遣会士前往，不惜与自己最心爱的同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分离。

### 方济各·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是一位巴斯克(Basque)族上流社会的青年，醉心功名荣誉。他到巴黎去完成学业，与一位长他十五岁的同乡赁屋而居；他这位同乡却相反地一心思慕着天主的光荣。他屡屡向沙勿略提醒说：「人即便赢得普世，倘丧失了灵魂，何益？」常同这样的同伴接触，沙勿略的思想自然逐渐起了变化，生活的目标也转变了，便加入了追随依纳爵的一伙，并于一五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共同警发神贫和贞洁圣愿，且誓许听凭教宗随意安置。从此他就一心以献身拯救人灵为念；当依纳爵命他赴印度传教时，正中了他的下怀。

### 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

方济各一接受教宗钦使的名义，及视察东方全葡属教务的使命，便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祇以教会的发展为目的。他由里斯本登上了每年驶往印度的皇家舰队的船只。

这位与众不同的钦使，祇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布长衫，全部行李只是一尊苦象，一本日课经和几本书籍。有人责备他不顾自己的身分，他却泰然处之。在十一个月的艰苦航程中，他不但自行洗衣，还兼洗病人的衣服，并给病人

服极谦卑的劳役，其他的时间则用来讲道劝人。当他抵达卧亚时，人已以圣人目之。

沙勿略便在这葡属东亚的首都卧亚，建立了他工作的中心。刚一下船，便开始了传教工作：探访病人和囚犯，给儿童讲解教义。葡国人的行径，使得教会不受人欢迎；沙勿略先设法约束他们，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福音的教训。雨季甫过，便着手整理「渔岸」的教务。他发现所谓已受洗的数千人，完全无人照顾，一切得从新开始：一种坚实的训诲，婴儿的付洗，成年人的婚配，组织教团，交讲道员领导，这都是应办的急务。他虽缺乏一切，水土不服，言语困难，<sup>⑧</sup>力尽筋疲，还得不时去卧亚，到北部和锡兰去传教，但他仍经年累月地忙着这一切工作，而且这是他一生化入最多的一段时期。

### 麻六甲和摩鹿加群岛

沙勿略并没有忘记他视察所有葡属亚洲各传教区的使命。一五四五年，他起身赴麻六甲 (Malacca)，那是葡国往东方去的第一站(基地)。这个马来亚半岛 (Malaya) 的港口今日已成死港，已为它的邻港新嘉坡 (Singapore) 所代替，往日它却是东方航海的前哨站。新嘉坡今日的地位，以前都是它所担任的；由此登陆可达葡国的航海人员和货物所能到达的各据点。沙勿略两年间一连串的旅游，几乎都是由海路，在今日印尼 (Indonesia) 各岛间的航路，好象八阵图一样，非常危险，常能遇到暗礁和风暴，或遭海盗及回回的劫掠。沙勿略竟到达了摩鹿加群岛 (Moluccas)，且穿过回民所占据的岛屿，甚至在猎人头的野蛮部落中(即现在的西里伯岛 Celebes)住了整三个月。他返回麻六甲后，便在占据该处的葡人中宣讲圣道。

## 沙勿略在日本

既然还有许多地区有待救的人灵，沙勿略自然不能停留在一处，他必须前去传福音。五年以前，一艘葡国的商船被风吹至直到当时欧洲尚未认识的地方——日本 (Japan)，这是第一次到达日本的欧人。一五四七年，沙勿略在麻六甲曾邂逅一名日人名安治郎，他不辞万里长途来寻找圣人，请求受洗；原来他是在盛怒下犯了杀人罪，出离国境的逃犯。他本是一位彬彬有礼而坦诚的人，他提出了许多聪明的问题来质难；立即同沙勿略建立了友谊。他受洗时取名「圣信的保禄」。此时他惟一的志愿是引领沙勿略去归化他的祖国。沙勿略不顾别人所说的危险困难，排除了一切反对，终于向葡国总督求得了国书，以葡国大使的名义前往日本。

沙勿略盪返卧亚，为料理一切未了的事件，随即同其他两位耶稣会士及「圣信的保禄」向日本扬帆前行。在麻六甲登上了一艘中国海盗的船；一路异常颠簸，疾病飓风接踵而至，船员及旅客都丧失了勇气；幸赖沙勿略一人鼓励大家，终于在九洲的鹿儿岛 (Kagoshima) 登陆，那是保禄的家乡。时在公元一五四九年八月十五日，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第一名踏上日本国土的传教士。⑨

沙勿略发现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道理非常羡慕，无奈当时国情却极其可悲；全国分为无数小邦，分封的诸侯连年混战，形成一种无政府的局面。但沙勿略并不气馁，奋力学习日本语言，并与最有学识的僧人辩道。他心想：如果先争取了这伙民族的精英，老百姓是不难争取的；上行下效，势所必然。可是僧徒对他和他的道理却正讪笑不止哪！

他又试行采取其他办法：他去晋谒皇帝，请他明降谕旨准他布教。为此在严冬时节，徒步向都（首府）(Miyako)，即今日的京都 (Kyoto) 进发，几乎把他累死。结果方知空有此行：因为所谓皇帝，徒拥虚名而已，号令不出都门，对分封的王侯并不能发生效力。

此路既然不通，沙勿略又试行其他途径：他希图同掌握地方实权的一位山口 (Yamaguchi) 的诸侯交接<sup>⑩</sup>。经验教训他，他的奇装异服在日本很受轻视。他立即将他那破旧的黑袍脱下，穿上丝绸，以葡王大使的名义，由葡商扈从，带着许多礼品前去求见。这次果然得法，获得了传教的许可。沙勿略在山口所劝化的居民虽然不多，但信德都很坚固，他称日本人是他的「心灵的快乐」。前途的希望似乎很大，但圣依纳爵的信此时来到，委他为印度耶稣会的省会长，命他返回卧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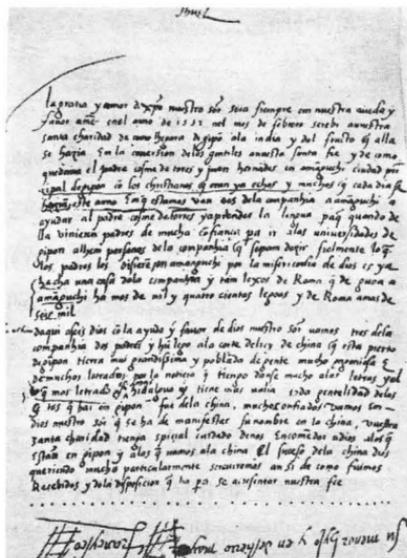
### 指向中国

沙勿略从日本带回来了伟大的计划，他发现中国在整个儿东方实有无上的威望。他常听见人说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日本人称之为上国。日本人也常说：「如果天主教实在有崇高的价值，文明的中国必早已信奉了。」这样说来，他非到中国去宣传福音不可了，然后再从中国影响整个儿亚洲。

无奈中国自明太祖定鼎以来，便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禁外人入境，谁想偷渡，便得冒生命或坐牢的危险。不过甚么也不能阻止沙勿略，他决心随葡国使节抵达北京。当时他曾写信说：「我们仰赖天主的护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要进入中国。我高兴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然而使天主教



上川島樹立的  
圣方济各·沙勿略墓碑



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亲笔信，  
签名倒置



上川島圣方济各·沙勿略的纪念小堂

传入中国的大恩没有赏给沙勿略；他祇是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把耶稣会在卧亚的事安排好了以后，很快便又开始了海上的行程。但麻六甲的总督反对遣使往中国，他的计划不是要失败吗？不过沙勿略并未放弃他的计划。如果他不能公开进入中国，他便要冒险偷渡。他登上了一艘带着私货开往广东的葡国商船，到达了广东南部九十公里处名叫上川的一个荒岛；那是中国官吏暗通私商的地点，中国帆船常来此同葡国商船私通有利的交易。沙勿略在那里等机会，使人把他偷偷带进大陆，但人都逃避不肯做；谁也不愿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外国人引入中国境内。两个月已经过去，大家都设法劝他放弃这个企图，但他不肯；不过他已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他在一间简陋的茅屋内，孤身一人，祇有一位忠实的中国传道员陪伴着，延至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黎明咽了最后一口气，享年祇四十六岁。

### 沙勿略的事业

沙勿略传教的生活一共十年。在这十年的期间，——当时的交通不但迟慢，而且常有危险——他或乘船或步行，走了十万公里的路程。他的生活可用「劳碌」两字来概括。他毫无准备的由这一种水土气候，骤然进入另一种不同的水土气候，由印度或摩鹿加窒息的酷热，忽而转移到冰天雪地的日本。他的穿著常是简单而恶劣，并且常守夜减睡，休息的时间很短，可说他除非乏累得不支时总不睡觉；他的工作就是讲道、听告解、祈祷、往来奔走；祇有在乘船过海时才稍微松弛一下。他在骇人的暴风雨中行走的那种毅力，决非由尘世的事物所吸引，他心目中的远景，乃是愿多吃苦，希望为天主争取愈大的光荣。他逝世

时正在壮年，一贫如洗，身外无长物。他在弥留时，幸有一位中国人在侧，总算不虚他长途跋涉来寻觅中国人的希望。

沙勿略的毅力，全来自他在祈祷中和在同天主亲密结合中所获得的圣宠，否则他决不能完成那些伟大的事业。他有时无论黑夜白日，在祈祷中神魂超拔地度过很长时间。他那炽烈爱天主的心和渴望拯救人灵的心火，在他写给欧洲的信函中，充分流露了出来。那些信函在各处流行，被人抄录，被人翻译，被人热烈地阅读，真不知有多少青年由此获得了天主的圣召，而去步武沙勿略的后尘。

有人怪他常更换传教地点，走马看花，似非上策；如果在一处多耽些时，以便使教友的信德更为坚强不是更好吗？其实沙勿略虽向前进去开辟新地，并没有放弃他已开教的地域，他为所建立的教团训练了传道员，并委托别的神父照顾；他本人在别处也监视着这边的工作，且以书信鼓励他们。沙勿略同圣保禄一样，负着开路先锋的使命，常感觉自己被号召去把福音传遍各处，一直到最边远的地区。

又有人怪他没有充分的准备便给大批的人付了洗。其实沙勿略的传教方式，是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对巴拉未和其他朴实的民族他有时便大批地授洗，甚至照他所说的，「累得抬不起胳膊来」。反之在日本，他所接触的多次是有学识的僧人或缙绅，或民族的精英，他们都很好奇且有思想，对他们得抱着不怕辞穷的危险，显示学识丰富，思想敏锐；他已清晰地看出来，为归化这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先该对他们的风俗和本地的宗教有深刻的认识，且须赢得官绅的信任才成。他在日本所归化的也不过千人，但

他已打开了公开传教的路线，后继的人踏着他的路线，数年之间便得了惊人的成绩。

## 伍 圣方济各·沙勿略以后日本传教的情形

### 增进时期

沙勿略于一五五一年离开日本时，留下了一千新教友，他所播下的种子，很快地便发展起来。封建的制度很有助于这个发展，因为郡主一奉教，便有许多人步武后尘。织田信长(Nobunaga)即位以后，对佛教的僧侣很有反感，对耶稣会士却优礼有加。耶稣会的巡阅使范礼安(Valignano)系意大利人，是一位坚强而善组织的人；他于一五七九年率领十四位会士抵达日本。他把日本分为若干传教区，那是日本天主教的极盛时代。不到二十年，已建立了三百座圣堂，受洗的人数接近二十万；范礼安神父欢欣之余，至称日本为「天主的灿烂花园」。他返回印度时，带去了四位极年轻的少年——更好说是儿童——是日本新受洗的贵族子弟，他领他们去觐见葡王和教宗，权充日本教会的代表。他们八年后返国，三位已成耶稣会士，其中一位后日为主致命。

### 第一次教难

日本教会不久便遭遇了阻难，首先是誓反教在欧洲发展的结果。誓反教国家英吉利和荷兰的航海业崛起，驱走劫掠载运传教士赴远东的葡国商船，后来的传教士不易继续。另一面日本的政治情势也正动荡不已，圣教会便不免遭受波及。织田信长(Nobunaga)被丰臣秀吉(太阁样)(Hideyoshi Taicosama)推翻而自立为王，统一日本全国。开始他还对传教士表示好感，一五八七年骤然改变态

度，反对耶稣会士甚烈，命令他们离境；他们消声敛迹了一时，继而不顾他的禁令，暗中继续传教，归化者甚伙；风暴便逐渐消散。翌年方济各会士来到，开始公开布道，建造修院。这样一来，却激怒了皇帝，教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料一五九六年一艘西班牙船被风吹至日本海岸；按照地方法律，货物应被充公。舰长想以威胁阻止充公，扬言倘日本官员敢贸然行事，西班牙王必来报仇雪耻，象征服美洲那样来征服日本；何况传教士遍布境内，必将作他们的内应等语。日皇秀吉 (Hideyoshi) 大怒，决心非严加示惩不可：遂命逮捕六名方济各会士及十七名日本教友，其中有两名儿童，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此外还有三名日本耶稣会辅理修士。将以上一千人等带至长崎 (Nagasaki)，在众教友前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英勇地殉了教，至死不停地讲道唱歌。儿童们临死时还开始唱「儿童们，请赞美上主」那篇圣咏。

这第一次流血的惨剧，对日本教务的发展不但毫无不良后果，反之，殉教者这样以身说教，却赢得了莫大的崇敬<sup>①</sup>。在一五九八至一六一二年之间，又有十万余人受洗。

## 第二次教难

第二次教难蹂躏了「天主灿烂的花园」，几乎将这生气勃勃的青年教团完全消灭。教难的原因很多：因为它与本地的信仰对立，自然引起仇视；对西方来的事物缺乏信任；有些传教士作事不明智；由于英荷二国誓反教商人的嫉妒，敌视班葡二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声言他们是本国进侵日本军队的先锋：以上都是激起教难的原因，至少助长了它的凶焰。

一六一四年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家康 (Shogun Ieyasu) 出谕，取缔一切宗教，放逐所有的传教士，拆毁一切教堂。一百多名耶稣会士被遣送至澳门或马尼拉，走时并加警告：倘敢返回日本，必死无疑，决不宽贷；一切港口都严加戒备。至于日本教友却成了众矢之的，受尽了各种虐待，逼令叛教；处死者日众。一六二二年，五十二名会士和教友致命，二十七名被斩首，其他被焚死。虽有几名英勇的耶稣会士及方济各会士，冒死藏匿民间或偷渡入境，也无济于事，大多数教友都成无牧之羊，终难幸存。

自一六二三年起，家光将军 (Shogun Iemitsu 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 时的教难更加彻底；凡有信教之嫌者，便令其脚踏苦象；刑罚也极尽惨酷之能事，例如将人倒悬在满盛粪溺及种种肮脏物的坑上，历数日之久，令其薰死；或将人浸入沸腾的硫磺泉内，使皮肉被蚀烂而死。

一六三七年，在教友最多的有马 (Arima) 一带，百姓为大名国君 (Damyō) 的横征暴敛所苦，起而反抗，继而逃往岛原 Shimabara 岛。最后为追兵所击败；凡声明不是教友的都可保存生命，其他男女和儿童共约三万五千人，集体予以屠杀。

自此两世纪之后，日本与外间的一切接触完全断绝；不但禁止外人入境，日人也不准外出。一六四〇年澳门的葡人派遣使节试图恢复贸易；充当使节的人员及其他乘客全遭屠杀，祇留数人返回，以便将日本无法变更的决策，通知其本国人。

关津虽然如此森严，但在此一世纪之中，仍有传教士数次偷渡，但均惨遭杀戮或被监禁，无一幸免。

日本的教会，既无神父领导，又遭惨烈的教难，自然注定要消灭；但许多英勇的教友宁死不肯叛教。究竟殉教的有多少？那祇有天主知道了；但敢断定至少超过了四千。

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但在长崎一带，仍残存着一个教友的核心，保持着信德，一代一代地自相传授。二百年以后，即到了十九世纪，政治的情形既经转变，在那昔日「天主灿烂的花园」的地下所潜藏的一粒小小种子，又重新发育繁荣起来。

## 陆 利马竇在中国

### 进入中国内地的最早尝试

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以后，葡国商船并能一年两次至广州贸易。这是中国自与欧洲隔绝以来所开放的第一个门户。中国人为贸易的利益所吸引，也大批涌入澳门；于是澳门不但成了贸易的中心，也成了来远东传教的教士们的根据地。

在圣方济各·沙勿略逝世后的二十五年期间，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企图屡经尝试；来自澳门的耶稣会士，和来自马尼拉的奥斯定及方济各会士，虽曾在大陆驻足，但不久便遭驱逐，多次还遭受了虐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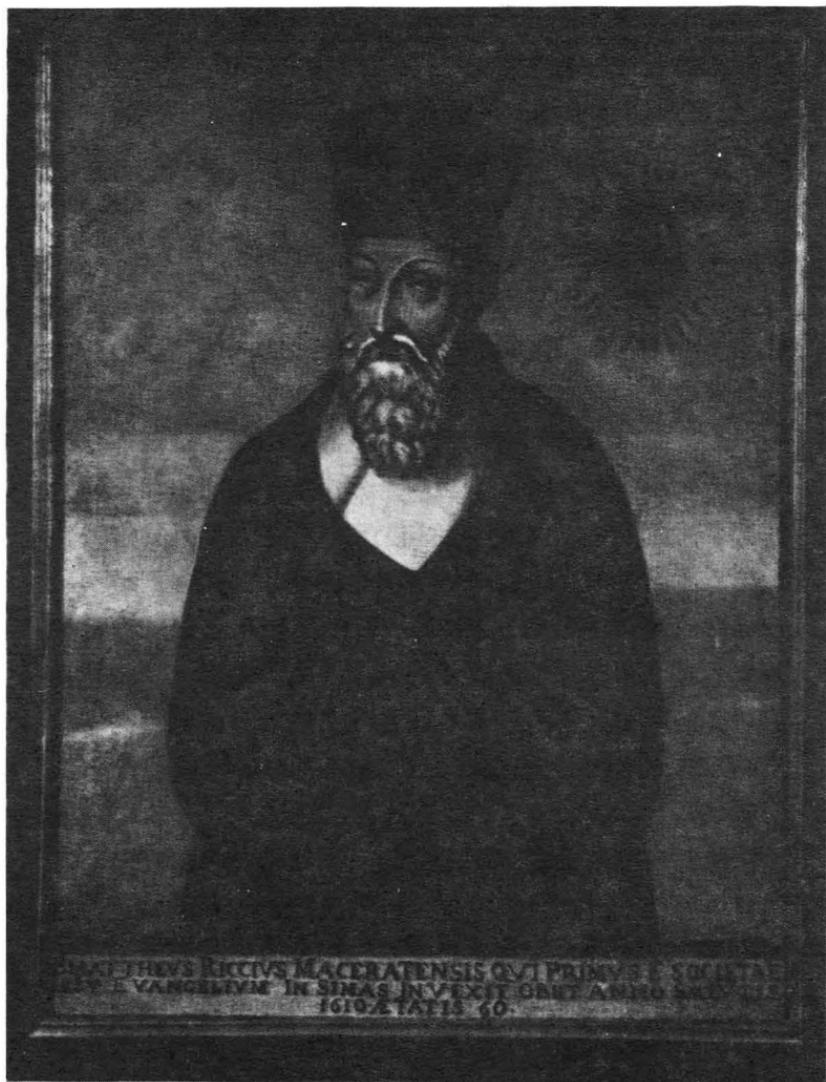
一五七八年，耶稣会东方传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神父(Fr. Alessandro Valignano)在去日本视察的途中来到澳门。这位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适当继承人，知识广泛，识见远大，由印度至日本沿途成立了教区，建筑了圣堂，开办了学校。他在居留澳门的八个月中，深得中国人的尊重，遂决心立即着手向这伟大的人民实行传教工作。但他

深明已往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充足的准备，对中国的语言风俗一知半解，多不谙练，因此未能利用有利的机会。如不改弦更张，将永无使中国归主的希望。派遣传教士，当妥为选择，认真准备，方能适合传教的职务；尤当放弃旧日的习惯：比如，往日倘一名澳门的中国人归正，必定使他变成一个葡国人，给他起一个葡国名字，改穿葡国服装，学习葡国的风俗习尚；这都是此后必须改革的。范礼安神父认为与其使中国人葡国化，不如使传教士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

范礼安神父召来中国的第一名传教士是意大利人罗明坚(Fr. Ruggieri)，命他先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这在今日看来，似乎非常简单而自然，但在当时则认为新猷，实行起来不无困难，实际上还没有一位西洋人学习过中国文字。他的同伴责以浪费光阴，难望成功；罗明坚不理他们的嘲笑与反对，埋头苦读，祇是进步慢一些。将近一年，他偕同葡国商人至广州，竟因谙习中国礼貌习俗，并以华语试图交谈，博得了官宪的同情。

### 利 马 竇

不久范礼安便把利马竇(Fr. Matteo Ricci) ⑫ 召来作罗明坚的助手。利氏亦意大利人，生于当时教宗治下的小城玛赛拉达(Macerata)。由于奇妙的偶合，或更好说是天定，这位理应被视为奠定中国传教基础，要实现圣方济各·沙勿略开教中国的理想人物，恰巧生于沙勿略逝世于中国海岸附近上川岛之年(一五五二)。利氏于十九岁时入耶稣会修道，天资聪颖，不但对文学有深厚的根柢，且在耶稣会驰名国际的柯拉维神父(Fr. Clavius) 指导之下，对算术，天文，地理等获得了坚实的知识。因他愿赴远方传



利马竇

教，遂被派往印度，在彼完成了他的神学课程。于是范礼安便选派他来中国传教。利氏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李之藻称他「经目能顺逆诵」)，因此对华语进步迅速。他曾两次随罗明坚乘葡国商船至广州，后得肇庆知府王泮的信任，遂准其留居肇庆。

### 利马窦的传教方式

二位传教士晓得尚不能公开传扬(新)教，否则必立即被驱逐。必须先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中国人对自己容纳且重视才成；于是对中国的习俗和文化中所有的一切优点，表示最大的敬佩和同情。利罗二人进入中国国境既如此不易，深知为能长久居留，必须十分谨慎。知府王泮曾问及他们东来的目的，他们答称「自己本是弃俗事天的僧人，来自天竺国，向慕中国政治昌明，愿得一块干净土，建屋造堂，终身事奉天帝。」云云……但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神父的身分，却总不隐瞒；为此一在肇庆定居，便将圣母抱耶稣圣婴象供奉于中堂。前来拜访的人，鲜有不询问圣象的意义的；于是他们便乘机将信德的初步道理予以阐释。

他们也利用由欧洲带来的物品引起来访者的好奇心：如大小钟表，天文及算术仪器，分析光线的三棱镜，西洋乐器，代表欧西名城及建筑物的图画，印刷和装璜美丽的各种书籍等，都一一展览陈列。使以前认为除中国以外，其余都是蛮貊之邦的中国人，大为震惊。西洋僧人带来奇异物品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尤其是官绅和学者。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帧世界舆图。以前中国人所画的地图，常把中国画在中央，四面环海，四周只画些小小岛屿，以代表几个所知的国家而已。因此许多

士绅看见利马窦的地图，其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例相差太远，不免说他是信口雌黄，不予置信；后经利马窦解释，该图决非臆造，实费了仔细研究的功夫，他们又见图经纬线分明，各地都有名称，始信以为真；于是请求利氏画一「万国舆图」，标以中文，俾能认识。利氏便照办，并附以解释的中文，及合乎中国人口味的图象，立即付印，并将数帧呈献给王道尹（当时知府王洋已升任岭南道道尹）。王道尹喜出望外，便以之分赠亲友。这为使人重视番僧，并准备中国学者信奉他所讲的道理，称得起是一种最有利的工作。二位传教士便利用这种心理，给人讲述圣教道理，说明这正与「中国古籍所言之天与上帝，及国人凭良知所获得对天主的信仰」，不谋而合。这样来访的人，不祇对西僧的奇异物品，并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渐渐发生了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二位神父便印制分发印有天主十诫的传单，名曰「祖传天主十诫」。不久又由中国学者协助，编了一本问答式的要理：由一中国人发问，西洋教士作答。这本书名「天主实义」，甚为人所重视，印了数千本分发，德信的曙光借以传至中国各地。此外教士们生活谨饬的善表，对人的爱德，困苦中的忍耐，都使人异常感动；他们还遭受了数次教难，几乎使他们一败涂地。

在这些传教的试探中，利马窦常担任重要的角色。一五八八年，罗明坚回欧，请求教宗向中国派遣使节；但未能成功，罗氏也未重返中国。继之而来的是一位青年神父麦安东 (Fr. Antonio d' Almeida)，不幸三年后即去世，教务暂由利氏一人撑持。

不幸初步的成功，不久便遭到了重大的打击。新任两

广总督刘节斋到任不久，即对利马窦所住的美丽西式建筑，动了垂涎之念，意欲霸占，乃令岭西道通令教士返回澳门；眼看六年之心血废于一旦。不料刚至广州，忽被召回；但总督不准其留居肇庆，命他们在别处另建寺院。利氏乃选定了邻近江西的韶州，思欲逐步接近北京，以便一劳永逸地居留中国。他深感不得皇帝明降谕旨，则教士在中国的居留岌岌可危，常系于地方官的喜怒。

### 由僧服改著儒服

利氏等初到肇庆时，常自称系来自天竺的西僧，守贞不娶，于是便仿效圣方济各·沙勿略在日本的行径，剃发剃须，常著僧服。到达韶州后三年，决心改变服装：盖因利氏渐知和尚在中国，决不象在日本那样被人尊重，往往因他们行为不检，遭人轻视；西洋教士因此便联带遭到歧视。利氏又发现中国深受孔夫子之影响，儒者常受社会之尊重。他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乃知文人学士并无宗教的组织，祇是知书明理的上等人物而已，修身齐家治国，皆尊照儒家的原则和理想。于是顿悟，欲打入中国社会而为人所了解，非跻身儒者之林不成，祇靠珍奇异物，决不能引人认真注意。于是乃求得会长的许可，蓄发留胡，抛弃僧人的袈裟，改著丝袍方巾的儒服；一切习惯礼节，皆以土人为模范，自此便以「西方学者」的姿态出现了。

### 试往北京

一五九五年，利马窦乘机赴南京，但不能久留，遂返南昌定居。一五九八年，他又试图前往北京，但时机不利，未能如愿：因当时日本人方侵扰高丽，外国人都被疑为间谍，利氏所拟呈献皇帝的礼品，也未能上达御前。白白期待了两个月，遂决定仍返南京。此时南京的情形大为

改变，一般高官缙绅，皆盼这位著名的西儒留住该城；利氏乘机与之结交，尤其与徐举人光启往来最为亲密。他是一位盛德智慧的学者，先曾研究释道的教义，皆觉于心不愜，今乃与利子交游。

利子在南京虽有不少的收获，但晋京面圣的意念，时常萦绕胸怀。一六〇〇年，又行尝试。他乃带了进呈皇帝的贡品，偕庞迪我神父 (Fr. Diego de Pantoja) 走上了征途；不料此事险遭不测。他们被一位擅权跋扈的太监名叫马堂的所拘留，把他们的行李充了公，并把他们羈押在天津，声言他们是间谍。竟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押了六个月，连最有势力的朋友也束手无策。岂知正在绝望时，忽来转机；原因是万历皇帝忽然忆起西人所要呈献的自鸣钟，立即下谕进呈。

利氏等遂于一六〇一年一月四日进入北京。神宗皇帝深居紫禁城，日与嫔妃太监为伍，利氏等从未蒙召见，也从未获得居留北京的明文许可；进呈宫中的贡品，却引起了礼部的惊奇与责难。皇帝对吾主及圣母的圣象，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命安置库中，对大小两座自鸣钟则非常欣赏。因为深怕无人能管制修理自鸣钟，皇帝遂传话命教士不得离开北京，以便随时照料，膳食等费由礼部供应。利马窦十八年留京的宿愿，因得以偿。教士虽未得面见皇帝，但安居北京的目的，则已达到。明史载(第三百二十六卷十九页)：「帝嘉其远来，假馆授祭，给赐优厚……利马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他以后得友好的协助，得在北京觅地居留，北京最古老的南堂即其遗址。

### 利马窦的晚年

利氏在他生命的晚年，居留北京凡九年，竭精尽力，

坚固其已完成的事业，并准备将来的进展。他的住所常为拜访的客人开放着，他以西方的学术如算术、天文、地理等，引起了中国士大夫及学者们的兴趣；但他对东来传福音的目的则无时忘怀；他终使政府的几位高级官员领洗入教，且同他们保持着永不衰退的友谊。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徐光启(一五六二—一六三三)，此公于万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始点翰林，名列第四；他已于前一年在南京，从罗如望学道受洗，圣名保禄；官至礼部尚书，并拜宰相；他曾协助利马窦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为中文，被史家誉为输入西学之先声，被利氏誉为开教之柱石。

另一位迟迟受洗之人为李之藻，他是杭州仁和人，字振之，又字我存，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名列第五，官至太仆寺卿。他也和徐光启一样，协助利氏翻译了不少科学书籍。他对研求教义，很是热心，但迟迟未能受洗者，因有妾故，他却使全家都受了洗；最后本人也在利氏死前不久，遣发了爱妾，毅然受洗，圣名良。从此便将自己的余生，全献于天主，为协助宣传圣教之用。

此外尚有杨廷筠，也是杭州人，官至御史和京兆尹，他与徐光启，李之藻三人，被誉为「早期中国教会之三大柱石。」

利氏因友人之助撰著了许多书也修订了前人的著作，以勉人进修或阐明教义；最脍炙人口的是「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国人见一西人竟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自不能不叹服其学问宏深，道理高妙。利氏在其著作中，常言天主教虽传自西方，但与中国之礼教并无枘凿不入之处。利氏著作中影响人最深者为「天主实义」，曾引致了多人信教。⑬

利马窦既到达了北京，并未忘怀他在别处所建立的教会。他以自己的方式训练所属的传教士，派遣他们到已经开教的城市去工作：一六〇一年，北京以外，已有南京、南昌和韶州三处，不久又加上了上海。每个堂区都有两位至三位传教士，此外还有黄明沙钟鸣仁二位中国耶稣会修士，及其他传教员。他在北京也不时同他们书信往还，指导工作。

利氏在繁忙的工作以外，还得和中国或欧洲的同会会友们，及请教他的文人学士们，音信往还；应付皇宫内的召喚，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有时甚至连用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无论怎样繁忙他却总不忽略祈祷，否则便无处汲取力量，以支持那样劳苦的生活了。终因操劳过度，筋疲力尽，回天乏术，乃于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卧病八天之后，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按农历为五十九）。死前指定龙华民神父（Fr. Nicolo Longobardi）继位。



死后皇帝于阜城门外滕公栅栏特赐一块葬地。除外国使节外，对一位普通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正式饬赐葬地，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利氏曾言他的死亡将有利于教会，诚非虚语。皇帝这种恩赐，无异是对天主教传教士的

一种正式承认和褒扬，对他们所传的宗教，也是一种保障。

### 利马窦的工作成绩

直到利氏去世时，中国人受洗者不超过两千。对他那么大的努力来说，这个数目固然不算大，实际上却可算作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成绩。他临终时说：「我已给你们打开了门户！」中国素以自己的文化自豪，不接受任何外来的影响，利氏竟能把牢闭的关防叩开，功劳的确不小。

当时祇有利氏能完成这种工作，那是毫无异议的。他不祇是博学多识，德行也极辉煌；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无论士大夫或平民，对他都非常爱戴；他办事固然明智而又有耐心，但他那百折不挠的毅力，和那能化险为夷的机智，也很令人佩服。

初世纪的护教者们对希腊的哲学所作的，利马窦也设法为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作了：就是尽力把其中所有美的、善的和正大光明的予以保留赞扬，然后再使它公教化；这也是二十世纪的教宗们所不断称赞的传教方法。

### 利马窦对中国宗教所持的见解

当时遇了这样的问题：天主教对中国古老的信仰和礼俗应如何适应？哪些应视为邪神崇拜或异端而当予以扬弃？哪些可以保留？

利氏发现中国所崇奉的道理共有三种：即儒、释、道。他对民间盛行的佛教，和它那各式各样的偶像，以及轮回等邪说，批驳不遗余力；对道教的迷信，他的态度也相当严厉；但对儒教则表示同情。他认为孔子既然对来生的信仰，毫无应行应禁的规定，那么他便非宗教家了，祇是一位道德、政治和教育家而已；很可以把儒家的教训作

为初步的基础，然后提高到天主教的信仰。

在实行方面，有不少问题，经常成了传教士之间争辩讨论的话题：例如：对宇宙的主宰，中国应采用何种名称？对敬拜祖宗，以及文人学者对敬孔所行的礼节，应持何种态度？

罗明坚自始便采用了「天主」二字，认为非常适宜，以后利氏也继续采用，尤其是他那部著名的「天主实义」，更是明证；但中国古籍所称的「天」和「上帝」是否仍能采用？

利氏深知，当时的学者对「天」字或者祇认为是物质的天，对宇宙或者持无神的思想。

但他细读古籍，深信古人对这些名称的意义，决不限于物质，实际当指一位全知的神明；祂是一切权威的根源，道德的原则，而且是「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主宰。由此结论，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天」和「上帝」，实与传教士所称的「天主」同一意义；所以为指造物主和全能的神明，「天主」「天」和「上帝」三种称谓，都可采用。

至于敬祖和拜孔的礼节，是否可准教友奉行？或者应视为迷信而予以禁止呢？这个问题对传教的进展，实在至关重要，这些敬亡人的礼仪，被认为属于人类的第一义务：孝道；摒弃不行，无异自绝于家庭和社会；而且文人学者，倘不敬孔，则不能接受任何功名或任何官职。

利氏细研中国古籍，长期观察人举行那些礼节的情形，并与许多学者作了深长的讨论后，认为敬祖之礼——至少在初创时——祇是孝爱感恩的表示而已；敬孔也和敬祖无异。所以他深信，在文人的心目中——至少在当初——「决无敬拜偶像的用意，也许可说毫无迷信的色

采。」我们能看出来，利氏在这些微妙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何等谨慎：他并不否认，在一般的民众和多数教外人的心目中，把迷信渗入了传统的礼仪内，但他以为剔除迷信的观念，而使人相信敬孔祇是俗礼，并无宗教的意义，决不是办不到的。

传教士们未能完全同意利氏在这方面的看法，特别是他所选的继任人龙华民；他认为利氏由中国古籍提取定义未免夸张；他也承认能从这些古籍找到同天主教的道理更有利的解释，但他请人注意各注释家——尤其自宋朝以来——对那些字句，多半都予以无神和唯物的解释。当时的争论，还祇限于传教士之间，但以后却引起了剧烈的争辩。

注解：

- ①因为第一次到达美洲的航海家，原来是想去印度，为此便称美洲土著为印第安人；此名沿用至今，已视为当然，从未有人想去更正。
- ②教宗亚历山六世将世界分为二势力范围的界线，是自亚速群岛 (Azores Isls.) 以西一百海哩的经度起，此经度以西之地归西班牙，以东之地归葡萄牙。但翌年班葡二国之间又订立了道而代西拉 (Tordesillas) 合约，指定两国之势力界线为该群岛以西二百七十海哩处，这样可把葡国航海家加伯拉尔 (Cabral) 所发现之巴西，划归葡国。

有人以为教宗在此等事上插足，未免有赞成该两公教国的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之嫌，其实教宗只是以仲裁的身分给他们划分了势力范围，避免彼此冲突而已；这样国际间的和平得以维持。最近在十九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情形，就是誓反教的德意志和天主教的西班牙，曾同意请求教宗良十三世、对他们在占领加罗林群岛 (Caroline Isls.) 的争执上、出面作调人(一八八五)。何况在类似的事件上，十六世纪的教宗们屡次敦促殖民者，要让外教民族得享自由，隶属于被征服的属地也该是情愿的。

- ③当时的墨西哥幅员广大，不祇今日的墨西哥，连今日美国的德克撒司 (Texas) 及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 都包括在内。
- ④若西班牙人将印第安土著全部有计划的屠杀，固然不足置信；但集体的屠杀尤其在安地列斯群岛，也是不能讳言的事；不过就大体来说，土著还是被尊重。反之，对北美来说，中美和南美的主要印第安土著还是被保存了下来；就如墨西哥、秘鲁、以及巴拉圭等国，大部分的民族仍属土著和印第安与西班牙的混血儿。
- ⑤圣女罗撒于一六七一年被列入圣品，这是美洲接受此殊荣

的第一名，并被声明为美洲的主保。

- ⑥他于一九六二年，被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列入圣品。
- ⑦当知葡国在最盛时，居民不逾一百五十万；这不难使人明了，它虽尽力号召其他奉教国家帮忙，但在偌大的属地中（自巴西以至远东），也很难供给足够的传教士。
- ⑧有人说方济各·沙勿略，如同宗徒们在圣神降临日一样，获得了能通万国方言的殊恩。有几次，那些经常听不懂他语言的人，竟了解了他所说的话；但他总是说他离不了通译，赖他们的帮助，他把经文和教义译成了方言；他有时也结结巴巴地说几句方言表达他的思想，但他感觉很痛苦。不过在他的生平中的确也不乏出奇的事迹。多次他能知道在远方所发生的事故。人们认为他所行的许多奇迹，决不能说都不可靠、尤其无法否认的，是天主借他治愈了许多病症，而所用的方法却是不能以人力解释的。
- ⑨一九四九年，日本全国曾对开教四百周年举行隆重庆祝。
- ⑩德川时代，以诸侯分治全国。山口县是当时周防、长门两个「国」，诸侯的领地当时称国。
- ⑪长崎的二十六位殉教者，于一六二七年荣列真福品，又于一八六二年列入圣品。
- ⑫罗光主教所著「利玛窦传」光启出版社出版；「西泰子来华记」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及光启社联合出版。
- ⑬此书修改多次，也翻印了不知多少次，日本和高丽都有译本，乾隆朝且编入「四库全书总目」内。

庞迪我是利氏事业中得力的助手，他对于中文也很有研究，文笔也很优美。

他曾著「七克」，引起了士大夫的惊奇；这本书也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中，并曾多次翻版，最近台中光启出版社所翻印的「七克真训」，乃经遣使会士所改订的，非庞氏原著。

## 第十五章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繁荣

天主教的历史，在十七世纪初叶，呈现了一种强烈对比的局面：一方面由誓反教改教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局面已逐渐固定；另一方面在十六世纪所完成的革新工作，一尤其是从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已结了美满的果实：就是教会生活的奇妙繁荣。

十六世纪，尤其在誓反教未波及的两个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天主教已呈现了焕然一新的面目；另外在这两国还出现了大批的圣人，足为这革新生活的明证。十七世纪时，法兰西无论在教会的版图上，或在政治的生活上，无疑地都坐着欧洲第一把交椅。自一五六二至一五九四年，疯狂的内战——政治与宗教的利害冲突搅作了一团，难解难分——弄得国家遍地血腥，几乎把它搞垮。幸赖国王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以南特诏令 (Edict of Nantes) 颁布了信仰自由，不失为明智之举。这个诏令，虽基于容忍的观点——这是欧洲以前，无论在属于誓反教的地区，或属于天主教的地区所从来没有的——却在法国恢复了和平。路易十三世 (Louis XIII 一六一〇——一六四三) 对宗教热心，并关心教会的利益，他的宰相李士留枢机 (Richelieu) 也是一样，无论人对他的外交政策怎样批评，但他对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确曾尽力。圣女大德肋撒的著作，圣嘉禄·鲍劳梅、圣斐理伯·耐理以及圣方济各·撒肋爵等的工作，虽然对造成这有利的环境都有影响，但还不足以解释这种革新的强度。如果想追问究竟法国此时间何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圣人，神秘学家和那么些神修作家；这就如何何以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那么多的伟大艺

术家一样，除了归功于天主的上智安排以外，是难以找到正确的答案的。无论如何，法国此时的神职界大有起色，教友的生活也非常浓厚，那却是事实。

## 壹 神职界的革新和新兴的修会

祇靠特利腾会议的法令，决不能使神职界的衰颓立即呈现起色。大多数的司铎，尤其是在乡间，率皆无知得可怜；有的甚至连圣事都不会举行。特利腾会议后六十年，很少有修道院的建立；当时还正在寻求，怎样实行大公会议命令每一教区建立修道院的方法。同誓反教徒的争辩，使得神职人员的职务更为艰巨，那么栽培有教育有神火的司铎，更是刻不容缓的事；庆幸为完成这项职务，出现了一大批卓越的人物。

### 白吕耳

从事改造神职人员的第一人是白吕耳神父(Pierre de Bérulle 一五七五—一六二九，且于一六二七年升为枢机)。他深知司祭的崇高地位，因此对大多数司铎的不称职，很感痛心。他为挽救此弊，在法国创立了祈祷会(Oratory)(仿照圣斐理伯·耐理的祈祷会而与之无关)。祈祷会的司铎并不失发任何圣愿，他们祇愿实际度司铎完备的生活，而在讲道和施行圣事上作神职班的助手而已。以后他们也建立了修道院，并在学校内献身教育青年的工作。

白吕耳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司铎从其中汲取神修生活的食粮。白氏把敬礼降生成人的圣言列为首要的目标，指引人灵对越天主而人的耶稣和敬礼圣母。天主是世界的中心，使人常想人受造的惟一目的

就是天主自己；这是白氏神修的基本原则。

### 圣味增爵

在神修的道路上指导圣味增爵( St. Vincent de Paul 一五八一——一六六〇)——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代表之一——，实在是白吕耳不小的一件功德。在当代所有的圣人中，谁也没有圣味增爵更出名，对教会更有影响；但当他晋升铎品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要成一位神职界的革新家。他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穷乡僻壤，小时牧放父亲的牛羊。但他父亲理会了儿子的聪明，决心指导他走上神职界；这在当时，为一个平民的儿子，是跻身上等社会最稳妥的路线。实际上，味增爵直到三十岁左右，好象对积蓄财富比在神修之途上前进更为关心。他在三十岁时竟作了法国王后的家庭神师，他好象就这样下去做与世浮沉的司铎便满意了。不料正在此时，他生活上起了重大的波澜，他得认识白吕耳也适在此时，白氏对他有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做乡村的本堂神父时，亲身体会到乡民对宗教生活的可怜情形，对都市和有知识的人不乏修会的会士去费心，但乡村的老百姓则如无牧之羊，乏人照顾。

### 遣使会的神父

此时对乡民布道的意念，开始在味增爵的心中萌芽。本来在他以前，已有热心救人的神父们，偶尔一两个星期或者有时一月，到乡间去布道，为唤醒乡民的宗教生活。味增爵本人，也感觉这种布道所能发生的益处；但他认为欲使这种功效持久不衰，必须按照整个儿计划重复举行这类布道工作才成：那么就非有一部分专心献身于这种职务不可了。他于是便召集了几位同志从事这种工作；这个小团体逐渐增加，直到后来在巴黎中心区，有一座广大的宅

院赠给了味增爵，作为他活动的中心时，人数便更加可观了①。味增爵给他这些神父们厘定了规矩，指定了生活的目标：就是先圣化自己，然后去给穷人——尤其是乡野的穷人，宣讲福音。他又加上了第三种目标，作为以上二种目标的综合：为能给一般百姓宣讲福音，必须先再教育从事牧灵的神职人员才成，因为当时的神职人员可说已经很腐化。这就是遣使会的缘起。

### 神职人员的整顿工作

主教们曾请求圣味增爵，对行将领受神品的青年们，领导退省工作。这种退省曾延长数星期之久，对提高神职人员的神修，确曾卓著成效；但这数星期的准备，为长久维持神父们的热心神火，尚嫌不足。圣人于是又设立了「星期二神修训话」，十年之久给巴黎渴望在灵修上进步的神职人员训话，直至圣人去世为止。这种训话的成效是惊人的，巴黎神职界的有名人物，也于百忙中抽暇去听这位神父的朴实训话。

这便足以使神职人员完全改善吗？当然不够。这祇是整顿神职界的临时治标办法；治本的办法，非建立修道院，使未来的神职人员接受长期的栽培不可。因为直到那时，法国对建立修道院的尝试，尚无多大的成绩。圣味增爵于是便开始建设修道院，从此管理修道院便成了遣使会士主要的工作之一。

整顿工作如不能及于首脑人物，便不能算完备。一五一六年圣座同法国国王所订立的协定，使国王有权选派主教，然后由教宗授予治理教区之权。但此种选择，往往不顾教会的利益。法王路易十三世死后，圣人对教会的事情，做了摄政太后的顾问，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尽力

使王后选择些称职的主教。

### 圣味增爵的慈善事业

圣味增爵虽不是整顿神职界的惟一人物，却是对此最有效力的工作者之一，这已足以使他引以为荣了；但他的热心神火却不以此自限。他提倡并亲手建立了许多慈善事业，尤其在这方面，他给教内教外都留下了最活跃的纪念。他因爱主情深，自然便要发泄于实际爱人的工作，对救助茕茕无告的人，使他席不暇暖。他常一再地说：「我们爱天主吧！弟兄们，爱天主吧！这却是要以出力出汗来实现哪！」他抓住一切机会，去救助可怜待救的人，他并且在这种工作上，表现了组织的天才。当他在—六一七年任职本堂时，被遭受悲惨命运的一个家庭所感动；因为全家的人都患急病，以致彼此不能互助，他便组织了一个慈善协会：专门在身灵两方面救助最贫病的人。他曾理会：好心肠的人随处都有，但所缺乏的是组织和持久的能力。于是他便把慈心的太太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慈善协会，并给他们立定了规章。这些慈善协会，以及当时已传开的圣母会，都争先恐后地在教友间从事互助工作；他们不但成群结队的去实行爱人的事业，同时并按照福音的精神努力圣化自己。不久许多贵妇们便以「贫穷人的婢女」姿态出现，去献身救助监狱和医院中各种悲惨待救的人，并设法照顾被遗弃的婴儿……

不久味增爵便经验出来，为使照顾穷人的工作能继续维持不懈，单靠世俗人的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有终生献身的妇女才成。他乃赖一位寡妇——圣鲁意丝·戴马利雅克（St Louise de Marillac 一五九一——一六六〇）的协助，建立了仁爱贞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原来圣方济

各·撒肋爵早已有意创立一个修女会，从事慈善工作，扶助贫病，但曾遭他人反对而归失败；因为当时的人都认为修女不幽居修院而从事社会工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圣味增爵也接受了他这种思想，因此对仁爱贞女规定了：「这个修会没有修院作为会所，只有病人的住宅；以租赁的房间作为居住的斗室；以本堂区的圣堂作为圣堂；以街衢或医院为修院；以服从为修院禁地；以端方为头巾。」这样产生的一个修会，却有了意外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五、〇〇〇修女，可称为人数最多的女修会。这些「白帽子修女」——这是中国人对他们的俗称——，已在世界各个角落传播着基督的博爱。②

凡圣人所见到的痛苦患难，没有不立即设法救助的：例如被判罚入皇家舰队的船底去摇橹的罪犯；被回教徒的海盗俘虏又被卖到非洲为奴的教友，他派遣遣使会会士们去救助他们；他为被战争蹂躏的省分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组织发放救济品的人员……他真具有组织的天才，堪称现代「天主教福利会」的先驱。此外他还在街头设立粥锅，建立工厂，孤儿院，养老院，救济失业的人。总之，各种社会救济事业他都经手创办了。为此教宗良十三世于一八八五年特奉他为一切慈善事业的主保，他真当之无愧。

味增爵虽已年老多病，但对他所创办的事业仍爱护备至。当他寿至八十高龄于一六六〇年逝世时，遣使会会士已传布至意大利、波兰，直至马达加斯加，（即今日的马拉加西）。他所栽培陶冶的许多主教、神父，仍继承他的遗志进行不懈。

苏比斯会士

追随味增爵致力于整顿神职界的健将之一是哦利耶(Jean-Jacques Olier 一六〇八——一六五七)。他也和当时其他的许多司铎一样，视教会神职为「进身之阶」而加入了神职界，因此起初生活很腐化；以后被天主的圣宠感召，又经味增爵和白吕耳二位的薰陶点化，遂改弦更张，矢志为善。他也和他的二位导师一样，认为为陶冶有志晋铎的人，建立修道院实为当务之急。但为栽培出好学生，必须先有模范的师资，修道院也不能例外；因此哦利耶便在他所陶冶的司铎中，选拔了些最优秀的，予以特殊的训练，准备作修道院的师资：这就是苏比斯修会(Sulpicians)的缘起。③当哦利耶于四十九岁去世时，该会的神父已在法国多次管理着修道院，并已分发至加拿大。从那时起，他们在全球各国，曾陶铸了无数优良的司铎。

### 圣若望欧德

十七世纪在法国另外一位对宗教生活的大革新家，就是圣若望·欧德(St. John Eudes 一六〇一——一六八〇)。他生于诺曼第(Normandy)省，加入了祈祷会，是一位著名的民间宣道员。他率领着一小批神父，曾经布道一百一十几次，每次延长六星期，有时更久，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成效显著。他一如以前圣味增爵一样，深感为民众最需要的，莫过于善良的神牧；因此脱离了祈祷会，以便为神父们创立另一修会，目标有二：一是在修道院中栽培神职人员，一是在民间布道。

### 在 德 国

以上所述的创立修会者都是生活在法国的，但也不当忽略其他国家的人士为整顿神职界所作的努力。最著名的一位是真福郝则思(Bartholomew Holzhauser 一六一

三一—一六五八)，他在德国为在俗的神父们创立了一种善会，其中有本堂和副本堂神父，度着团体的生活。④

### 革新的神职界

当时的神职界，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之下，程度已较前更为提高，也更忠于职守。不能讳言的是许久之后，仍有不少俗不可耐的主教存在，他们的膺选多半由于国王的宠信，而非由于功德；但德学兼优的主教神父仍不乏人。我们这里祇引证两位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概其余：一位是鲍须爱(Bossuet)，另一位是费乃隆(Fénelon)，二位都是法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家，而且都是热心出众的主教。

#### 鲍 须 爱(一六二七——一七〇四)

鲍氏是十七世纪中叶常听圣味增爵「星期二神修训话」的一位青年神职人员，他由此对司铎的职位获致了高尚的观念。他尤其是一位演讲家，他那些宣讲，对亡者的悼词，都是教会修辞学上无与伦比的楷模。但他的才华并不以此为限：他还是一位历史家，雄辩家，对当时所争辩的宗教问题他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还撰写了道理与热心兼筹并顾的福音默想，沾溉后人，实深且巨。他和他所最崇拜的圣奥斯定一样，自他那小小的摩城(Meaux)主教府，向全教会发射着正道的光芒；可惜的是，他对当时流行的「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观念，未能完全冲破。

#### 费 乃 隆(一六五一——一七一五)

费氏是圣苏比斯修道院所造就出来的学生。他的才华也是多采多姿的：他对演讲、著作、教育、哲学、护教学、神学等，都是卓犖不群的。他的精神豪迈而维新，不幸对教会所摒弃的「寂静主义」(见后)颇有倾向。

## 修 会

较早的修会，对宗教生活的革新也有不小的功绩。托钵修会如道明会及方济各会，对新的需要也有所适应；特别嘉布遣会发展得非常迅速：一七〇〇年在一千八百座会院中，共有会士三万人。

在专务对越祈祷的修会中不少渐趋松懈的会院，又恢复了原来的谨饬；对重整修会最著名的是郎赛院长(Abbot Rancé 一六二六——一七〇〇)对照笃会的工作。他也和当时许多贵族少年一样，自小就被他的父亲决定了献身修会，目的是为获得许多隐修院的丰富秩禄，连从未视察过的修院也包括在内。起初因为修院资产豪富，他的生活自然俗化；但在三十一岁时忽然痛改前非，将以前贪求世乐的心，一变而为忏悔补赎。他把一切秩禄尽行放弃，祇留下了诺亡底省的特拉波(La Trappe)一处；且规定了最严厉的规矩，长期的大斋，终身谢绝肉食，操劳工作，严守静默；于是这座会规废弛会士也日益减少的会院，忽然会士开始大增起来，且成了其他许多会院的模范，直至今日，仍遵守着圣伯尔纳多所订最严厉的会规。⑤

## 贰 十七世纪的教友生活

### 宗教精神的社会

西方的社会在十七世纪时，深具宗教的精神，比起中古世纪来毫无逊色；无信仰的人可说少而又少。宗教到处表现着活力，维系着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主日和瞻礼日必须停止工作。自十七世纪中叶起，直到法国大革命止，遵守教规的情形，从来没有象这段时期这样普遍过。每月领圣体的习惯也很普遍(这在当时已看作是常领圣体了)。当

然，犯罪和恶声昭著的人并未绝迹，即连朝廷内也在所不免；但违反天主的诫命和教规的人却自认是罪人，痛改前非的动人榜样也时有所闻，他们往往回头之后，终生作着严厉的补赎；上面所述的郎赛院长，不过是千万中之一例而已。

宗教生活严肃最明显的证据，是宗教性的书籍大量出版。在法国从来没有出版过那么多的书，不祇是祈祷和热心的书，以及教义，圣人行传等，汗牛充栋，即连讲论高级神修和神恩的书，编著的也很多；不但是大量出版，而且是普遍被人研读阅览。

此外讲道人员所收获的成绩，也是最好的证明；宣讲布道的风气实在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色。各个奉教的国家都有特别吸引民众的讲演家：例如葡萄牙国的耶稣会士未叶拉 (Vieira 一六〇八一—一六九七)，他先在巴西传教，成效卓著，以后返回本国布道，影响也很大。法国此时期的许多讲道人员，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前面所述的鲍须爱已很使人惊羨，但耶稣会士布尔达鲁 (Bourdaloue)，按时人的评论，还驾乎鲍氏以上；他甚至一连讲四小时，听者毫无倦容。他能毅然而毫不客气地指斥时代的弊端，以及大人王侯的错误而不至招祸，那是今日办不到的。王侯和整个儿社会，都爱听他大声急呼，唤起他们勿忘福音的真理。

### 教友的传教工作

一六三〇年巴黎产生了一个协会，名叫「圣体会」，逐渐发展于法国各地，可说是今日「公教进行会」的先河；参加的人是普通教友，但也有神父、会士甚至主教，但领导人则是在俗的教友。这个协会的特点之一是保持秘密，这

未免使我们惊异。原因是为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怕它利用协会的力量为达成它的政治目的。协会的会员致力于各种慈善事业：如照顾贫困，筹建医院，救济堕落的女子，劝化誓反教徒归正，协助传教等，以各种方式与邪恶奋斗。

他们的救灵神火有时失于检点，尤其对誓反教徒缺乏应有的容忍，至少未能完全公正无私，否则收获必更丰。司铎及会士的活动所以能那样有效，就是因为受了教友们的大量协助。尚无圣体会的帮助，圣味增爵决不能完成他的慈善事业；他们对布道的经济协助很大，对巴黎外方传教会建立修道院出力也最多。可惜法王路易十四世嫉妒它的影响力，竟勒令它解散；不过它对救人灵魂和资助传教的精神，却仍继续存在。

### 公教教育

教育因教会的协助，在十七世纪甚为普遍。往见会 (Visitation) 的修女，尤其是乌苏拉会修女 (Ursulines)，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新兴修会，对女子教育提倡甚烈。在耶稣会及祈祷会所开设的许多公学内，儿童们一贫者率皆免费一所受的教育，相当于现代的中学。在许多本堂区，对贫苦家庭的子女，本堂神父都开设免费学校；但因缺乏良好的师资，教学方法也比较落后。

于是蓝姆(或称里姆 Reims)的一位富有的神父名若翰·撒莱(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一六五一—一七一九)者，为补救这种缺陷奋然兴起，变卖了他的一切财产，召集了一批有志献身教育民众子弟的青年；他们为了专心从事教育，拒绝领受神品，终身作无品级的修士：这就是「公教学校兄弟会」(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的滥觞。

若翰·撒莱不但是一位正牌的圣人，还是一位天才教育家，称之为近代小学教育的创始人，实非过誉。在他以前，教师对学生都是每人个别教授，还有的是让学生自己去读，或委派一名比较优秀的学生去领导。用这种教学法一位老师自然不能接受较多的学生，而且进度也很迟慢。他们正如中国六十年前的私塾一样，欧洲的儿童读辣丁一如中国儿童读古文，意义完全不懂。圣人毅然予以改革：他取消了初级的辣丁课，先教他们学本国文字；然后按照他们的程度分班教授，一位老师同时教一班学生。先在特殊学校造就师资的观念，也是他首先发起的，因此他也是初级师范教育的创始人。这种教学法收效极速，于是便普遍推行开去，很难想象其他更好的教学法了。不过当圣人在生时，他这种改革，曾遭受过不少的敌视和反对；然而一再试行之后，便无人能推翻了。进展直至今日，他的修士已散布至全球各国，公教学校兄弟会 (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 也成了会员最多的一个修会。

### 对耶稣圣心的敬礼

十七世纪对神修生活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传播圣心的敬礼。这种借耶稣圣心在十字架上被刺透的标志，唤起我们对天主和教主对人类的爱情予以特别敬礼的思想，由来已久。中古世纪的圣文都辣和圣大亚尔伯，以及十六世纪的圣加尼削和圣方济各·撒肋爵，都是这种敬礼的先驱；直至十七世纪，圣若望欧德始给它确立了神学上的基础而予以正式传扬。

不过这种敬礼发展得很有限，直至往见会的一位谦卑修女玛加利大 (Margaret-Mary 一六四七—一六九〇)，

在勃艮第省巴莱毛尼 (Paray-le-Monial) 小城的一座会院内，蒙吾主显示后始见发展。在一六七三至一六七五年之间，耶稣曾三次显现给她，向她展示着自己的心，说出了这几句沉痛的话：「你看这颗心如此爱人！」并说祂所得于人的酬报，祇是冷酷无情而已。于是便将传扬圣心敬礼的使命交给了她。

圣女曾遭遇了无数的阻碍与反对。开始时她的长上们都视她为疯癫，不相信她真的蒙受启示；她虽毕生为此事尽力<sup>⑥</sup>，但在她逝世以前，竟未能亲见这个敬礼的胜利果实，祇是由十九世纪至今日，方才普遍展开。

这种敬礼发起于十七世纪末叶杨森异端传播之际，可说适逢其时；因为那种异端，竟把天主表现为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而对圣心的敬礼才唤醒我们想起，天主对我最突出的表现却是爱情。

## 叁 智识生活

继文艺复兴之后，正是几位伟大的智慧之士，奠定现代科学的基础之时，文明和学术已非神职界的专利品；但当时的伟大学者被视为现代科学创始的人物，还都是深具信仰的人。因此在十七世纪初叶，才发生了该世纪科学的天才伽利略 (Galilei) 与教会冲突的不幸事件。

### 伽利略事件

伽氏于公元一五六四年生于意国比萨 (Pisa)，自幼便表现有科学的特殊天才。一五九二年便在帕度亚 (Padua) 大学拥有讲座。他的思想敏锐，求知欲强，对观察尤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用了大部的时间观察天象。当时

对天体的运行，普遍还是遵照第二世纪埃及天文家托勒密(Ptolemy)的学说，认地球为世界中心，固定不动，其他星宿都是绕地球运行。此种学说，直至十五世纪常被人无条件的接受。十五世纪时已有人开始怀疑，最著名的是波兰的神职界人士哥白尼(Copernicus 一四七三—一五四三)，他著「天体运行」之说，称地球及行星均有自转，并围绕太阳运行。此说引起了世人极大的兴趣，但没有决定性的理论以证实他的学说。所以此说既与一般的意见相反，起始尚无多人信服；誓反教的领袖路得和墨兰顿则攻击他甚烈。教宗格来孟七世反而对他表示好感，以后继任的教宗，对这新学说也从未加以指责。

伽利略起初也遵循着托勒密的学说，以后才同情哥白尼。一六〇九年发明了望远镜，他遂用以观察前所未见的天象，并根据所窥见的事实作为新学说的证明。他于是来到罗马，受到了破格的优待，教宗、主教、贵族官绅都愿听他解释天象的奇景。

可见他如果始终站在科学的立场，决不致引起什么不愉快的问题；无奈他被攻击为反对圣经时，他乃进而擅解圣经，并证明新学说与圣经甚相符合。于是该案件便移至圣职部(异端裁判所)。该所于一六一六年处罚该学说的两点：一、太阳为世界的中心；二、地球在转动，命令伽利略放弃他的意见；他屈服了，并应许照办。

伽利略起初忠于诺言，但在一六三二年将其「问答」一书出而问世，内中明显其仍拥护哥白尼的学说。于是他的敌人又报告异端裁判所，控告他不遵守一六一六年所许的诺言。伽利略伸辩，谓自初次受谴责以后，便从未坚持哥白尼的思想。一六三三年圣职部处罚伽氏的书籍，并命他

跪地公开认罪；随即判处监禁；但事实上准许他住在朋友家里，以后又转移到翡冷翠附近他自己的别墅内；在那里他仍继续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对宗教的义务忠实保守。一六四二年逝世于别墅。

相传伽氏在被判以后，曾以脚踏地大喊说：「毕竟它是在动啊！」但今日的历史家们都承认这种传说是假的；不过那倒没关系，事实上今日人人都承认伽氏的学说是正确的了。我们应该承认判他的法官们欠缺明智，想从圣经中找科学的证据实在铸成了大错，因为圣经并不教授科学，它所教的祇是道德和宗教的真理。⑦

在这个案件中，牵涉不到教会「不能错误」的问题，祇是审判伽利略的法官们的责任问题。因为教会的不能错误，祇是教宗或大公会议宣布某端道理为信条，且有意命令一切教徒信仰时才谈得上，但裁判伽利略的命令则是出自圣职部(异端裁判所)——即教廷的一个部院；部院的命令，虽经教宗批准，也不能享有不能错误的特权。

### 信仰的保障

我们已经说了，十七世纪时，信仰已普及于西方。然而尚有若干人对天主的存在和人灵的不死不灭性挑起了疑问。这些攻击基督教信仰基础的谬论，引起了人们的惊骇，从该世纪初叶，便出现了大批的护教著作；其中大部分今日已湮没无存，但有两名众所周知的伟大思想家，虽用的方式不同，却对保障信仰贡献甚大，那就是笛卡尔和巴斯噶。

### 笛 卡 尔

举世公认笛卡尔( Descartes 一五九六—一六五〇)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且为近代哲学之开路人；

但他的著作中当时最著名，且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却有多人不知那是在白吕耳枢机督促之下，为驳斥怀疑派并证明天主的存在而写的。

笛卡尔为使其理论颠扑不破所用的方法，先大胆怀疑一切，然后小心求证以便祛除成见。他愿以个人的努力重建一切体系，除非完全显明完全清晰的，其他概不被肯定。然而笛氏却说：怀疑在明显的事前不能存在：「我思想，故我存在」：这是笛氏的格言。

笛氏是一名诚恳的教徒，他的确愿意卫护圣教，那是毫无疑问的；他一想对天主的实有，建立了比几何证明还显明的论证，极感欣慰；但他的学说，为保卫宗教，却没得到他所预期的效果。「笛氏的天主」，他所证明如同三角形的天主，固然是哲学家和学者们所承认的天主；但祂是否慈善的，为爱人而降生成人的，他决不能以此法证明。这种祇求清晰和绝对明显的理论，一遇奥秘和超自然的问题，便碰壁了。笛氏虽一再谦虚地说，启示的真理不在理智的范围以内，但他的哲学既不给传统留余地，最终必导致不信任信德的真理，这却非他始料所及的。

### 巴 斯 噶

巴斯噶(Pascal 一六二三—一六六二)不但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他十二岁时便自行悟解了几何定理；又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因为他是第一架计算机的发明者；他还是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哪。

巴氏青年的生活相当浮华，回头后便退隐到王港(Port-Royal)的修院，专心致志地思考自己和他人永远的大事去了。他当时的计划是编著一大部替天主教辩护的书籍；但因身弱多病，又不幸短命，未能完成那部大著。在

他死后，人把他那些零散稿汇集起来付印，名之为「思想」；虽非全豹，仍能窥见他思想的崇高，且能触及人灵的最深处。

巴氏为否认天主的「自由思想者」及怀疑一切的「怀疑派」所刺激，对他们道德的堕落以及教友们的冷淡，深感烦恼。他于是便想说服自由思想者和怀疑派，从疑云中出来，使不按照福音生活的教友，冲破他们的冷淡，踏上热心的道岸。

如果巴氏祇以抽象的理论，对付那些缺乏信心的自由派及漠不关心的冷淡教友，那有什么用？他们决不会听他的。何况教友所当信奉的天主，也不能象几何定理那样证明。因此巴氏由人的本身开步，先使人认清自己的微不足道，不过是苍海中之一粟而已；并使人认清在自身的可怜和极深的堕落中，还潜在着一种神秘的伟大；那就是说：人虽然本来是虚无，但却是按照无限全能天主的肖象所造的。他使人面对着天主的问题，并给他证明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谁也不能漠不关心，必须表明态度，或是皈依天主，或是反对天主；所以巴氏先欲在人良心上引起不安，使他不得不向往天主，因为惟有天主赐给人心灵的平安。

他一知道了对方希望天主教是真教，便进而证明它的确是毫无疑问的真宗教。因为世间所有的宗教中，祇有它能解释人的基本矛盾：就是罪人本身的可怜和他被救赎后的伟大。自原祖堕落后，人便患了重病，因此需要治愈和拯救；祇有吾主耶稣能治愈拯救他。

巴氏所以能令人心服，是因他不象笛卡尔祇靠理智的推论，乃是就整个儿人来立论，理智感情都包括在内。他以学者和诗人的笔法，以感人的词调，直扣人的心弦。巴

氏的「思想」一书实给天主教的辩护开了新的园地。

### 神学和历史

十七世纪的神学家，对纯抽象的问题，不象他们的前辈那样有兴趣。他们没留给我们象圣多玛斯的「神学纲要」那样综合性的伟大著作，但对另一方面，却有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教会的起源和教父。法国有本笃会的一个傍支，名圣茂禄 (St. Maurus) 会，对这种工作放射了异彩。他的一位会士名马比庸 (Mabillon) 者，是一位饱学之士，还有其他本笃会士，祈祷会士和耶稣会士，也和他竞相努力，给近代的历史批评学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有一批比籍的耶稣会士，也将有关圣人行传的一切文件公之于世，这样便把玷辱历史的一切不可靠的传说，一扫而空了。这批人号称鲍郎派 (Bollandists)，名称来自创始人之一的鲍郎神父 (Fr. Bolland)，直至今日仍有他们的继承人担任着这件伟大的工作。

注解：

- ① 这所宅院原本是一座癫病院，当时人都称之为「圣拉匝禄院」(Saint Lazare)，因此对遣使会神父也屡次以「Lazarists」称之。
- ② 贞女们最初头部祇采用了法国乡间妇女们的装束，白色头巾是以后为防备强烈的日光而采用的，无形中逐渐成了该会的特征。一九六四年，该会为适应梵蒂冈二届大公会议简化修女服装的要求，已放弃了她们不合现势的头巾。
- ③ 苏比斯之名，实由巴黎圣苏比斯 (Saint Sulpice) 本堂区而来；当哦利耶任该堂区的本堂神父时，便把他的第一座修道院迁移此地，以后便以地为名称苏比斯会了。

- ④可惜该项建树，在真福逝世后即告解体；不过他的精神仍屹立不朽，即在今日，各处为圣化教区神职人员所建立的善会，其规章仍以真福所计划者为蓝本。
- ⑤这种严守会规的修士，西方称他们为特拉波会士(Trappists)，这名称来自郎赛院长所重整的特拉波修院；在中国普通称他们为「苦修会士」或熙笃会士。实际他们确属熙笃会的一支，即重整的熙笃会。(详见华明书局出版的「熙笃会简史」)。
- ⑥正式公开敬礼耶稣圣心，教宗格来孟十三世于一七六五年始明令举行；教宗比约九世于一八五六年始推行至全教会。玛加利大于 一八六四年被列入真福品，一九二〇年列入圣品。
- ⑦相传神家们拼弃伽利略学说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误信它与圣经的几处文义相抵触；这是他们的大错，太以辞害义了。实际上圣经的作者并无意对宇宙作科学的解释，他们祇就外表的现象，按照人普通的说法，使人能懂得道理便了。即在今日，我们仍说：日出东方，日落西山；并没有人指责我们不合天文的原理，任何人都晓得这是大家普通说话的方式。

## 第十六章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宗教纷扰

十七世纪的上半期，教会的革新正在盛行，已如前章所述；我们所叙述的圣人，大部也属于这个时期。到一六六〇年左右，便渐露了式微的现象；减低宗教生活的原因之一，更是内部的纷扰，诸如杨森异端，法兰西主义，寂静运动等，使这世纪后半期的人心扰攘不安。与路得及加尔文等的改教所不同的，是这些纷扰未造成持久的分裂，祇是浪费了教会一部分生活力，也间接地助长了无信仰的趋势。

### 壹 杨森异端

在誓反教改教及后此一世纪的期间，讨论圣宠和救灵问题的风气极盛，路得改教时的情形，我们前已述及；加尔文又掀起了救灵系属前定的问题；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于是便加深研讨。特利腾会议裁定：功劳是圣宠及人的自由意志共同的效果。但圣宠与人的自由怎样互相协调呢？这点却令人很难明了，且成了道明和耶稣会士热烈争论的焦点。这已涉及超乎人力的奥秘，使人无法完全明了。

比利时鲁汶(又译卢凡)(Louvain)大学的教授巴由斯(Baius 一五一三—一五八九)将问题重又掀起，对圣宠提出了新的解释，与加尔文主义很近似。罗马在一五六七和一五七九年，对这些说法曾两度判为错谬，巴由斯也屈服了；但他的余毒则已渗入比利时的神学界中。不料巴由斯逝世五十年之后，这种思想又在名「奥斯定」(Augustinus)的一部辣丁巨著中死灰复燃。那是比国伊普耳城(Ypres)主教杨森(Jansenius 一五八五—一六三八)的作品。书是在作者死后二年出现的。杨森自以为是圣奥斯定

思想的发明者，其实他是把圣人的几种意向加以夸大渲染，认为人已被原罪彻底破坏无法救治。他说：圣宠虽赏赐了所有的人，但并非众人都能得救。对那些注定要得救的人，天主赏他们不能抗拒的圣宠；至于其他的人呢，无论如何必遭摒弃。对天主的选择，我们不能置评：天主所拯救的，是出于纯粹的慈悲；祂所处罚的，是由于公义，因为天主不欠人什么。

这种学说，在宗教生活正盛时出现，也是无论俗人或会士，对松弛的道德正反攻的时候，因此那些越渴望圣化自己的，便越加严行苦工了；一时风起云涌，信服者颇众，但也使他们更为严刻，变成了一种恐怖的信仰，天主已成了严厉的法官，而不是爱人的救主了。这种学说有两种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诬天主不愿人人得救，耶稣也非为救众人而死。圣教会自然非处罚这些错误不可：于是教宗伍尔班八世 (Urban VIII) 便在一六四二年严禁阅读这部著作。

## 王 港

杨森在未公布他的著作之前便逝世，否则相信他对教会的裁判必然要屈服；但他的思想，已由他的一位朋友散西兰 (Saint-Cyran 一五八一—一六四三) 给传开。散氏是一位法籍神父，他由神修指导进而付诸实行。他曾说：「天主让我明白，教会自五六百年以来已不存在」。言外是说他相信自己是受天主的使命来拯救教会。他在王港 (Port-Royal) 修院找到了渗透他这思想最有利的处所。

王港是熙笃会的一座女隐修院，距离巴黎不远。这座隐院也和其他的隐院一样，对原来的热心谨饬会一度衰颓；但在这世纪的初叶，年仅十七岁的女院长安日拉·阿诺德 (Angélique Arnauld) 已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来的严

谨规则。有些神父及一些号称「独修者」(Les Solitaires)的热心教友，被热心的气氛所吸引，便到该修院附近去定居，且开了一座学校。这本是「贫夫廉懦夫立」的表现，也显示当时教友生活的复兴；可惜这种慷慨的开始，不久便染上了杨森的毒素，而王港修院也变成了异端的温床。

教宗处罚了杨森的书藉以后，王港的「独修者们」起而替它辩护。其中之一名安当·阿诺德(Antoine Arnauld 一六一二—一六九四)的，是女院长安日拉的弟弟，他出了一本书名「屡领圣体」。该书的内容却是教教友们避免屡次领圣体，因为要求一种严格的准备和一种极大的清洁，那是极难实现的。他忘记了圣体圣事并不是德行的报酬，乃是预防罪过增加神力的天药；要求人先有圣德，结果却是使人远离圣德的源泉。为杨森派的人，是一种克苦和谦逊的考验，甚至王港的修女们中，有些因了虚伪的谦逊，竟至不领临终圣体而死。

### 五种理论

纷争愈演愈烈：此时连世俗人，对神学问题的兴趣也很浓厚，思想界分成了拥护和反对王港的两派。反杨森派将杨森学说的主要思想，归纳成五点理论进呈罗马，教宗意诺增爵十世于一六五三年判处为异端。这样以来，杨森派再没有回避的余地了…或是屈服认错，或被视为异端。然而他们却不象路得一样，一经教宗正式绝罚便与教会决裂。他们认为：既愿整顿教会——这是他们所自负的——就必须留在教会内而不能同它分裂；于是便拟好了战术——且持续了一世纪之久——即所谓「阳奉阴违」的表面屈服。面对教宗的绝罚他们声明说：那五种理论既然是异端，我们自然弃之惟恐不远，不过在杨森的著作内并没有那五点。实在，并没有那样具体的词句，但那却是杨森的思想，教宗处罚的也正是因为那是杨森的思想啊。

杨森派仍向天才作家巴斯噶呼吁作他们的奥援，因为他有一个妹妹适在王港修院，且对杨森的学说受毒极深；巴氏便提起了他那生花之笔为他们效力。巴氏深知最好的战术不是自卫，乃是进而攻击敌人；他认定了杨森思想最大的敌人便是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士在各点上都是和他们针锋相对的。耶稣会士不但按照特利腾的意志劝人多领圣体，且对杨森思想的各点都持反对的态度：杨森派说人性已被原罪彻底破坏，耶稣会士却坚持原罪并未取消人的自由和胜仇的力量；耶稣会的神学家，针对杨森派的严酷主义，在为听告解司铎所写的书内，除天主的诫命和圣教的规矩外，尽力避免给行告解者加增其他责任。可能有的在这方面太宽了些，因此授人以柄，被讥为「道德观念宽松」。巴氏特别在他所写的「致省内(京师外)某人的信函」(Lettres à un Provincial)内大事攻击。这些偏激而欠公正的篇章，满是冷嘲热讽，意在使人讥笑耶稣会士而同情杨森派。最后巴氏对他写的这些东西大概心存悔意，对他的朋友们玩弄手段利用他的才能也有些觉悟；他决无心与教会分裂，并且在不多几年以后临死时，也与教会重归于好；但他那无情的嘲讽所留下的伤痕，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①

杨森异端此后的历史，祇是一连串的处罚，伪装屈服和阳奉阴违的敷衍，戏剧性的反复演变而已。对那些顽固的头脑无法获致结论，他们自以为拥有真理，祇有他们了解真正的基督教义；因此当他们受到谴责时，便假意恭顺不辩，但对自己的错误，却固执不肯放弃。巴黎的总主教努力使王港的修女们诚心屈服，但终属徒劳枉效，最后愤慨地说：「她们清洁有如天使，但骄傲却似恶魔」。

### 杨森异端在十八世纪

教宗格来孟九世(Clement IX 一六六七—一六六九)

虽因赋性仁善，恢复了教会内的和平，也祇是暂时掩旗息鼓而已。但当十七世纪末叶，祈祷会士怪斯乃耳( Quesnel 一六三四—一七一九)的「对新约圣经的道德反省」一书问世时，纷争的死灰再度复燃。他在虔诚默想福音经的糖衣之下，把杨森的全部学说又复活起来。教宗格来孟十一世(Clement XI)于一七一三年，以「天主惟一圣子」(Unigenitus)通谕处罚了怪斯乃耳的学说。本来可使争论敛迹了，但杨森派—其中有主教多名—竟呼吁开大公会议；将西方大分裂时，声言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又重新唤起。(参阅卷一339页)

这种纷扰几乎延至法国大革命时始息；甚至在宗教的纷争中又牵上了政治问题。不得不出离法国的杨森派领袖，又在它的发源地「低地」( Pays-Bas, Netherlands 即今日的比利时与荷兰)找到了避难所。他们就在乌特勒支(Utrecht)主教那儿定居下来，那是一个自称惟一真天主教的小教区，直至今日仍维持着裂教的姿势。②

### 杨森异端的后果

杨森主义的严重性，不能祇就分裂的教徒人数去衡量，这些内部的纷扰延长了一世纪之久，给教会所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

在异端影响所及之地区内—尤其是法国和低地，杨森主义的情绪，感染天主教家庭的思想极深，其流毒直存在至二十世纪初叶，致使教会的气氛，敬畏多于爱情，对天主公义的惧怕，减低了救主的慈爱，因此不敢多领圣事。

加之对圣座的决定一再拒绝诚心屈服的姿态，无形中养成了桀傲不驯的情绪，而那些无尽无休的纷扰争辩，在教会内也种下了纷争不睦的趋势，使教友痛心而敌人称快；即使杨森的信徒无心，实际却助长了无信仰的蕃衍进展。

## 贰 法兰西主义

### 法兰西主义的起源

法兰西主义(Gallicanism)③是对教会的行政所有一切企图、态度和思想的综合，希图限制教宗的权力，不使教宗干涉某一国的教会事件。称为法兰西者，是因最早拥护这种主义的是法国的法学家和神学家。

法兰西主义在历史中由来已久，在法王漂亮的斐理与教宗波尼法爵八世的冲突中已露其端倪；(详见 卷一331—333页)这种思想，根本是来自妄称大公会议高于教宗的谬论，不幸在西方大分裂(一三七八—一四一七)及康士坦士会议(一四一四—一四一八)时即已形成。(详见 卷一337—340页)

法国的君主及其官吏，在对抗圣座时，自称是依据古老的惯例和历代教宗所赋予的特权。其实是专制的君主一种自然的倾向，他们很难容忍外来的势力来干涉其国内的行政，视教宗干涉教会的事情为越俎代庖，尤其是触及现世的利益时更甚。何况象法王路易十四世那样的一位独裁君主，在位自一六四三直至一七一五年；就在位的日久，和国运的昌盛，以及开疆扩土和提倡文学艺术等来说，在在都与同时代中国的康熙相似。法国在他的治下可称极盛时代，文学与美术都放射着异彩，达到了最高峰，足以雄视全欧。

路易十四世本是真摯的教友，对王位也有高尚的思想，自视为天主在世的代表，负着保卫教会和信仰以及在国内维持真正宗教秩序的使命。这种观念，根本是教友应有的，且与圣保禄「一切权柄都来自天主……他(官长)是天主的仆役」(罗13：117)的思想甚相符合。但一被误解，便要产生傲慢。一国的英主本来最易流于「惟我独尊」的傲

慢，如果他再将国家的利益与本身的光荣混为一谈，势必要专制独裁：路易十四那能逃避这种诱惑！因此「朕即国家」一语，便成了他的口头禅了。他所说的「国家」，也包括法国教会在内；路易认为教宗要尽可能的少干涉法国教会的事，然而他自己却常想干涉教会。加以环绕他左右的人对法兰西主义的思想浸染得更甚，他那些不正确的倾向当然就更加危险了；因此同教宗冲突势必不能避免。

### 路易十四世与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的冲突

潜伏已久的冲突，便在一六七三年，为了一件看来次要的小事，猛烈地爆发了。根据古老的惯例，当国内几处教区的主教出缺时，法国国王享有治理教区的特权。路易要将这种特权，扩展至法国所有的一切教区。当时的教宗是意诺增爵十一世 (Innocent XI)，为人特别严厉，对教会的权利绝对不肯让步。<sup>④</sup>他见国王的擅权，是在神权的范围内滥用世俗的权力，曾三次谕令路易，请他放弃滥用职权的行为。这种谕令有损路易十四的颜面，使他大为激怒。

路易于是号召神职界作自己的奥援，其实他也深知同情他的党羽不少；于是便在一六八一年召集了法国神职人员大会。鲍须爱 (Bossuet) 担任着重要的脚色：他和许多其他法国主教一样，受了当代思想的影响，对法国主教区所久已享有的特权非常重视，不过他也爱慕并尊重罗马教会。于是他努力使事件和平解决。他对「教会的统一」发表了美丽的演辞，对教宗的权利也设法予以保全。无奈国王认为不满意，要求鲍氏草一宣言陈明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鲍氏一再踌躇之后，终于撰写了一篇「四点声明」，将法兰西主义的思想顺序排列出来。其要点如下：一、教宗对国家的俗事，无权过问；二、对神灵方面的事件，应按照康

士坦士会议的规定处理，因为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宗；三、教宗的权力，祇能在符合公会议的条文与法国教会的惯例下施行；四、教宗的决定，祇在全教会同意后，始能成为不能更改的宪章。路易十四命全国修道院内教授这项道理。

虽然那时教宗个人不能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定为信条，但这项宣言显然与天主教的传统正面抵触。有一部分法国神职人员提出了抗议，教宗也声明这四点无效，他对拥护四点声明的教区候选人，拒绝赋予合法神权。国王这方面虽有推荐候选人的权利，却坚决非指定拥护四点声明的人不可。看来什么也不能使国王让步，连秘密送来的绝罚都无效。这种冲突僵持了十一年；最后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终于在这位教宗和他继承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前让了步；因为认真说来，国王尤其是神职界和法国信众，都无意同罗马分裂呀。

### 法兰西主义的遗毒

然而法兰西主义并未由此完全消灭。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在法国有同杨森派的联盟，共同抵制圣座；在其他国家内，也在其他的名义下活动着。直至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一八六九——一八七〇)仍未绝迹。梵蒂冈会议始隆重裁定：教宗以教会领袖的资格对信仰所下的裁定，不待全教会的同意，便是不能错误的；这样一来，才结束了法兰西主义。

## 叁 寂静运动

当法王与教宗争执最烈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谬论，即寂静运动(Quietism)。这种主义究竟不象杨森异端和法兰西主义那样难缠。

如愿真正了解寂静运动，便该记得十七世纪修会会士和一般教友，对宗教生活的热烈情形；结果是有许多人士在祈祷的生活上达到了高超的境界，获得了神秘的恩宠：获得这样恩宠的人，享受着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因此便产生了一种完全寂静的情绪。这种神秘的境界本是天主白赏的恩典，升到这样境界的人需要有经验的神师领导，因为这事最易有自欺的幻想。在那个时代有不少的神修家描写神秘的途径，其中也有误入歧途的，错谬最甚的莫过于弥厄尔毛利诺 (Miguel Molinos)。<sup>⑤</sup>

### 毛利诺的寂静运动

弥厄尔毛利诺(一六三八——一六九六)是一位西班牙神父，生活在罗马，作着好多人的神师。一六七五年他写了一本「神修指南」(La Guia Espiritual) 阐述他的理论。他认为祈祷的工夫迅速地进入对越的境界，人灵在此境界中为天主的纯洁圣爱所吞噬；人一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对于在肉体上所经历的一切便不必焦虑了，外表的行为，那怕是不洁的，都不关重要；此时人灵已不能犯罪，祇是寂静地同天主结合而已，对将来的事情毫不挂心；升天堂下地狱都无关重要，祇有天主为他算数。

这种能导致不道德的结果的理论自然当被教会处罚；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便于一六八七年予以处罚。

### 半寂静运动

当毛利诺在罗马遭到处罚时，他的思想已在法国传染了居庸太太 (Madame Guyon 一六四八——一七一七)。她是一位富孀，温柔动人，精神不很正常；她对自己的意念深信不疑，认定自己负着改革世界的使命。她是由她的听告解司铎获知毛利诺的理论，她的心火很大，为宣传这种思想写了好些东西；因她广泛的交际，赢得许多贵族妇女

相信了这种新思想，连费乃隆主教 (Fénelon) 也相信了她。我们得声明：对毛利诺的理论所导致的不良结果，居庸太太决未接受，费乃隆更不用说了，因此他们的理论常被称为「半寂静运动」(Semi-Quietism)；但他们对「人爱天主的心如果十分纯洁，对自己的救灵问题能达到漠不关心的程度」这种思想，倒很信服。⑥

有人在巴黎总主教前控诉居庸太太的著作有错谬的思想，主教便交付神学委员会审查，其中有鲍须爱。争辩的结果，倒使神秘的真义得以确定。费乃隆起而为居庸太太辩护，致使费乃隆同他以前的老师兼好友鲍须爱彼此笔战甚烈，不但有伤爱德，还引起了多人的骇怪。费乃隆的著作终于遭到罗马的谴责。他对圣座裁判的屈服也很足以为人矜式。正在他准备对民众演讲时，接到了他被谴责的消息；他便立即放弃了所准备的演讲题，对圣座应有的服从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声明。

寂静运动，遂由这次服从宣告结束。可惜因教会处罚这种虚伪的神秘主义，反而招致了不幸的后果，致使真神秘主义被它混乱得使人很久分辨不清。

## 肆 誓反教的问题

天主教在十六世纪末叶与十七世纪所作的整顿工作虽说很盛，但终不能恢复信仰的一致。誓反教虽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已告绝迹——从未在该国扎根——，但在德意志、瑞士、荷兰，以及斯提弟纳维亚和大不列颠等地，则成了主流。

圣教会对此种分裂不能漠不关心。为挽救它也试行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的祇想用说服，其他则用强制。从那时起，无论誓反教或天主教方面，都有过慷慨大量的人——大公运动的前驱，策划过合一的方法和言归于好的计划。

## 说服的方式

这种方式之中罗马最爱用的是想以天主教的真理说服誓反教徒，设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在俗及在会的神职人员，特别是研究圣学的作家，或同誓反教的牧师据理力争，或著作书籍反驳他们由圣经或由圣传所摘取的不正确的引证。向他们陈明天主教的道理所依据的理论。当时在研究神学和历史上所作的真正复兴，正好为天主教有利。

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我们祇提出鲍须爱来以概其余，因为誓反教的问题是他首要的工作。他那部光芒四射的著作「天主教的说明」，使得不少的誓反教徒醒悟，反正的也很多。在他那部著名的「誓反教的千变万化」一书中，指出了天主教在信仰上如何一致不变，誓反教却分裂为无数的派别。

## 强制的方式

在法国，天主教本是国王和绝大多数的百姓所共同信奉的宗教，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 一五九八)曾准许誓反教徒信仰自由。这在以「属谁管辖，便得信谁的宗教」为原则的欧洲，本是例外。

路易十四世，一方面为了政治因素，一方面因他个人的坚实信仰，急欲在自己国内结束信仰的分歧。但他认为祇以神学和历史为号召尚嫌不足，为使誓反教改邪归正，非利用强制的手段不可。他先施行南特诏令，迫令异教徒迁移；继而因战胜了敌国，渐至趾高气扬，遂对誓反教徒施行另一种政策：异教徒不得任公职，反正者予以优待；随后竟施以虐待。因为法国南部誓反教徒最多，地方官对国王的政策便变本加厉地实行；他们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誓反教徒，对国王则报告他们已集体地归正。但强迫的改教有什么价值？路易最后竟误信誓反教徒已所剩无几，便依恃他的强权，宣布重建信仰的一致，于是便在一六八五

年断然废止南特诏令：誓反教徒从此便不准再公开实行他们的信仰了。

再一次证明了，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是无用的。在巴黎的人们对此种措施曾鼓掌称庆，认为是天主教的胜利；其实是自欺的幻想而已，誓反教的问题并未因此解决。他们多数逃到英国和美洲去了，所剩下的，大半都是阳奉阴违，佯称归正；国王这种政策却种下了反抗和不睦的种子。惟一能替他卸责的，是当时的风气如此；法王实行这种政策，也祇是对誓反教的君主效尤而已。

### 在 英 国

路易十四世废止南特诏令的那年，也就是天主教的君主英王詹姆士二世 (James II) 即位之年；假如他能和平明智，为天主教定有幸福的结果。因为当时英国也有宗教纷争的危机，因此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劝他稍安勿躁，要以最大的明智处理。法王路易十四则怂恿他对异教徒采取反击的步骤，建立专制的政权；他听信了路易而没听教宗；结果却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想以严厉的手段恢复天主教的信仰，反而使他大失民心，爆发了革命，国王逃亡海外，教友又丧失了法律的保障。一六八九年议会通过了所谓「权利法案」(Declaration of Rights)，不但天主教的亲王不得继承王位，天主教教友也不能从事教育，不得担任公职，甚至置产权和立遗嘱权都被剥夺，司铎遭受了永远监禁。

### 在 德 国

德国经过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以后，还得遭受自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的长期战争之苦；此后呈现了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状况：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十年战争。这场大战原本就不是纯宗教性的，最后却变成纯政治性：对垒的双方法兰西同奥地利实际是争夺欧洲的霸权而已。

教宗们对双方斡旋力使他们和平解决。经过了四年的磋商之后，终于在一六四八成立了西发里亚条约(Treaty of Westphalia)，使德国扰攘了一百五十年的政治和宗教的局面，赖以确定。政治方面地方分成了三四三个独立小邦，帝国祇拥有虚名而已。在宗教方面确定了一五五五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立的原则(见前26页)：德人应追随其君主的宗教，仍承认君主有改革宗教的权利；结果成了各联邦拼凑的一个怪异的图案，各个诸侯都实行着真正的宗教独裁。

教宗格来孟十世坚决拒绝承认这些不道德和反宗教的原则，也反对条约中的不征询教会的同意，便擅行处置主教及修院的财产的条文。不过这是徒然，事前既不顾他的希望，事后便更不理他的抗议了。

西发里亚条约是一个时代结束的里程碑：它显示教会以前借她的元首教宗的声音，能指挥欧洲公共生活的时期已告结束。各国自理其国事，已不以教会为意；奉教的君主也逐渐视教会为一个国家的机构了。

这样一来，政治人员算正式抛弃了「奉教」的观念；以前欧洲各国，不管各自民族语言等种种的不同，却以「都隶属于基督的教会」这一精神的锁炼，彼此联系在一起。现在欧洲祇是一群大小国家而已，各被其专制的君主统治着，本国的利益便是它们最高的法律。在这种情势下，各国之间如有争执，便祇有靠战争去解决了。这种趋势，是欧洲自己造成的呀！

### 合一的试探

欧洲宗教和政治的一致，已完全被破坏。教友们这种分裂的怪现象，就让它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吗？无论在誓反教徒或天主教徒内，都有过心胸宽大的人士，痛心这种形

势。在德国，十七世纪后半期，环境有利于彼此的接近。路得派初期的狂热已经减低；在王侯们的家庭内已有返回天主教的，有利于合一的思想已在散布着，非正式的接触也已建立。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德国誓反教来布尼兹(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起来鼓吹合一。他是一位博学多能的鸿儒，在文学和科学、神学与历史、哲学与法律上，都是同样卓犖不群的。他旅行全欧奔走呼号，热望着合一，幻想着重建欧洲的政治统一：来氏正是担任和解角色的适当人选。他同天主教的各色人物都有交往，尤其是鲍须爱，他们彼此信使往还，互相讨论了十年之久。这两位卓越的人物，抱着合一和寻求真理的同样精神；看他们诚心寻求使双方教会言归于好的努力，真是动人；可惜最后总得承认他们未能完全一致。因为二人对教会的观念大相径庭，无法调合。

这次失败，使两个分裂的教会长期的和平谈判宣告结束。虽有几位勇敢的人士仍想在这方面努力，但也祇是小小的试探而已，没什么大规模的举动；祇得等到十九世纪末叶，大公运动再在新的基础上着手了。

然而很重要的，是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对威胁一切启示的宗教的新敌人——无信仰的怀疑派——尚能组织成共同阵线；因为无信仰的思想，在整个儿十八世纪期间，已逐渐侵入了知识界。

注解：

- ①自巴斯噶起，常有对耶稣会士「道德观念宽松」的控告。杨森异端派及法兰西主义派，见这种控告不能离间他们与教宗紧密联系的关系，于是又控告他们「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说他们在英国是自由思想者，在巴拉圭是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和印度是敬拜偶像者等等…这些控告虽属怪诞不经，幼稚而可笑，然而在今日仍有此等谰言。
- ②这个杨森教会从来人数便不众多，今有主教三位，教徒一万多名。
- ③西欧语文中所用的 Gallicanism 一词，来自辣丁文的 Gallicanus，意即属于高卢的(Gaul)。就狭义来说，法兰西主义自然指的是法国所有的企图和思想，实际上近代与教宗对立的公教君主们，大部都有意无意地沾染了法兰西主义。
- ④教宗比约十二世于一九五六年，将意诺增爵十一世列入真福品。
- ⑤不可把弥厄尔毛利诺与班籍的耶稣会士毛利纳(Molina 一五三五—一六〇一)相混淆，后者是解释圣宠和人的自由意志如何协调的神学家。
- ⑥居庸太太的著作，对誓反教的几个派别发生了影响，中文也有译本。

## 第十七章 教会在十八世纪的情形

### 概 观

西方世界在十八世纪起了重大的变化。政治方面直至那时为止祇占次要角色的国家，现已跻于强国之林：例如，俄罗斯在大彼得(Peter the Great 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及凯塞琳二世朝(Catherine II 一七六二——一七九五)；普鲁士在腓德烈二世(Frederick II 一七四〇——一七八六)朝，都崛起起来。英吉利由西班牙及葡萄牙人手中夺得了海上霸权，在印度和美洲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不久北美合众国也争得了独立(一七八三)。波兰却被三个强邻：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瓜分，由独立国中除名了(一七九五)。

但就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十八世纪值得我们关心的是酝酿在内部的动荡，远比人们认为很重要的这些外面成就更大：十八世纪的几次大战，实在是思想战。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观念，想把这观念建筑在科学上；所有知识分子，都怀着过分的雄心，妄想逐渐廓清一切神秘而明了一切。基督教(广义的)在知识界遭受了无情的攻击，已认它为人智初开时所孕育的古老神话，不值得爱惜了；甚至相信人的智慧可无限止地进步，科学万能，能解决一切问题；人性是彻底美善的，已被压迫了多时，现在该让它自由发展它一切的本能了。人们就是这样幻想着走向人间天堂，社会便向着法国革命——这个要将社会旧秩序带走的风暴——逼近。

这期间教宗的权威已形低落，奉教的君主们正设法摆

脱教宗对大众的影响力，加强自己对本国教会的统治；于是便对圣座的坚强支柱——耶稣会——施以猛烈的攻击，既在自己国内先将它排除，又强迫教宗明令将它解散。

虽然知识阶级的一部分堕落了，但民众尚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且教会也不断地产生圣人；为担当法国革命的骇人考验，她还有足够的力量，不但未被冲倒，反而经过了这次锻炼，更为纯洁了。

## 壹 十八世纪无信仰的气氛日增

在十七世纪时，已有些人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人称之为「自由思想派」(Libertines)；这些无信仰的人，大也都行为不检，不过总归少数，舆论也不和他们表同情。到了十八世纪，这股无信仰的逆流已逐渐传布于智识界。其中的原因很多：誓反教的改教，科学的进步，唯理主义的哲学，都有其影响。

### 改 教

乍看之下，虽似奇怪，而无信仰的原因之一，的确是十六世纪的改教。誓反教改教的第一结果，是在天主教之外，创立了若干新教派，而他们又以圣经为他们信仰和敬礼的惟一根据。既然抛弃了天主教信仰的标准，势必出现各式各样的信条和礼仪。于是信仰意识的力量非衰退不可：教会与教会对立，各有各的信徒，个个都自称代表基督的真正教义，这些各不相同的教派，既自称都根据圣经，结果又自相矛盾；怎能不使人相信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而不能信任呢？既然天主教被认为启示的宗教已如此之久，而今忽被抛弃，视为腐败，信条和道德都已不复纯正，并且还染上了种种迷信；怎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真有一

个天主启示的宗教呢？誓反教攻击天主教，不是间接助长了无信仰的发展吗？

### 唯理派的哲学

新兴的哲学对信仰影响更大。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笛卡尔以怀疑来证明一切知识，实在给唯理派铺了道路。他本人对信仰很深，对天主教的真理固然没有用怀疑的方式去证明；但其他的人则不愿将任何事由怀疑中除外，遂认为人的理智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坚持一切结论都要由这个前题中推出：即凡超出人类理智的，都视为荒谬或武断。宗教中祇有理智能了解的才可信：比如有一个创造世界的天主存在，因为没有钟表匠不能有钟表；但奇迹、预言、人所不能懂的奥迹、超性的启示等等，则视为无稽之谈。对神明的敬礼，祇是道德的行为，也就是合乎自然理智的生活。这就是所谓「自然神教」(Deism)。

其他的人则更离谱了。洛克(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与休谟(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硬说一切知识都由经验而来，因此所谓灵性的观念，尤其是天主的存在以及人灵的不死不灭等观念，都没有根据：这便是「无神论」(Atheism)了。

### 科学的进步

十七世纪时，知识分子对宗教问题兴趣很浓；他们很爱辩论圣宠或祈祷的境界等问题。及至十八世纪，人们的兴趣便将移到科学的发明上去了。有知识的人多愿作物理学家或自然科学家。该世纪的一切著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的物理试验室；对科学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

十七世纪前期的伽利略、巴斯噶、笛卡尔，以及十八

世纪后期的牛顿 (Newton)、来布尼兹等(我们祇引证最著名的几位)，发明了宇宙间的几种基本定律；他们的高足弟子，更扩大了人类知识的宝库：物理、化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以前都很幼稚，那时却有了长足的进展，使直至那时视为神秘的现象，都有了科学的解释。

不过这一切，都与宗教的信仰毫无妨碍；最好的证明，是我们适才所引证的人物，以及建立近代科学基础的其他学者，他们对宗教都有很深的信仰。对自然界的观察，不过使他们更明了物质世界的庞大和管制它的严格秩序，使他们对创造和宰制宇宙的天主，更加惊奇称颂而已。可惜有些人，被学问的美酒迷醉了；祇看「自然」为一种永久的机械，把它归之于不会紊乱的布置；有信仰的人相信是天主的安排，他们却祇认为是一连串盲目而必然的力量而已。他们不想，象这样一个各部分都显然是有好有坏的世界，竟说它是必然而自行存在的，是多么不通！

可是人竟梦想不久便会成为这自然的主人。科学不是已使人能控制新的力量了吗？不是能使蒸气推动机器而造成「工业革命」了吗？那么将来的命运已掌握在人的手中：如果人人都有了学问，便能产生无限止的进步；祇要教育能普及便成。①

### 反宗教思想的蔓延

这些被称为「哲学家」的反信仰反宗教的思想，本来可以祇限于他那个小圈子内；所能传播很广的原因，是因为宣传者是该世纪法国文学最著名的人物。路易十四王朝的繁荣，并非单靠军事和政治的成绩，而更得力于文学与艺术的杰作，替法兰西在欧洲获致了最高的威望。法国语文，本以清晰细腻著称，当时已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成了

欧洲上层社会的通用语。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弗尔泰(Voltaire)、卢骚(Rousseau)及「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sts)，不祇法国，可说全欧的舆论都被他们控制了。可惜他们把思想界也导上了反信仰的路上。

### 弗 尔 泰

「哲学家」的领袖便是弗尔泰(一六九四——一七七八)。他并不是有创造性或深刻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从英国的哲学家吸收来的，就是当时的「自然神教」和「唯理主义」。弗尔泰为解释宇宙的秩序承认天主的存在，不过这个天主离人很远，对人类的事情，任其自然，不加干涉。他以讥讽的口吻说：「如果天主不存在，我们也得发明一个」，因为为使人民俯首顺命，需要有一个宗教哇。②

弗尔泰本人虽毫无宗教意识，却主张宗教自由，对冤狱昭雪，这是他人格好的一面；但是最矛盾的是这样一个维护正义和自由的人，一触及宗教问题，便摆出一副铁面无情的态度，丝毫不能容忍。他对宗教恨之刺骨，他的著作内所表现的一贯主张就是：「我们要粉碎这个耻辱！」这种口号也常出现在他的书信内，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用一切方法——虽诬蔑说谎亦在所不辞——所当粉碎的「耻辱」，就是基督教(广义)，他称基督教为「一棵结毒果的树，是骗徒们围困傻子达十七世纪之久的一张罗网，是狂热的信徒们十四世纪之久刺杀自己弟兄们的一把利刃」，是耶稣基督「这个毫无价值，可轻可贱，没有才德，没有学问，没有住址的人」的事业。弗尔泰向一切超性真理，一切启示的信仰宣战；他的武器便是冷嘲热骂。他在各种著作内，散文、诗歌、戏剧，历史的写作或文学批评、小

说、随笔以及字典的注解内，对司铎、信条、信徒、圣经、福音等，常是嘲笑；对关于基督教的一切，常取毁谤戏弄和讥讽的态度。弗尔泰对这种破坏的工作，拥有宣传者的非常技巧；他善于运用巧妙而诙谐的词句，编造幻想而恶毒的问答，假造故事，为此他的思想虽极平凡或甚至虚伪，他却能使它特别生动有力。

他那广泛而肤浅的知识，和他那锋利的言词，对舆论发生了无比的影响，甚至最杰出的君主都成了他的信徒。普鲁士王腓德烈大帝，曾留他在自己的宫中。俄罗斯的凯塞琳二世为在国内实行改革，也和他信使往还。他那无数的信函，在全欧布散着他的思想。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他已过着隐居的生活；凡来访问的法国的著名人物，在凡尔塞宫晋谒法王之后，必去拜见有名的弗尔泰。他寿至八十四岁；在死前数月回巴黎时，市民欢迎他的情形，简直如迎神一般。弗尔泰在当时欧洲的知识界真可说是称王称霸，是史无前例的。

### 百科全书派

对所谓新思潮，弗尔泰独自一人当然尚不足赋以扩张的力量；一种集体的出版物帮了他的大忙，那就是在杰出的作家狄德罗(Diderot 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和算术家达郎贝尔(D'Alembert 一七一三——一七八三)领导下所编辑的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那是对一切知识包罗万象的一部庞大著作；但实际上却是十八世纪自由思想的综合，攻击基督教的一部机器；为首的编辑人员都是浸满了唯物和无神论的；不过对宗教很少直接攻击——那是舆论所不能容忍的——但满是巧妙地乔装了的无信仰思想；它虽不直接打击信仰或道德，却婉转在读者的心灵中，散布着

怀疑否认及讥讽的种子；结果却是对教会的一切，制造一种敌视的氛围，制造一种不给超性稍留余地的心情状况。

百科全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装璜美丽，插图丰富，所有欧洲对新思想有好奇心的人，都以一睹为快。真是一种宣传「哲学家」思想的最有效工具。

## 卢 骚

然而此时却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反对「哲学家」枯燥无情的唯理主义，那就是卢骚（Rousseau 一七一二—一七七八）。他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誓反教家庭，曾有一个时期为天主教徒，但祇是肤浅的外表。他具有慈悲而热烈的心肠，著作不多，但比弗尔泰更诚恳也更深刻。他说人不但具有理智也具有感情；有一种内心的本能推动他相信天主。他写道：「良心！良心！那是神圣的本能，从天上来的不死的声言，是无知而浅见的人的稳妥领导，他是聪明而且自由的，是审辨善恶不能错误的法官，使人相似天主；是你使他的本性高超，使他的行为有道德观念。如果没有你，我感觉不出来在我之内有什么与禽兽不同之点。」

卢骚的哲学是特别乐观的：他相信人性原来是好的，是社会的生活弄得他说谎、粗暴、残虐；应该使人恢复原来的平等，处处重建自由，一切便会恢复秩序，在世上也就要有完美的幸福了。

总得承认这个基本的观念同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能相合的。如果基督教的基础是救赎，那么对没有原罪，而人的本性又是完美的世界，救赎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宗教整个儿建立在内心的感情上，启示还有什么用呢？无疑地，在这个充满了讥讽和否认一切的世纪中，卢骚的作品还有些

宗教的气味，且在人心的深处，对天主还保存着一些思乡的情绪，因此弗尔泰和「哲学家们」对他便不免恨之入骨了。然而他的思想对基督教仍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不承认它的真正性质；卢骚虽与唯理主义不同，但他的宗教观仍是纯粹人本位的，没有给超性留一点儿余地。

### 在德国：启蒙运动

在德国，唯理主义的思想，早已被佛尔夫(或译倭勒夫 Wolf 一六七九—一七五四)传开，他说祇有一种宗教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自然宗教。反基督教的思潮，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庇护者，就是腓德烈(二世)大帝；他自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为普鲁士国王，他把弗尔泰和他的朋友们接到宫中，予以款待，鼓励他们的反基督教斗争。于是在全德组织了一种所谓「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德文为 Aufklärung)。有些德国的誓反教神学家不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祇看它是一部由人撰写的书籍；教会也不过是一间讲道德的学校而已。文学家勒新(Lessing 一七二九—一七八一)公开宣传这种思想。在德国和奥地利，许多大学的教授们，都染上了敌视圣座的思想及唯理主义的精神；最严重的是修道院的教员，也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 共济会主义

无信仰主义获得了此时创立的一个名叫共济会(Freemasonry)的秘密组织的协助，不久便传遍整个西方世界。这个秘密会的最早起源，总未被人完全弄清<sup>③</sup>；近代的共济会在十八世纪初叶产生于英国。创立人中最活跃的一个，是迁徙到英国的一名法国誓反教牧师的儿子，牧师名戴匝贵利耶(Desaguliers)。是他创建了伦敦的「大会所」(The Great Lodge)，是其他会所的鼻祖。共济会

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在十八世纪后期，在欧美两洲都发展得快速惊人。

起初秘密会所的分子，多为贵族绅士，还没有积极与教会为敌；对天主还保持着模糊的观念，视祂为「宇宙的大工程师」；他们的目的是友谊互助，对一切宗教都采取容忍的态度。在法国，尤其会士和司铎们，甚至连主教也有加入的。这真是不智之举，因为那些聚会所渐渐被弗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所侵入，多数都坚决同圣教会作对了<sup>④</sup>。教宗们的眼光更亮，很快便看出来这些秘密会对信仰的危险。教宗格来孟十二世于一七三八年禁止教友加入，本笃十四世更于一七五一年重申此禁令；可惜人多置若罔闻，因为教宗的权威在十八世纪的社会中，连在奉教的国家，也大为低落。

## 貳 教宗权力的低落

### 十八世纪的教宗

罗马教会在十八世纪，没有象其他时期那样有过不称职的教宗，或过分在世俗的事情中纠缠不清的。继承圣伯多禄位的教宗们各有千秋：格来孟十一世（一七〇〇—一七二一），意诺增爵十三世（一七二一—一七二四），格来孟十二世（一七三〇—一七四〇）以热心著称；本笃十三世（一七二四—一七三〇），最爱神学；格来孟十三世（一七五八—一七六九）及比约六世（一七七五—一七九九）则酷嗜美术；本笃十四世（一七四〇—一七五八）是最有学问的教宗中之一，因他深谙教会法典，知识渊博，而又好学深思，遂使宗座大放光明。总之，以上各位教宗对传教教人，都很热心，常以超性眼光看事并努力维持信仰的完整。

## 教宗权威的低落

罗马教宗们的圣德虽高，但在十八世纪亦未能阻止其权威的低落。教宗虽大声急呼，提醒人勿忘道德和正义的原则，不但私人之间，即民族之间也应予以遵守。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社会对教宗的呼声已不加尊重。因此当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瓜分波兰时，教宗对这种破坏正义的暴行，竟无力阻止。

为抗拒圣座的决定，杨森派在法国竟与法兰西主义者联盟，坚决抵制教宗，直至法国大革命始止。这些冲突争斗大大影响了德奥两国。一位德国主教名洪太因(Hontheim 一七〇一—一七九〇)⑤，于一七六三年出版了一篇论文，论罗马教宗的权限，将康士坦士会议所武断，法兰西主义者所效尤的论题重新燃起，声言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宗，乃属于主教团。此书的影响甚大，激起了反抗罗马的情绪，甚至在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皇帝若瑟二世(Joseph II)竟演了不少僭越的笑话，而被历史家称为若瑟主义(Josephism)。

## 若瑟主义

奥地利皇帝若瑟二世(一七六五—一七九〇)是一个怪人，心地并非不善，野心也强大不羁。他自幼便受了弗尔泰和「哲学家」思想的影响，决心作一位十八世纪所谓「开明的专制君主」，不顾民意而想给人民谋幸福。他还算虔诚热心，以改革教会自任，但要独断独行，并不征询教宗的意见。他认为祇有国家有为人民谋幸福的责任——无论物质或道德的，教会不过是辅助国家的机构之一而已。所以他不但想在国家的事情上限制教宗的干预，还想单独对教会的事情制定法律。因此遇有特殊事件，他严禁主教们

向罗马请示，例如对婚姻阻碍的豁免；并且禁止不经政府的同意公布教宗的法令。他任意划分主教区和本堂区，关闭了许多修院，自专务对越天主的隐修院开刀，认为他们祇从事「无事的反省」，毫无用处。他取缔了教区的修道院，代之以中央修道院。普鲁士腓德烈大帝以讥笑的口吻，称之为「我那位管堂的弟兄」，因为他连堂中的细节也要干涉；他制订了应做多少台弥撒，指定了应唱的歌曲，每座祭坛应点多少蜡烛，甚至有一天他命令以布袋来代替棺柩……

对这样的琐碎，人们恐怕要禁不住哂笑，但它们所表现的政治，最后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教会，同罗马分裂。这正是教宗比约六世所怕的，因此决心亲赴维也纳同皇帝去争辩，索回教会的权利。左右虽尽力劝阻，教宗终于成行，皇帝予以盛礼欢迎，也应许了许多事……不过并未践行。

对他这种疯狂的政治，国内渐起了反抗，不满之声云起，可巧他适时而死，免得被迫降服。他弟弟雷奥保二世 (Leopold II) 继位，对他哥哥所采的步骤取消了不少；但所谓「若瑟主义」的幽灵还在奥地利留存了很久。

不但在奥地利，几乎在一切天主教国内，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都可见到君主反抗教宗权力的表现，不承认教宗有直接向他们的属下出命的权利，自称能直接任命主教。限些教宗象本笃十四世那样，为了爱好和平，对他们有很大的让步，他们却得寸进尺，仍继续对抗；尤其当「哲学家」们对君主的大臣们赢得了和他们同样的看法时，公开的战斗便展开了。先向耶稣会集中攻击，因为自两世纪以来，它对教宗常是最坚强的支持者。

## 对耶稣会士的进攻

一七七〇年，在欧洲及传教区域，耶稣会士已增至二万三千名，其中有司铎、读书修士、辅理修士及初学修士，有会院八百座，公学七百间，传教站已接近三百。耶稣会自创立以来，即对圣教会有卓越的贡献。对布道，对教育，对宗教的辩争，或对王侯尽听告解司铎的职务，处处忠于圣座，与不信及反宗教的思想斗争，以各种方式攻斥异端，热烈地保卫圣座的权利。

这种态度，必然引起与罗马敌对的人士，如法兰西派、杨森派及政府人员等的仇视。他们为反对耶稣会组成了联合阵线；有些「哲学家」认为打击耶稣会就是打击天主教本身。弗尔泰曾于一七六一年写道：「我们一消灭了耶稣会，对『耻辱』便算站在有利的地位了」（意即便容易粉碎天主教了）。天主教国王的官吏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把某些个人的错误，很巧妙地归之于耶稣会全体，甚至捏造事实，拚命攻击它。

迫害是由葡萄牙开的端。国王若瑟一世 (Joseph I) 是一个懦弱的人，已成了宰相朋巴尔 (Pombal) 的傀儡，而朋巴尔却早已为「哲学家」的思想所浸透。他开始用各种方法欺侮耶稣会士，取消了他们在王宫听告解和讲道的职务，寻找诬蔑他们的各种机会。一天晚上不知何人向国王的马车开了几枪，这正好给他送来了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于是他便控告是耶稣会士干的，一日之间把全国的耶稣会士尽行逮捕，其中二一八名被关进地牢内，关了十八年，直至朋巴尔死后始被释放；其他的则如牲畜般的装入船内，把他们载至教宗国土的海岸，把一无所有的他们抛置在那里。住在里斯本的教廷公使对这种暴行提出抗议，遂

被联带驱逐出境。

法国耶稣会的消灭，导因于安地列斯群岛 (Antilles) 传教区经济的破产。为接济美洲传教的经费，耶稣会的会计贸然向大商业投资。在英法交战时，开往传教区的运货船为英军所执；传教区的经济因而破产，许多重要的商家也联带破产。案件遂移交最高法院办理。但法院人员大部为杨森派和法兰西两派；这是报复他们所衔恨的耶稣会士的大好机会。法院遂宣布耶稣会在法国的设立为非法，请求政府予以取缔。国王路易十五世虽反对了多时，但一七六四年，终于在取消耶稣会的诏书上签了字。教宗格来孟十三世虽提出坚决的抗议，但亦无效。

耶稣会在西班牙最为顺利；当时在本国和其属地内有会士六千，国王嘉禄三世 (Charles III) 虔诚热心，教宗对他甚感满意，会士相信必能得其保护。不幸政府官吏对圣座甚为敌视，遂决心取消耶稣会；他们竟在国王前诬告耶稣会士阴谋不轨。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国王相信，至今仍是一个谜；反正他于一七六七七年签署了一纸命令，将西班牙及其属地的耶稣会士尽行驱逐出境；于是一日之间皆被逮捕，遭到了八年前葡国耶稣会士同样的命运：即把他们装进船内，运至教宗领土的海岸卸下，除随身的衣服和日课经外，别无长物。为解释这种措施，国王祇说是为了重大的理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这样严厉的手段；至于为了什么理由，祇好存之于国王心中，不便向他人道破。教宗致函班王说：「自我人即位九年以来，所给我们的一切打击，最使我们痛心的无疑是阁下对我们的这一击；万想不到您也这样待我们！」

同年拿坡里王 (Naples) ——班王之子——在他的国

境内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次年巴马 (Parma) (意大利北部的大公) 也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

### 耶稣会的全面解散

耶稣会的敌人虽在十年之间，将它的重要枝干削去，但不将它连根拔除是不甘心的。这个修会既是罗马圣座所批准而又多次确定的，祇有他有权命令它解散。于是一七六九年一月，法兰西、西班牙及拿坡里的驻教廷大使，一致照会教宗格来十三世，请求将耶稣会全面予以解散，且以大兵临境，以便使他们的请求生效。这位坚强果毅的教宗，不愿对威胁让步，不为所动；但此事给他所招致的痛苦，竟使他不支，乃于一七六九年二月溘然长逝。

选举教宗的会议延长了三个月，在此期间耶稣会强敌们的公使，阴谋策动选举一位合乎他们口味的教宗，枢机们选举了一位方济各会士，取名格来孟十四世 (Clement XVI 一七六九—一七七四)；他本是一位公正而热心的人，但决不愿同公教的国家冲突。无奈决心消灭耶稣会的几个强权，向他迫切要求。教宗希图迁延时日，想以半推半就的措施使耶稣会的仇敌满意；但他们的要求更加迫切，且加以恐吓。最后教宗终于让步，乃于一七七三年以「主及赎世主」诏书 (*Dominus ac Redemptor*) 声明解散耶稣会，诏书的内容对耶稣会未有一字的谴责。格来孟十四世之忍心牺牲，是因据他说：「如果让这个修会存在，无法使教会享受真正而持久的和平。」<sup>⑥</sup>

圣雅尔风索·利高烈感叹说：「可怜的教宗，在他所生活的那样困难环境中，他有什么办法呢？其时所有的王侯都合谋要求消灭耶稣会呀！」真是可怜的教宗，一年以后他便逝世了；他临终时所念念不忘的，是深以他被迫让

步为憾，且明见那种让步并无补于教会的和平。

## 结 论

弗尔泰一听说耶稣会消灭了，高兴得大喊说：「二十年之后，教会便要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历史没有证实他这个预言。为所丧失的八百座公学的教育，为亚美二洲的传教事业，无疑是一记严重的打击；不过圣教会有永不能灭的许诺，决不系于一个修会的存在。她虽遭受唯理主义的攻击，无信仰的气氛虽在上等社会中不断增长，天主教的君长也不停地欺侮圣座，但她为经历行将爆发的法国革命大难，仍有足够的活力：法国革命在耶稣会解散后十六年即行爆发，最先牺牲的，还是这不公事件的负责者——专制君主哩。

## 叁 十八世纪的教友生活

### 信仰的劫后余生

照本章以上所述，很会使我们相信，圣教会在十八世纪末叶势必衰微已极，弗尔泰的预言几乎不久便要实现了。实在教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可说已被删除，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见他们仍是信仰寄托的忠实保管人，对危害正教的错误仍不断揭发。无信仰的气氛的确急遽地增长，不过也当注意，反宗教思想的渗透终究有其限度：它们所赢得的，祇是贵族和中级社会的一部分，大批的民众，仍旧坚持他们古老的信仰。宣传反宗教思想的，是那些站在舞台前面的流行作家，是那些风行一时的作品，也祇限于看那些作品，欢迎那些作品的人而已；但是大批的民众，信仰还是很深。

西班牙和意大利，不但对誓反教没受多大影响，即对所谓新思潮也很少被浸染；比利时也是一样，鲁汶(Louvain)大学的影响力也很可观。即便在法国，反宗教的思想及其自然的结果「不信」所传播的情形，也远不如弗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所使人相信的那样严重。乡间的民众及城市的工匠并未被波及，连在上等社会中也一样，有著名的不信者，也有度标准教友生活的人物，和保持传统信仰的家庭。人祇知谈论国王路易十五世的糜烂生活，和他宫廷内的轻薄习气，却把他足以为该世纪楷模的四位公主撇开不提，其中一位还进了圣衣会。而且社会生活，瞻礼节日及公共假日等，仍如中世纪一样遵循着教会的日历。人每视该世纪为最轻浮最乏宗教气氛的世纪，其实那祇是民众的一小部分。岂知在法国实行宗教的：如望弥撒、参加主日的日课、听道理和领圣事等并不比任何时期稍有逊色。

### 爱德和教育事业

有两种公务，当时完全或几乎完全操在教会手中而由她负责：即救济贫困和教育事业。一切儿童都归教会教育，一切需要收容的贫病，老人及孤儿，都由教会收容。例如，有人计算当时在法国，医院、收容所、孤儿院等与人口的比例数字，同今日的比例不相上下。教会的收入，大部用于这些慈善事业，以及教育所需要的更大经费。不但有钱阶级的子女，能在修会或在俗神职界所开办的许多男女公学就读，多数的学生都是免费。初级教育也很兴盛。另外「公教学校兄弟会」也增设了学校，为适应城市及乡村民众的需要，许多从事教育的新修会，尤其是女修会，都创立了起来；这当然使「哲学家」不快。比如弗尔泰曾埋怨道：「我看最重要的，是该有无知的工人；当受教

育的不是工人和农夫，乃是中产阶级的人和市民。」教会决不持这种意见；自始她便相信，谁也不能因贫穷而被排除于受教育的权利之外，她在施行宗教教育的同时，常广施普通的教育。

## 圣 人

这个宣传「不信」的世纪，也是一个圣人很多的世纪；面对着讲安逸，爱奢华及风俗浇漓的世界，却有人抛弃一切世物，专务极端的刻苦。在各个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开了许多圣德的鲜花。我们这里祇举出三位人所共知而又同一类型的，以概其余；他们都是对救主的苦难和十字架具有特别热情的：即包尔特毛利斯的圣莱奥纳(Saint Leonard of Porto Maurizio 一六七六——一七五一)，他是一位方济各会的大演讲家，对宣传拜苦路，明供圣体和敬礼耶稣圣心等出力不小。还有圣十字保禄(St. Paul of the Cross 一六九四——一七七五)，是一位严行苦工、时常祈祷、和突出的神秘家；他在二十六岁时，因一连串的神见，得知他被天主号召创立一个特敬耶稣苦难的修会，他于是冲破种种反对，创立了苦难会(Passionists)。直至他八十岁去世时，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一直是他思想、谈论、和宣讲的惟一课题。

此时期影响最广的圣人，无疑地是圣雅尔风索·利高烈(St. Alphonsus Liguori 一六九六——一七八七)。这位纳坡里富翁的哲嗣，对文学科学都有特殊的造诣，十六岁时已得了法律博士学位。象这样一位英俊的骑士，出色的律师，很象是要在世俗场中度一种辉煌的人生，决不象要创立一个严厉的修会的人；然而当二十七岁时，因他担任的一件诉讼失败，非常差恼，使他由此反省，决心弃俗精

修。三十岁时领受了铎品，从此便献身为纳坡里及附近的穷人服务。他看这些可怜人的灵魂无人照管，遂立意创建一座修会，专门给平民传教：这就是赎世主会 (Redemptorists) 的缘起。他誓发圣愿，决不浪费一分一秒的光阴，他也英勇地忠实遵守了这个誓愿。他真是热烈无比地在下列的三种重要职务上消耗了自己的一生：听告解，讲道，编写宗教的书籍。

圣雅尔风索是一位特别多产的作家：从他的笔尖产生了近二百部作品：有培养热心的，有讨论伦理神学的，有攻击无神和唯物论的辩论，甚至也有歌曲，因为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和诗人哩。这些著作，欧洲各种语言都有译本，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不少的至今犹脍炙人口，不过那一部也没有他的「伦理神学」著名。他在过严的杨森主义和过宽的放纵主义之间，划出了一道稳妥的路线，这样对消除杨森主义对伦理学家和人灵导师们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方法更有效力。圣人被尊为教会圣师，也特别是由于这部著作。

圣人虽受尽剧烈病苦的折磨，仍至死写作不辍，寿至九十一岁。他曾被人检举不忠于圣座，并因意见不合，曾使他与自己的修会暂时分离；加于他老年的这种苦闷，远比肉体的痛苦为大。但这种危机过后，赎世主会在会祖死后，获得了飞跃的进展；该会在圣教会内为最活跃的修会之一，现有会士九千。

为使人了解教会在此时期的生活力，不可忘记传教事业在亚美二洲所展开的活跃，这种活跃自发现新大陆后便从未停止地突飞猛进。

注解：

- ①这就是对科学过分信任，以致经过了科学文化的两个世纪，还未能完全予以矫正；因为科学而不顾良心(道德)，决不足以为人类造幸福。物质文明常可改良进步，但，如果不顾道德的进步，单靠物质进步是不够的。飞机、电视、救济，舒适的生活等是文明的产品，科学战争、原子弹、少年犯罪等，也可说是文明的产品哪！
- ②这就无怪马克思( Karl Marx )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了。
- ③照最普通的解释，共济会之名上溯到中世纪：当时指的是巧人的工会，人数很多，也很有影响，国王和教宗都曾赋予特权。以后他们也收巧人以外的人为荣誉会员。在好些地方，这些荣誉会员都各别开会；最后荣誉会员分离组织了秘密会所，从事慈善、哲学或政治的活动。
- ④共济会反宗教的趋势，以后在法国更加尖锐化，在天主教徒最多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及中南美等国也甚普遍。在英语的国家，象英吉利和北美，他们的态度普通还比较温和。
- ⑤洪太因的笔名 Febronius 更为一般人所熟悉。
- ⑥最奇妙的，是赖一位裂教的君主之力，耶稣会幸未全面消灭。因为按当时的规定：教宗的诏书，应由教区主教通知耶稣会士，始能发生效力。但俄罗斯的主教们受命女皇凯塞琳二世，未公布教宗的诏书，因此俄境的耶稣会士仍得存在于他们的公学内；教宗比约六世及比约七世对这种情形都曾予以认可，因此该修会总未完全消灭；卒于一八一四年比约七世在全教会内又将它复兴起来。

## 第十八章 十七及十八两世纪的传教情形

### 壹 传信部的建立

#### 十七世纪初叶的传教状况

圣教会在十六世纪，度过了她传教史上最辉煌的一页，随着新地的发现，传教士给基督争取了如许的新地域和新信徒，好象天主愿用此新收获，补偿因誓反教的分裂所招致的损失一样。一切修会都致力于这项事业：方济各会士，圣衣会士都闻风兴起；新创立的耶稣会会士也加入了行列，供给了教会大批的近代传教士：先是圣方济各·沙勿略，继而是给中国传进福音的利玛窦。

西班牙人在中、南美传教，自墨西哥到南美大陆尖端，又传至菲律宾，不但占领了广大的土地，也建立了教会和圣统。在这广大的领土内，有数百万土著皈依了圣教。

葡萄牙人人数有限，不能以武力占领他们所发现的广袤地域，于是在巴西，沿非洲海岸，印度以及马来半岛等地，祇在战略地点建筑了坚强的基地和贸易中心，如卧亚(Goa)和麻六甲(Malacca)。澳门是东方最前进基地，传教士由这些基地出发得更远，直至印尼、中南半岛、中国和日本。

但在实现这些庞大的计划上，不是一切都完美，缺点很多，有的属人性的弱点；如疏忽、自私、惟利是图，有些传教士的素质也很差；其他的缺点则属于传教的系统一直至那时尚未改善：如果教权(Padroado)。起初虽有幸运的成绩，但也有严重的不适。

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之间，屡因传教区域的划分，引

起剧烈的斗争；实际上传教事务隶属两国国王管理，他们又常僭越神权；葡萄牙王对自己实际不能统治，对传教事业又无能力保证安全的地区，也力争保教权。传教士呢，每以其本国官员的姿态出现，而不象基督的代言人，因此在印度归化基督的人常被称为归化佛郎机(Prangui 意即葡萄牙)。圣方济各·沙勿略虽据理力争，终未能矫正此等流弊。

另一个弱点就是各修会的传教士彼此敌视；虽似为争取人灵，结果却甚悲惨。

### 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创立传信部

多年以来，有识之士，鉴于这种种弊端，便提出了挽救的方法：由圣座自己挑起传教的责任。几经探索之后，终于由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实现了这种计划；即于一六二二年正式创立了「传信部」(Propaganda)，由十三位枢机组成，内部的机构类似近代国家的部院；负责推动并统筹在一切福音尚未传入或遭受攻击的地区，一切传布天主教信仰的事宜，异教和异端裂教的地域也一并包括在内。它指定传教应进行的事项，委任主教或代牧，分派各修会人员，以便避免磨擦，也可利用他们设法产生本地神职人员；这都是指定该部应负责的任务，至今一仍旧贯。

六年以后，教宗伍尔班八世为使这项工作更臻完备，在罗马又建立了「传信部学院」(Urban College)，以便栽培献身传教的司铎。

## 贰 法国第一批传教士

十五世纪的外方传教士，大部都由班葡两国供给；法国当时被内部和宗教的战争所蹂躏，致未能参加传教的活动。至十七世纪时，时局已变；教会焕然一新(十五章已述及)，于是对远方的传教事宜也普遍发生了兴趣。不祇

是几位传教士，可说整个儿奉教的民族都奋然兴起；传教士们的信札和来往的情形在各地公开传阅，对所描写的他们以前不认识的民族的奇风异俗，激起了莫大的兴趣；也使他们晓得了传教士们所经历的考验和所英勇忍受的痛苦，甚至有殉教致命的。然而他们的成就和喜乐，也激起了众人慷慨的心肠，于是贵族和富绅的太太们都慨解义囊帮助传教，甚至农夫们也前往加拿大，一去不返，以便指导印第安人，作他们的模范，好辅助传教。

### 加拿大开教

加拿大虽然在一五三四年即为法人雅各·加尔弟耶 (Jaques Cartier) 所发现而树立了十字架，开教的工作，却到一六一五年方济各重整会士 (Recollects) 在加拿大登陆时始认真进行。无奈他们人数不足，不久便邀请耶稣会士前去协助，以后又由苏比斯会士 (Sulpicians) 加强了阵容。

加拿大地广人稀，半游牧的印第安部落主要靠射猎为生，而且常彼此战斗。为能同他们接近，传教士得适应他们的野蛮生活，混在他们那烟气腾腾的陋室内，分尝他们那令人作呕的食物，随着他们进入无边的森林，或登上他们用树皮作的小艇，没河去打猎。但不久便看出来，除非使他们定居，或同法国的移民取得联络，便无法使那些游荡的部落奉教。于是便教他们耕种，使他们学习固定而操作的生活；把印第安人聚集在圣堂修院、学校或医院的四周，那就成了传教的中心，连魁北克 (Quebec) 和蒙特利尔 (Montreal) 等大城也是这样开始的。

这里的传教工作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始便有妇女参加，先是乌苏拉会修女来教育儿童，不久以后，有一位法国女子名叫玛加利大·步尔儒雅 (Marguerite Bourgeoys)

的，在加拿大创立了一个「主母姊妹会」，至今仍繁盛不衰。❶

开始传教时不无困难；水土的不服和在未开化民族中间的低级生活，为传教士们的确是一种不小的考验；此外对恶劣风俗和术士们的敌视还得设法克胜。在伍龙(Hurons)部落中有些皈依的，但他们是野蛮的依劳瓜人(Iroquois)仇视的对象，曾同他们作了一次恶战。依撒各·约格(Isaac Jogues)神父也被掳为奴，受了长期的苦刑，在严酷的刑期中曾赢得几名刑役归正；以后被荷兰誓反教徒救出，回了法国；但不久，又冒死返回曾受刑的地方，终于一六四六年被残杀。❷

一九三〇年圣教会将布来卜夫神父(P. Brèbeuf)约格神父和他们六位同伴殉教的耶稣会士列入圣品，但为基督倾流己血的不祇他们几位，还有鞠躬尽瘁而死的。他们并没有白白牺牲，印第安人中奉教的固然数目很有限，但奉教最多的伍龙部落，已被依劳瓜人消灭，但依劳瓜人不久也接受了传教士和信德，他们信教的后裔至今犹存。但在加拿大传教的宗徒所获得的最辉煌成绩，却仍能保持，以后法国天主教移民的小团体也继续发展；当十八世纪加拿大归英国誓反教统治时，他们团结在他们神职人员的周围，抵抗了种种压迫，保持着自己信仰的完整。今日加拿大的天主教徒的大部都是这些开路先锋的后裔。

### 遣使会士的传教

在北非沿岸，回教徒羈留着他们的海盗所俘掳的成千成万的教友作奴隶，圣味增爵所遣派的首批遣使会士，就是献身到这些俘虏中间去的；他们也成了他们的殉教者：一六八三年若望瓦筛(Jean Le Vacher)便是被缚在一门炮口上，被炮弹轰烂的。

传信部把玛达加斯加( Madagascar 即今日的马拉加西)的传教事宜，也委托给遣使会，为他们却是一个可怕的考验：圣味增爵派遣了第三批传教士，都因不服水土而相继逝世；圣味增爵的继位人仍继续派遣会士，但最后他们也都病倒，祇得被迫回国。其他修会，如嘉布遣会士、耶稣会士、道明会士，也在非洲其他地域作过种种试探，效果也很有限。这个广袤的大陆，亘十七十八两世纪，几乎没有教友进入内地。谁能料到在十九世纪，非洲却成了天主教传教成绩最辉煌的地域呢？

### 叁 辣丁美洲的传教情形

中、南美新发现的加拿大不同，自一世纪以来，已建立了两个殖民地。传教士步武远征军的后尘，在兵士和移民所到之地，都树立了十字架。所以十七世纪初叶，在辣丁美洲已有教友近千万，由许多不同的成分组成：有西班牙和葡萄牙远征军的后裔，有皈依的印第安土著，有黑奴和混血儿。这些传教区的地方，好似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国土的延伸，划分为总主教区和主教区，主教都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委任：因为在十七十八两世纪，美洲的班葡传教事宜都受制于「保教权」。按照当时的宗教观念，国王负着真正宗教的使命，好象罗马教宗在美洲的代理人一样，负责照顾印第安人的身灵利益：因此国王保护并控制了传教的事项。主教和传教士们接受了这种控制，从欧洲启程时便开始生效：苟无国王的授权，任何传教士不得出离西班牙或葡萄牙；有时候每只出口的船，都受命携带传教士。

#### 神职人员

在会及不在会的神职人员很多，但分配得不均；在城

市的神父很多，在乡间的不但稀少，且往往程度较差；最遗憾的是美洲开教百余年之后，还没有本地的神职人员：在西班牙占领的初期所试行开办的修道院，成绩不佳，以后便行放弃。

那些神职人员中，有不够标准的，借殖民的制度从中取利的固然也有；但另一方面，神父们——尤其是会士都燃烧着救人灵的心火，对任何困难和危险都不却步，盲目地向民众们宣扬福音。也有见印第安人受压迫虐待起而加以保护的，其中有葡人味耶拉(Vieira 一六〇八一—一六九七)，曾作过钦差大臣，后入耶稣会，他毅然向葡萄牙国王告发高级官员和商人们的不公，并反对贩卖黑奴，这样一来，便惹怒了殖民的人员，竟强制将他遣返葡国；不过二十年后他又返回巴西，老死该地，寿至八十九岁。此外还有班国耶稣会士伯多禄·克拉味尔(St. Peter Claver 一五八〇—一六五四)，居留哥伦比亚(Colombia)三十九年之久，自称愿「终身作黑人的奴隶」，看顾洗涤患病者——那怕是痲病和瘟疫也不回避，教育他们，给他们授洗，保护可爱的黑人免受主人的虐待，真是基督圣爱的再世。③

### 巴拉圭的隔离

既然是欧洲人常给归化的土著建立不良的榜样，耶稣会士便试图尽量禁止印第安教友与欧人接触；这种隔离政策施行了很久，结果良好；这就是历史中有名的「巴拉圭隔离」(Reductions of Paraguay)。这种制度，把属于瓜拉尼(Guarani)的民族团结了在一起，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不但是今日的巴拉圭，连乌拉圭(Uruguay)巴西(Brazil)也包括在内。

每隔离的一伙组成一个大村庄，有时多至万人，都是清一色的印第安人，在两位或三位耶稣会士的指导下生

活。这些村庄都具有同样的规模：一个宽广的长方形建筑和一个广场，街道都以直角相交，街傍是住宅。在广场附近有圣堂、医院、养老院、学校、寡妇堂、和神父的住宅；神父是神灵的导师兼居民的管理员。他们的财产是共有的，每家可利用一处房舍，然而田地、牲畜、工具都是公家的财产，工作也是共同负担。神父们指导工作，每天的工作由早晨弥撒后开始，总不超过八小时，有时还有音乐伴奏着工作；工作的一切成果都归公家所有，大家的需要则由公家负担：例如衣服、饮食、儿女的教育、病人鳏寡孤独的供养及娱乐等。瓜拉尼人对教士所教的一切手艺，学习得很快：如刺绣、制作钟表、印刷雕刻等……他们并在神父们的指导下建造了宽广而美丽的圣堂，在其中常举行盛大的礼节，音乐和歌唱的伴奏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都是瓜拉尼人所特别擅长的。

这个民族在这样的生活下度过了一世纪半，人口达三十万。不用说瓜拉尼人在神父们的领导下，过着幸福而真正教友的生活；连教会的仇敌，象弗尔泰等，对这种特殊的成就也禁不住惊奇。然而要这些人无限期地生活在「天主的城」内，而与世界其他的人完全隔离、恐怕是乌托邦吧！这种隔离的成绩，却引起了官吏和教会当局的嫉视，因而希图加以控制。惟利是图的商人也以为耶稣会士是在那里淘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竞争惹起了一场恶战，摧毁了许多隔离村。反对耶稣会的仇恨在十八世纪越长越深，终至消灭了耶稣会。最后十九世纪初叶的战争分割了南美，这种制度也就完全无影踪了。

### 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开教

圣教会继续进行的另一处就是现在美国南部地区，当时居民祇有印第安人；传教士——方济各同耶稣会士——

由墨西哥逐渐向北发展，给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德克萨斯 (Texas) 和佛罗里达 (Florida) 宣传福音和文化。在十八世纪末年，有一位非常的人物名叫尤尼伯劳·塞拉 (Junipero Serra 一七一三——一七八四)，似乎能说他兼有归化辣丁美洲的伟大传教士们一切的勇毅和圣德。他是一名身体弱小而又瘸腿的方济各会士，起初作神学教授，一七四九年来美，一心愿作红种人的宗徒；他重新拾起了加利福尼半岛(或称下加利福尼亚)耶稣会士所放弃的传教工作，然后又进入北加利福尼亚，并冒着超人力的困难，在那里建立了一连串的据点。历史家们都一致认为方济各会士是加利福尼亚的真正创建人。当一九二七年美国总统命将尤尼伯劳的象安放在华盛顿议事厅，列入「创建美国的国父们」的中间时，也就是正式承认了这种功勋。

## 肆 印度的传教情形

葡国人在印度发现到处有阶级的系统：每人由于出生，便隶属于一个固定的阶级；这样的阶级有数百之多；一个阶级的人同阶级较低的人无任何来往；除降至巴利阿人 (Pariah 被轻贱的最下级) 外，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

葡人认为这种系统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在同土著来往时，也从不加以介意。他们号召所有的人奉教，因为对印度的语言认识得不够，因此常用不适当的名词。于是「你愿意作教友吗？」这个问题，便变成了「你愿意作佛郎机吗？」但佛郎机是十字军以来，回回加给教友的轻视之词。

这样的传教方式，或者能在葡人所控制的地方建立教团(其价值令人怀疑)；但在别处——几乎在印度全国，阶级制度却划分得极严；葡化的教友遭人轻视，等于叛徒。

至于传教士呢，如果他在某一社会内祇由较低的阶级接受了一滴水，也被视为严重的不洁，他再同其他一切阶级接触也要受到歧视。

### 诺比理神父

当时有一位智力很高而且爱德很大的意籍耶稣会士名叫罗伯尔·诺比理(Roberto de Nobili 一五七七——一六五六)，来到马都拉(Madura 在印度半岛南端)传教区，他在印度所建设的传教事业，可与利玛窦在中国所作者媲美。他晓得应改变方式：既然高阶级的人——另外是婆罗门(Brahman)——领导着舆论，自然先该赢得他们；惟一的办法是和他们同化，对婆罗门自己也该变成婆罗门。诺比理于是便穿了高阶级净行者的黄袍，那是普遍为人所尊重的；采用了他们生活的一切方式，祇同婆罗门来往交际。这位罗马的高级人士，在马都拉很快便出了名，他也成了一位净行者，不喝酒，对印度的语文和经典都有很深的研究，甚至印度的婆罗门学者都来和他谈论，对自己的道理也向他质疑问难。他因此使他们皈依的很多，对他们的习俗和礼节，祇要他认为没有敬拜偶像或迷信的色彩，他都准许他们保留。

诺比理在马都拉的工作，至死为止(一六五六年)；因他的鼓励，教会有了全面进展；然而这种革新也遭遇了不少的猜忌。他被人在罗马控告准人行异端，诺比理被迫为自己辩护，结果教宗额我略十五世认为他有理。祇是自此规定了在印度要有两种传教士，一种专门为上层阶级，一种为下层阶级。

### 若望·布理道

自诺比理去世后，婆罗门归正的便甚为稀少了，其他阶级的则很多。马都拉的教务，因圣若望·布理道(St.

John de Britto) 又大放了异采。他出身葡萄牙望族，是国王的朋友，在十六岁时便辞去世荣参加了耶稣会。他被派至马都拉后，竟使许多部落皈依；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使他畏缩，他曾多次坐监、被打、受刑，甚至被判死刑，但在他答应离境的条件下却被释放。上司把他遣回欧洲，讨论印度的教务问题。但一经获准，便又返回他的传教区；不久便被捕处死。

他殉教的信息，燃起了传教士们的心火，也使新教友更加坚强了。圣人在最后几年，授洗了八千多人。

不幸以后印度的教务也受了象在中国同样的「礼仪之争」的打击，我们留待下章说明。

### 锡兰传教的情形

荷兰的加尔文派把葡萄牙人驱逐后占领了锡兰岛(Ceylon)；把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也赶走，不过出生于卧亚的几位印度神父未遭驱逐。卧亚一位满腔热血的神父，名若瑟·瓦兹(Fr. Joseph Vaz)听说锡兰教团的悲惨命运，决心去帮助他们；于是乔装乞丐，偷渡入境，不但把失散的羊群又团聚起来，且有出奇的增加；在他自入境至去世(一七一—)的二十五年岁月中，他归化了三万多人。④

## 伍 陆德神父与代牧的创立

### 亚历山·陆德神父

一九六〇年越南曾由官方发起正式庆祝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亚历山·陆德神父(Fr. Alexandre de Rhodes)三百周年纪念；陆德在越南，就如利玛窦在中国，诺比理在印度那样驰名。陆德不但被尊为越南传教的开山祖师，即在文化的领域也是一位创始人，而且他对传教区的影响，

远远超出了他传播福音的主要园地以外。

他于一五九一年左右出生于亚味农(当时还是教宗的领土)，十九岁时在罗马进耶稣会初学院，立志步武方济各沙勿略的后尘。他曾请求被派往日本；他也和利玛竇一样，先攻读算术，作为日后传教的准备。他对科学的知识，为使他得进入王宫有了很大的助益。不过陆德神父还有许多其他的材能，致使他成为一位无比的传教宗徒：除了稀有的圣德以外，他还有特别的精力，一颗同情人的爱心，传教教人的神火，和一副永保青春的性格。

陆德于一六一九年自里斯本登舟，经过了在卧亚和麻六甲长期的停泊，终于在启碇后四年抵达澳门；但前往日本的希望已断，因当时日本已严闭海关，不准传教士入境。于是便被上峰派往另一传教区——安南，有几位耶稣会士已在那里工作了几年。

越南当时的领土，还不象今日向南延伸得那么远，但已分裂为两个王国：北部称东京，以河内为首都；南部称安南，以越为首都。⑤

### 陆德神父在安南

陆德神父被派去的，正是这个最后的王国安南；他本来不是第一位入境的传教士，一世纪以来，各修会的传教士已在那里工作，不过领洗入教的却很少；政治的不安定，固然是成绩很小的一种原因，但也是因为时作时辍不能继续，且缺乏适当的方法。陆德神父一到，立刻便理会出来，以前的传教士，很少有精通当地语言而不需要通译的。陆德神父虽有语言的天才，但为学习那种难学的语言，也曾一时感觉失望。日后他曾追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一听他们谈话，真象听见鸟叫一样」；但他在恒心努力了六个月之后，便能用越语听告解讲道理了。他曾进入王

宫，并归化了一名国王的近亲；这样一来，这个新教团便有了最坚强的靠山。

不久长上请陆德神父到北部王国东京去开教，因为直到那时，除了几个婴儿在死亡的危险中受洗外，成年人连一个领洗的也没有。陆德却在那里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他有丰富的学识，尤其是因他那「随乡入乡」的精神，使他得了辉煌的成绩，且赢得了国王的信任。他曾写道：「国王立即命人给我们建造一座房屋，且有一座大圣堂；我每天得讲道四次，有时多至六次。国王的一位姊妹和十七名近亲都领受了圣洗。还有许多有名的军官僧侣和士兵：那样容财使僧侣归化，真使我最感惊奇。当我使他们看出来，我们的宗教多么合情合理时，他们非常高兴。」

他又说：「我们的教友，信心非常坚强，任何事情不能使他们丧失信德……他们为办告解望弥撒，竟不怕走十五天的路程……使我能修治这个美丽的葡萄园，实得力于传道员们的惊人臂助；说实的，这个教会能有这样大的进展，除天主以外，得全归功于他们。我看出来，我是惟一能讲道的神父（意即以前的神父都不会讲越语），我选了几名尚未结婚，心火极盛而又热心的教友作我的同伴，帮助我传教教人。他们在望弥撒时公开发誓，终身给教会服务，总不结婚，并服从来传福音的神父们。现在这个修道院中已有一百多名，他们的经费，都是教友们负担。」

这种平静的情形，延长了一年半左右，不久便起了第一次风暴；此后安南教会的历史，便在时而顺利时而被迫害中交替进行。陆德神父四次被迫离境；但当这位英勇的战士被迫出离北部国境时，他便转入南部，或到澳门去暂避，等待机会，以便重返安南。他所栽培的传道员非常忠实，宁死不肯背教；所以当他不在时，便由他们来支持新教友们的信德。

一六四五年陆德神父再被驱逐，从此便未得返回安南，留下了三十万教友，他们已多次受过迫害的考验，其中宁死不背信德而殉教的很多。⑥

### 宗座代牧的建立

陆德神父返抵澳门后，便被长上选为代表，往欧洲去办理传教的事宜。他取道印尼、印度和波斯等地，一路调查了五年之久，终于抵达罗马。

他把在亚洲传教漫长的经验中所拟就的计划，向教宗和枢机们陈明；以安南的三十万教友为例，证明能有更多皈依的希望。为供应那些教友的神灵需要，非派遣三四百位神父不可；但这么多的神父由那里去找呢？他举出日本为例：「如果该国现在有许多本地神父，情形又当如何？正因为时在时局顺利的时候没有培植本地神职人员，致使今日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啊！」神父能从安南的传道士中就地取材，但为赋给他们神品，非立即派遣主教前去不可。但是这些主教必须表现自己与一切政治势力无关才成。

陆德神父深知那两个对世界平分秋色的殖民势力，过分重视他们的特权，为传教事业成了多大的阻碍：除非西班牙或葡萄牙认可，亚洲便得不到传教士。现在应该由新创立的传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 (Vicar Apostolic) 派遣主教，为证明他们实在是受命于罗马圣座；这些主教也应专心努力培植本地神职人员。⑦

教宗和枢机门很关心地采纳了陆德神父的意见，但因害怕葡萄牙反对，以为建立宗座代牧与她的「保教权」相冲突，不得不延缓实行。陆德神父便开始自行去寻觅赞成这种计划的神父，以俟获得了圣座的批准，便去实行。他在意大利和瑞士既然找不到，便起身去法国。当时法国宗教的活力正旺，又为到远方传教的心火所鼓舞，于是便对陆

德神父所提示的思想，造成了有利的气氛。何况陆德神父本人又颇具吸引力：大家便都愿一见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并详听他的言论。他于是便与有关方面取得了联络，其中有热情的司铎，有希望至少以金钱帮助致力传教的世俗教友；圣味增爵和法国主教会议都很兴奋；司铎们自动献身，其中有的前赴罗马，请求教宗准他们「离开祖国和亲戚朋友，并奉献他们自身和所有的一切，为救远东人民的灵魂。」他们热烈的催促战胜了一切阻碍；圣座选派他们中间三位为宗座代牧：方济各巴禄 (Francois Pallu) 和郎伯尔·穆德 (Lambert la Motte) 二位被指定去安南，有延伸至中国南部各省之权；依纳爵·高道兰底 (Ignazio Cotolendi) 被任为南京代牧。但最后这一位在未上任之前便去世；其他二位则遭受了来自维持葡人保教权方面的种种反对。

### 一六五九年的训令

一六五九年，传信部给宗座代牧们出一道训令 (Instructions)，说明他们应遵守的原则。叮嘱他们不要干预国家的政治，不要推动人民变更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固有的礼仪；反之，祇要不明明反对信德和善良风俗，则当予以尊重；「因为所有人民，都重视、爱慕本国的传统和祖国在世间其他国家以上，这是根于人性的。」假如在外教国家的习俗中有可指责之点，不当立即试图改正，最好逐渐予以取缔清除。可见最后几位教宗的伟大传教通谕内所阐明的传教原则，主要的部分，已包括在这训令中了。

### 巴黎外方传教会

巴禄和郎伯尔·穆德，为使他们的传教事业继续不辍，并为陶冶有志献身传教在俗司铎，在巴黎建立了一座

修道院，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中心，至今仍在此原址。

这个传教会的精神和主要的规矩，就是这两位主教传授的，它给东亚常不断派遣传教士。

### 陆德以后安南传教的情形

宗座代牧们到达安南后，便发现了陆德神父所预先料到的情形：即惨烈的教难，一切欧洲传教士都被驱走，教友无人照管；但教友却忠实不衰，由隐藏在一小艇中的传道员暗中指导。这只小艇也成了临时的修道院，有两位传道员就是在小艇中受的栽培，送到暹罗（Siam 即今之泰国）去领受神品，然后返回安南的。有七位是在数年后在安南由郎伯尔主教手中领受的神品：这就是越南神职界最初的果实，今日却那般繁盛了。

可惜陆德神父未能目睹他那计划的实现；他的上司认为再派他回安南不甚适宜，他在六十五岁时接到去波斯开教的命令；一六六〇年死于波斯。

安南以及暹罗的教务，甚少享受和平；能公开举行敬礼的和平时期甚短，不久便教难又起，传教士和传教员都得转入地下，其中殉教者不少，教友殉教者更多；但在十九世纪初，安南仍有三十万教友。

注解：

- ① 玛加利大·步尔儒雅于一九五〇年被教宗比约十二世列入真福品。
- ② 光超出版社有圣约格的小传名「约格与红人」陈训炯译。
- ③ 克拉味尔于一八八〇年被教宗良十三世列入圣品，且被声明为黑人传教区的主保。
- ④ 瓦兹神父的列品案件，在他去世后立即开始进行，但因无法调查宣告中止；最近又重新开始。
- ⑤ 陆德神父，一如其他同时代的欧人，称此邦为「交趾支那」(Cochin-China) 这个名称以后多以称西贡一带地方。
- ⑥ 越南人公认陆德神父，是现在以辣丁字拼音的越南国语的创始人。其实在以前，早有欧洲的商人或传教士利用辣丁字拼写越语的发声了，陆德神父祇是使它的系统更加完备而已；他所编辑印行的教义书和越语字典，有助于罗马拼音的流传，致使他的名字也永垂不朽。
- ⑦ 其实传信部早已给印度指定了一位宗座代牧，是一位婆罗门，取名玛宝·加斯特罗 (Mateo de Castro)；但由葡萄牙的政权和教会方面遭遇了那么多的反对，使他灰心丧志返回了罗马。

## 第十九章 利玛窦逝世后中国的传教情形

### 壹 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

利玛窦临终时曾说：「门户我已经为你们打开，但前途仍有不少的危险和困难！」他死后的时期证实了这个许诺，为中国新兴的教会，确是一个稳定的时期；虽曾数度遭遇迫害，却也不断增长。天主教的种子已在中国播下，并且发了芽，不过根子还没扎深；如果想避免足以消灭它的风暴，应当谨慎将事。

可惜众人所见，却不尽同。龙华民神父 (Fr. Longobardi) 于一五九七年来华，将以他那不顾乏累的心火工作五十七年之久，寿至九十五岁；他当时在京便很抱乐观，新获得的成功，更加强了信心。

#### 教会的进展

一六〇七年，徐光启因奔父丧返回上海近郊徐家汇故里；便邀郭居静神父 (Fr. Cattaneo) 至家。数年之后，因他传教的热心和影响，奉教授受洗者已有二百多人。他便在其住宅的左近建造了一间圣堂，常有信友多名去该堂瞻礼。

当时上海祇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城市。嗣因李之藻之请，郭居静便偕同金尼阁神父 (Fr. Trigault) 到浙江省会杭州去开教。在定居该城最初的几个月中，郭居静便有了重要的收获。当时李之藻的友人杨廷筠御史适居家，他曾在北京得识利玛窦，但那时对天主教教义尚未感兴趣；现在因李之藻的介绍与泰西教士相识而研究道理，皈依天主教；他在一六一二年受洗，取名弥格尔，而且信心很笃，

并劝其父母及家人多名奉教领洗。

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人，堪称中国开教之「三大柱石」：实在，他们三位，以他们的影响，传教的热心，卫护圣教的著作，以及教难时掩护西洋教士的功勋，对教会所效的力，的确是难以估计的。

北京的情形也很令人兴奋：原来钦天监的人士，对预测日月蚀失验，而庞迪我神父 (Fr. Pantoja) 的推算却丝毫不爽。思宗乃于崇祯二年因徐光启的奏请，将修订历书之职，拟委任耶稣会士办理。这个消息一传出，便提高了传教士的声望，但因钦天监的反对，这项计划祇得暂时搁置。

南京的教务则全面展开，皈依者甚多；王丰肃 (又名高一志) 神父 (Fr. Vagnoni) 起建了一座圣堂，在内公开举祭，并举行教会的隆重典礼。

### 沈淮的仇教

或者由于王丰肃作事不够谨慎，对利玛窦的警告未曾多加注意，教务的兴盛遂引起了嫉妒；于是不久在南京便起了反对圣教的风波。

一六一五年，吏部侍郎沈淮莅临南京，他对圣教素无好感，在公开辩论中又数次显示理屈；他对传统的儒教本极崇拜，深恐天主教的道理与儒教不利，于是便决心使它在中国国境内绝迹。一六一六年，他曾向皇帝上书，奏请将所有的传教士及教徒处死。但徐光启立即上书保教。万历四十四年 (即公元一六一六一) 神宗终于下诏，命令将一切外国传教士押解广州，以便遣送回国。

这道诏谕如果严格执行，足使传教士在中国境内绝迹。幸赖中国奉教官绅及友好的卫护，除南京外，其他各

处均未严格执行。南京的教堂和传教士住宅，均遭拆毁；王丰肃及鲁传昭(或作曾德昭)(Fr. de Semedo)二位神父被囚禁木笼中押解广州，然后驱至澳门。居留北京的四位耶稣会士中之熊三拔(Fr. de Ursis)和庞迪我二人也遭驱逐，但龙华民及毕方济(Fr. Sambiase)二位神父，则在徐光启的宅内获得了庇护。

当时在中国只剩十四位耶稣会士：八位欧籍神父和六位中国修士；他们都被迫出离住宅，多在杭州杨廷筠家暂避。他们的居留虽为官宪所知晓，但居停主人的声望，足以阻止驱逐令对他们施行。于是他们便开始利用这个被迫的退隐，准备将来传教；在杨廷筠指导之下，加深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文学。艾儒略神父(Fr. Aleni)特别对中国风俗语言造诣最深，后竟得了「西来孔子」的徽号。此时王丰肃在澳门也对中国经典努力深造，后竟成为最优越的耶稣会士作家之一。

在随后的年月中，虽然困难重重，神父们又能逐渐从事活动了；他们出去慰问久失牧人的教友，且设法继续传教；艾儒略在扬州建立了新教团。此时又有新传教士进入中国。一六二一年教难又起，南京的教友又遭逮捕，并遭受了酷刑，其中一人竟因受刑致死。但沈淮不久失势，教会也恢复了和平。传教士虽未正式获准传教，但明朝的国祚已呈动摇，人心忙于国是，便无暇顾及传教士了。满族已开始入侵，各省莠民乘机作乱，盗贼蜂起；传教士也应提高警惕，避免人多聚会，举行公开仪式。神父既无圣堂，又乏固定的住所，多隐居教友或友好家中，庆幸还能进行传教工作。

### 金尼阁赴欧之行

一六二一年比籍青年耶稣会士金尼阁 (Fr. Nicolas Trigault) 自欧返抵中国。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利玛窦去世后的几个星期。他曾以二年的时间走遍了整个儿传教区；随即被龙华民派往欧洲向教宗和耶稣会的主司陈明中国教会的需要。他没有辱这次的使命。他经由卧亚、波斯湾、波斯、小亚细亚等地，于一六一四年抵达罗马；他给中国传教区获得了一个破格的准许：即教宗保禄五世恩准中国神父用中文作弥撒，念日课并施行圣事。❶

金尼阁周游欧洲各奉教国之行，引起了极大的兴奋。他以中国儒者的服装出入公共场所，并用他的谈话，热烈的演讲和著作❷，使人认识了利玛窦及其同会会士们所作的事业，激起了普遍的同情。

金尼阁负责给中国带去有价值的人和有价值的书：他一到欧洲，便罗致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瑞士人邓玉函神父 (Fr. Terrentius)；他在参加耶稣会以前，已是一位著名的算术、医学和语文学家；他立即决定前往中国，并被指派为金尼阁的副手。凡他们二位所经过之处，馈赠便源源而来，并有多名青年耶稣会士请求赴东方传教，其狂热的程度，甚至需要上司予以节制。最后有二十二入获准与金尼阁由里斯本启程。

当时海路危险重重，遭遇海盗风暴和瘟疫的打击，已是司空见惯；因而丧失了七名耶稣会士，其中一位乃金尼阁的弟弟。为中国所征募的二十二人中，祇有八名抵达目的地，其中二人最堪注意，即邓玉函和日后挽救利玛窦事业的汤若望神父 (Fr. Adam Schall)。

### 中国教务的进展

金尼阁和他的同伴抵达澳门时，教难尚未平息；他们

等候了一年，方得进入国境。盖因沈淮失势后，耶稣会士又被召回北京。各省的传教士见情势已经好转，便展开了传教的工作。艾儒略不久便在福建创始了丰硕的事业。这位被誉为「西来孔子」的人物，对文人学士，特别能赢得同情；他赖那些人们的支持，建立了许多教团。他并且在同时期内，在晋、秦两省建立了新的传教中心，皈依的人日渐增多。

这时发生了使天主教的声望更加提高的一项事件：即于一六二五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府附近出土（参阅卷一229页）。最重视古代金石的学者们，对这种发现甚感兴趣，不过对碑文谁也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于是李之藻的一位友好，便将该碑文的一份拓本寄往杭州。李氏由教士们帮忙，毫无困难地证实了所谓「景教」，实即天主教<sup>③</sup>。这样一来，中国人往往以天主教为新产物的疑问，便不攻自破了。这块被天主照顾保存而忽然出土的石碑，证明在九〇九年以前的唐朝，福音业已传入中国，且获得了中国最伟大皇帝们——太宗、高宗、玄宗等的宠信。

### 修 历

徐光启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后，便决心实现他那委任耶稣会士修订历法的计划。一六二九年适有日蚀，钦天监未能准确测出，而邓玉函的测算则非常准确。于是徐氏便乘机向皇帝上书呈请，将修订历法事委于西贤。皇帝批准。这种信任的表示，立即在各省提高了传教士们的声望。徐氏便指定了李之藻、龙华民和邓玉函三位专司其事。从此直至一七七五年，耶稣会士便常在钦天监供职；耶稣会被取消后，便由遣使会士继任。在这冗长的期间，北京的教



利马窦与徐光启画像—  
中华传教新法的创始人



纪念碑—建于南京一九二五年

士在他们的职务上所得的声望，对外省教士们的传教事业大有裨益，并且在教难时，钦天监将是他们惟一的避难所。

邓玉函得徐光启之助，立即着手将一系列科学书籍译成中文。可惜这位前途无量的学者，不幸早逝（一六三〇年）。徐光启乃指定汤若望继其职务。汤氏在他这新职中，发挥了他特殊的天才和不平凡的德行，而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任何传教士所望尘莫及的，三十五年之久，他一直是教会中国的坚强支柱。

### 徐光启逝世

徐阁老光启不幸于崇祯六年（一六三三）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教会丧失了有力的保障。他在病榻上，尚殷殷以坚强教会的情势为念；除向皇帝尽力推荐神父于钦天监外，并呈请任命教友李天经继承其职务。临终前数日，他一心专务祈祷，并与传教士讨论天乡永福。

玄扈先生无疑是中国当时最卓越的人物，也确实堪称中国最标准的教友。他自皈依后至去世，德表昭著，足以领袖群伦。他虽皈依后极人臣，生活却非常俭朴，收入祇求能维持家庭生活便足，其他悉数用为补贴教士或哀矜穷人；在遭受饥馑的省分，人皆目之为「贫穷者之父」。在他最后呻吟病榻时，教士们理会他甚至无钱购买普通药品。

杨廷筠和李之藻，皆先徐光启弃世：前者在一六二七年，后者在一六三〇年。这三位「教会柱石」虽摧折，但因他们的传教热诚，教会在中国可说已根深柢固。

徐光启和利玛竇一样，目光远大，常注视着将来。他们对将来的收获，比暂时的繁荣看得更为重要。因此对修订历法的计划，起始虽阻碍丛生，他却尽力坚持不放：他

认为教会的稳固与自由皆将赖此保证；他的希望的确没有落空。

### 道明和方济各会士来华传教

截至现在为止，祇有耶稣会的传教士，由澳门这惟一的门户，进入中国传教。这时要看到从菲律宾来的西班牙道明和方济各会士，也进入这个传教的舞台了。

一六二六年，有从菲律宾来的道明会士登陆台湾，在基隆建立了岛上第一座天主堂。可惜十六年后，西班牙人被荷兰的加尔文教派逐出台湾，这次初步传教的果实便被消灭；但此时的西班牙传教士，因葡萄牙人不准他们在澳门插足，乃以台湾为进入中国的跳板。一六三一年有两名道明会士自台湾启程，祇有一位名叫高奇 (Fr. Cocchi) 的神父得进入福建，另外一位途中被海盗杀害。二年以后，有两位在中国传教史上占着重要角色的传教士：一位道明会士名黎玉范 (Fr. 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一位方济各会士名利安当 (Fr.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潜入福建，与在该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取得联络。随后几年，其他道明及方济各会士也追踪而至。<sup>④</sup>

在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耶稣会士之间，不久便起了磨擦。如果对这些充满救灵神火的会士们的冲突，祇看作是由团体精神所引起的小小对立，那就错了；那实在是导源于传教所怀的不同观念。在南美以及菲律宾，方济各和道明会士传教的对象，是文化落后的民族；他们到达该地后的第一企图，便是推翻偶像，以欧洲奉教国家完全不同的风俗习尚来代替异教的习尚。拿这种作风来对待远比欧洲文化为低的民族，尚能获得良好的成绩。

反之，耶稣会士在日本和中国所面临的，乃是拥有古

老和高度文化的民族。经验告诉他们，如果有伤他们的自尊心，势将毫无所获。为此他们追随着利玛窦，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作风，虽似缓慢，却甚明智：他们对本地固有的文化完全尊重，凡他们习俗中与福音精神不相冲突的一切，都设法予以保留；对可指责之点，则予以逐渐的清除。新来的教士认为那是世俗的明智，与宣传福音人的身分不合。反之，那些会士手持苦象，在市衢中大喊：「凡拒绝相信福音，便如孔子一样堕落地狱」；耶稣会士一见到这种情形，当然不无惊骇之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激怒的作风，不但无益，祇能掀起迫害；果然数年后福建便教难大作，教士被驱逐，圣堂被充公。

当利安当在福建登陆时，该省的耶稣会士请他另觅传教的场所；他便去了南京。当时沈淮最残酷的教难甫告停止，教友刚得了一点儿喘息的机会，见他语言似通不通便贸然前来，认为非常不妥，深怕他再激起一次新的教难。利安当好象不明白事态的严重，坚持非留居不可；最后教友们无奈，祇得强迫他登舟，把他送回福建。

利安当心胸阔大，对这次事件尚能泰然处之，未思报复，但在其他事上，则不能与耶稣会士同意。他对中国文字尚没有较深的研究，认为「祭」字祇能指弥撒圣祭，决不可用它指敬礼祖先的礼节；当他和同会的人看见教友祭祖的礼仪时，竟向牌位叩头，并分享祭品，认为这事决不能容忍。教友虽试图向他们解释：「这种礼仪祇是表示孝思，毫无宗教的意义，决不当遭受非难」；他们不愿置信。于是方济各及道明会士齐向耶稣会的长上质问，对他们的答复认为不能满意，乃决心向罗马上诉。黎玉范便于一六四〇年前去罗马，三年后始行抵达。这意外的事件虽

未影响全面传教的工作，祇在福建省惹起了些骚动，但对以后震动欧亚两洲的大争辩，却是一个前奏。

此时利安当在艰苦的旅程后，回到了马尼拉。一六四九年又返抵中国。他的确是一位优越的传教宗徒；虽因观念不同使他不能与耶稣会士合作，却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赞美；他在通讯中也不断称赞耶稣会士。他重返中国，途经北京时，曾受到汤若望的热烈欢迎，他们二位且结了深厚的友谊，至死不渝。汤若望给利安当写了一封介绍信，他持此去拜见济南某位显宦，且呈献了些礼物；因此他很顺利地 在济南得以定居，且建筑了一座圣堂，至一六六二年他已归化了三千多人，这就是方济各会士在山东开教的滥觞。汤若望对这个新兴的教团总没有忘怀，当它需要时，他常自北京予以援手。

### 天主教在宫廷和在各省的进展

这些年以来，天主教得传入宫禁还是首次。原来一六三二年有太监兄弟二人在龙华民手中奉教归正，洗名艾来伍和亚基娄(Nereus et Achilleus)；亚基娄即有名的庞天寿，他信教诚笃且极勇敢，对明朝垂危的王室忠实不渝。由他及另一位王姓太监的介绍，汤若望得将福音传给宫中的命妇，其中有位极显要者。汤若望和她们决不可能发生直接的关系，祇能由王总管传递书信。他们在紫禁城内有一小圣堂，她们在其中共同祈祷，并由王太监听受道理。她们度的是隐居的生活，常为传教士做些祭服或给穷苦人们做些衣服。汤若望当然从未在该小堂作过弥撒，但有时能在皇宫内给太监们作弥撒。截至一六四二年，已有五十位命妇，及皇室近戚一百四十人领受了圣洗。

金尼阁自欧洲带回来一部很美丽的表现耶稣生平的正

象，共一百五十帧；汤若望附上了中文说明，连同精美五彩的蜡质所印铸三王朝拜耶稣圣婴的圣象，一并进呈皇帝。皇帝非常喜悦，在潜心默观之后，竟命人将它们列在大殿中，供皇后太监和全宫中嫔妃命妇宫女等朝拜瞻仰。皇帝对福音经及汤若望对耶稣生平的解释文也屡加浏览。一时盛传皇帝也信服圣教了。但据我人所知，即使他明了了天主教的真理，他也没有崇奉的勇气。

现在天主教在各省已公开宣传，各大城市及国道的沿途，都建立了重要的传教站；官绅、兵士和商贾在大都市奉教以后，便四散向各方传播。方传望神父 (Fr. Etienne Faber, ou Lefèvers S.J.) 在晋，秦二省传教的成绩尤为显著；无论教内外，都视他为圣人和显灵迹者，甚至在他去世后二世纪，仍有人到他的墓前去巡礼。在上海一带，教会发展得也很快，教友已近二万名；这样的成绩一部分得归功于徐光启的孙女甘第大；她早年守寡，并且寿至七十三岁，便将自己冗长的余年都献为传教之用；更因她的慷慨捐助，在上海一带修建了一百三十五间大小圣堂。利类思 (Fr. Buglio S. J.) 和安文思 (Fr. Magalhaens S. J.) 二位神父并在四川开教。

明朝灭亡后，除云南、贵州外，其他各省都听到了福音，教友的数目也自利玛窦去世时的二千，四十年后增至十五万。若看传教士的数目，这种成绩便更堪注意了；因为散在全国各省的传教士最多祇有二十余名。

### 明朝的衰亡

明朝日渐衰微，流寇四起，北部的鞑靼(满州)威胁着北京；朝廷便命汤若望铸造大炮以抗强敌。他虽尽力推辞，终归无效，不得不应命铸造。但朝廷内部腐败已极，

宦官弄权，虽集世界一切大炮，也难挽救颓势。终于一六四四年复亡；叛贼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缢殉国。乱民恣意劫掠，不久满兵进关，李自成纵火西遁。此时教友力劝汤若望同他们一齐出离北京避难，但他相信天主必加助佑，不忍放弃他所艰难缔造的教会。大火延烧了三天，而那吞噬皇宫及庙宇的火焰，竟在汤神父的住宅前止步，未遭波及。在这次兵变时，汤神父在城内各处奔走，慰问灾民。

清兵虽已控制京师，但十五年之后，始将全国征服。在这次大动乱的前后，有七位耶稣会神父死于非命。清兵在河南开封，决开黄河大堤，以便驱散围攻的军队，费类斯神父(Fr. Figueredo 字藏玉)与三十万居民同葬洪流。在福建的长期战争中，最繁盛的几个教团几乎湮灭无余；班籍道明会神父真福方济各嘉彼辣(Bl. Francisco de Capillas)即在此时殉教，这是第一位在中国为信德而捐躯的传教士。他先在菲律宾尽职十年，于一六四二年转入福建，在福安学习华语；然后步行去传教，足迹几遍全省，除旧衣一身，日课经一本，苦象一尊外，无其他长物。外教人嫉妒他传教的成绩，挑拨清兵攻击教友；嘉彼辣不顾迫害和战乱，依然继续奔走布道，卒在福安附近被捕，受尽酷刑后，于一六四八年一月十五日被斩首。

明朝末帝永历辗转逃至桂林，尚有些忠臣义士追随他继续抗战，其中有宦官庞天寿。庞氏向永历及皇后，皇太后等讲解天主教道理，并将新到中国的耶稣会神父瞿安德(字纱微 Fr. Koffler S. J.)召至宫中。一六四八年，皇族内有五人受洗，中有永历皇后洗名亚纳，生母马皇太后洗名玛利亚，还有永历嫡母宁圣慈肃皇太后洗名烈纳。永历

终日醉心声色，对受洗事不感兴趣，但准其此时所生的皇太子受洗，洗名当定 (Constantinus)。

一六五〇年，皇太后烈纳及庞天寿，曾上书教宗及耶稣会总长，请求代祷，并请派遣传教士来华。⑤派卜弥格神父 (Fr. Michel Boym S. J.) 将该书带至罗马。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使命；但在八年后路经安南返回中国时，明朝的国祚已经绝望：一六五一年，瞿安德遭清兵逮捕杀害；忠肝义胆的庞天寿也于一六五七年逝世。卜弥格旅途跋涉，本已心力交瘁，现在经此噩耗的打击，遂至一蹶不振，于广西与安南的交界处逝世 (一六五九年)。不久，永历帝被清兵追击，逃入缅甸，但被缅王所执，献之清兵；清兵遂将他连同他那十四岁的太子一并杀戮。明朝三百余年的国祚于此告终。其他生擒的皇族，被带至北京，禁锢终身，至死信教不渝。

## 贰 满清初年

### 教会在汤若望卫护下的情形

当汤若望的同会弟兄在中国南部随明朝的命运升沉时，他已在北京获得了执政者的宠信。多尔衮一占领北京，立即命他安居寓所，不久便委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国家最重要的一种职位。汤若望在他的上司 (省会长) 傅汎济的命令下，始接受此职，而且说明了条件：即祇管皇历中有关天象的部分，也就是星辰的运行，日月的蚀亏以及四季的节令等，其他所谓黄道吉凶等概不与闻。他并邀准了，与他会士的身分不适合的荣衔也概不接受。虽然如此，仍有许多同会弟兄——连在北京的也不例外——极力反对他接受这个职务，直至汤若望逝世那年，教宗批准了

他和继承人保留这项职务，争辩才完全平息。

汤若望任钦天监近二十年，成了中国教会最显著的象征。冲龄的顺治帝对他敬爱有加，甚至称他「玛法」(Ma-fa 这个满州名词，中文可译为「尚父」，乃子侄辈到父执的称呼)。他很喜欢同汤若望倾谈，甘愿听从他的建议。幼帝不愿常召他进宫，却常亲幸他的寓所，与神父们长谈，以便了解他们的工作。汤氏利用他对皇帝的影响力，试图把教会的真理灌输到他心中。这种宠遇直至皇帝某日因垂涎某武官妻室的艳丽而失足，便忘了他所听讲的宗教和他皇帝的本分，一心宠信僧徒；然而当他病重垂危时，却将汤若望召至病榻前，并在众皇子中指定了年方七岁的玄烨为皇帝继承人(康熙)。

#### 康熙即位 杨光先的仇教

顺治死后，反天主教暗潮便开始蠢动。回佛两教的人决心铲除在中国的天主教，于是便联合起来攻击汤若望，其中最狠毒的便是杨光先。他于一六六四年(即康熙三年)上书礼部，攻击「西洋新法」，指摘汤若望推算历法有误，并诬西洋神父传布邪教。辅佐幼帝的四位大臣对天主教亦无好感，其中一位名苏克萨哈者更加敌视汤公；礼部遂接受控诉。他便与在京之其他三位神父：利类思、安文思、及抵北京已四年辅助汤公的比籍神父南怀仁(Fr. Verbiest)一并下狱；此外还有奉教的七位官员也与他们同罪。汤若望因为是朝廷命官，未加镣铐，其余都是银铛加身的囚禁了六个月，几乎每日提审。汤公以七十岁的高龄，竟如一名囚犯跪在地上受审，且因近来身患麻，口舌结塞，不能清晰发言为自己辩护，这种情形，真是令人见了酸鼻。南怀仁虽尽力辩证，将被控各条一一反驳，终



汤若望象

归无效，敌人灭教之心已决；于是汤公判决论磔(凌迟)，褫夺公权终身，奉教官员斩首，其他传教士充军。

五位奉教官员已执行斩首，判决书本是要全部执行的，但因天上显出了异象(彗星)，全城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内也发生了火灾，焚毁房屋四十余间，人皆视此为上天为证明神父们的无罪所表示的震怒与惩戒。当辅政大臣向皇太后呈递判决书时，她将它抛置地上，以足践踏，并向辅政大臣们反问：难道他们忘记了汤公是她儿子顺治皇帝所要他们尊重的人吗？而今他们竟待他如囚犯！她于是下令立即予以开释。

这时在中国的一切传教士，除福建三位道明会士潜匿未获外，其他均解至北京；由此再押解广东监押，直至一六七一年始获释放；一切圣堂全遭封闭。传教士被押期间，得知教友在传道员领导之下，俱皆保持忠贞，甚感欣慰；此时祇有一位新圣的国籍神父罗文藻，不辞辛劳，巡行各省，慰问受苦者，鼓励软弱者，还给受窘迫的教会赢得了新教友。

### 汤若望去世

汤公已年老力衰，所以在受审折磨后祇活了一年，便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时在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他在预感死期将近时，便口授了一封长函，请求同会弟兄们原谅他所给予的恶劣榜样。

汤公堪称中国教会的第二开创新人。在清朝定鼎时，人们深怕那些胜利者，要对明朝末帝所优遇，及明裔在中国南部摄政的亲王所支持的教会和人物，加以追究迫害。汤公对明朝忠实尽职，对新主也能赢得信任，给传教士们获致了为传教所需要的自由。

他那广泛的学识真是光芒四射；不但对算术和天文拥有当时最新的知识，他还是优越的神学家和历史家；不但能说纯正的华语，对中国文学的造诣，也能跻身学者之林。他的德性也毫无逊色。他那敏捷的性格和戇直的谈锋，为自己树立了不少的敌人；但他非常虔诚，也很爱人，对拯救人灵尤其热心。有两位奉教官员(孙元化和张焘)遭仇敌诬陷禁闭监中，已定了死罪，人见汤公不惜乔装炭商入狱，为给他们听告解，在逆境中，他那英豪的忍耐更为彰显。

### 南怀仁神父

汤若望一死，中国教务好似便从此塌台；其实它已根深抵固，尚不至那样容易毁灭。它的命运有了转机，即康熙于一六六六年临朝亲政。自一六六八年开始，帝命作一连串的天象测验，以便考验杨光先与南怀仁的推算孰优孰劣。结果南怀仁大胜；于是杨氏被罚充军，南怀仁被委为钦天监监正，已被充公的汤若望财产悉数发还，汤公的一切罪名亦完全昭雪，并赐以隆重的葬仪(一六六九年)。

南怀仁在他十九年的任职中，足证他堪称为利玛窦及汤若望的适当继承人；他的学识与德性均甚卓越，足以媲美先贤，并有不少关于论学及护教的著作。康熙对他也宠遇优渥，不耻拜这位西洋教士为师，向他学习算术、天文及西方哲学。南怀仁也蓄志引他这位「天子门生」信奉圣教。皇帝虽未信教，至少因这位老师的缘故，对传教士表示了好感；外省各会会士也自称为「南怀仁的弟兄」，以便能自由传教。

然而仍有些会士，认为南怀仁在朝任职，且接受官衔，与会士身分不适宜；但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于一六八

一年，对此有益于信仰及外教归化的工作，毕致嘉许。

南怀仁对归化中国，怀有一广大的计划：他同利玛窦一样，深知为达此目的，最主要的是先邀得知识界的同情，为此须逐渐开办学校。就如耶稣会士在欧洲，以辣丁和希腊的古典文学栽培公教青年，同样在中国也当教授儒家的古典文学；为此当先由奉教的或同情的知识分子下手，崇尚中国的文化，然后薰陶渐染，使天主教的酵母渗入而发展。

这计划未能实现，一来因为时局不利，二来人材缺乏。就大体说：工作的人少，先是传布福音的一大困难；其次传教士尚未能自由进入中国；教难以前的少数人员，非死即衰。固然已有几位传教士自菲律宾来到，但他们尚不敢抛头露面，祇能在暗中活动，且常有被驱逐的危险。南怀仁也设法由欧洲号召生力军，但他认为传教的前途，全系于能否造就本地神职人员为断。无奈这种计划，同用华语施行礼仪的问题相连，又遇到了重大的困难。

### 本地神职班与以华语施行礼仪的问题

栽培本地神职人员的最自然方法，是在奉教的儿童中选拔有圣召希望的予以栽培。但按中国的旧俗，大多数的儿童都已在幼年订婚，而解散婚约为女家又是最大的耻辱；另一方面，就中国教会当时的情形来说，又很难给他们必要的陶冶，等他们经过长期的栽培后再领受铎品，实在希望甚微。因此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认为如果有独身的或丧失了配偶的成年人，已经很久度着教友的生活，且有很好的表现，大概可保证德行坚强，不至朝三暮四：那么象这样的人升他为神父他是很好吗？可是问题来啦：这样的人年岁已大，记忆力也不够灵活，还能学会很难的辣丁

文吗？神父们想：可能请求教宗，准许这样的中国神父用本国文作弥撒念日课。这在辣丁文礼教会中，是一课不平常的特恩。以前斯拉夫人有过这样的例子，不过那已是八世纪以前的事了。当金尼阁神父以中国传教士们的名义向罗马请求这事时，教宗保禄五世在一六一五年立即允准了（见 189 页）。不过这个计划还不能立即付诸实施：礼仪书还没有译成中文，随后又起了教难；何况在改朝换帝时，又到处战乱频仍，无法着手。利类思在十七世纪的耶稣会神父中，是一位最精通华文华语的，此时间他便着手挑起了这项巨大的工作，把重要的书籍译成了中文：其中有「弥撒经典」，「圣事礼典」，「司铎日课」，圣多玛斯「超性学要」的一大部分，及「司铎典要」。这件工作，耗费了他二十五年的精力（一六五四—一六七八）；书成之后，数次上书罗马（其中以南怀仁之请求尤为积极而恳挚），请求批准应用，每次均遭批驳。

教宗亚历山七世曾于一六五九年恩准赋给中国成年人铎品，即使他们对辣丁文尚不能懂悟，祇要能念，能解释弥撒的重要部分并能行圣事即可；首批的司铎们曾用过这种特恩，不过大家都明白那祇是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而已。

所以栽培将来的司铎，当从他们青年期开始。有人主张把他们送往澳门宗教的气氛中去；可惜澳门的声气在中国并不算好。那么祇有送他们到国外去栽培了；于是送到暹罗（今称泰国）的犹地亚（Ayuthia 暹罗当时的京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于一六六五年已在该处为远东各国建立了一座修院。该院曾造就了不少卓越的神父，十八世纪的李安德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能这样送往外国的修生

显然不会很多，而且都不服水土，出国的青年死亡的数字很高。

### 罗文藻主教(一六一六——一六九一)

给中国造就了第一位神父——他也成了中国第一位主教——的光荣，得归于道明会。罗文藻是福建人，生于一六一六年，因听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神父讲道而奉教领洗，以后便追随着利安公作传道士；当中国教难时，他随利安公至澳门又转往马尼拉。按照当时的习气，人家给他起了一个西班牙名字叫 Lopez，他便在马尼拉进了道明会也升了神父；以后便回到福建本乡。一六六五年西洋教士都被充军时，祇有罗神父一人能自由行动；他便到各省去鼓励教友，且在三年教难期间授洗了五千成年人。他的名声传到了罗马；教宗格来孟十世便决定升他为主教，罗神父谦辞；但教宗意诺增爵十一世又表明了圣座的意旨，他终于一六八五年领受了祝圣礼，圣主教后仍在江南一带继续传教工作，给圣教会出了大力。他为人虔诚谦虚，且对传教很热心，不过所受的教育程度似乎稍低一点儿，为此常有一位神学较深的神父辅佐他尽职。圣座授权主教随意指定继承人；可惜他没有选择中国人而指定了一名意大利人，继承他为主教。

### 巴录主教至中国

巴录 (Msgr. Pallu) 是在罗马推动祝圣中国主教者的一人，也是圣座最初所建立的三位宗座代牧中之一。(想读者还记得那三位宗座代牧所负的首要使命，就是在传教区努力建设本地神职班。) 罗主教接受祝圣礼的前一年(一六八四)，巴录主教在福建厦门登陆。二十多年以来，他便为了拥护圣座的权利，并为了传扬圣教，在全球各处奔

走，他已精疲力尽，因此抵达中国后不多几月便去世。死前指定他旅行的同伴颜珰 (Charles Maigrot M. E. P.) 为继承人。

### 法国耶稣会士来华

南怀仁为建立中文礼仪虽未成功，但为号召欧洲的同会弟兄来华则很成功。最大的一批来自法国。法王路易十四世，深以能自费派遣传教士到远东发展科学和裨益传教为荣。为此选派了六名对科学造诣很深的耶稣会士；他们随同法王派往暹罗 (今泰国) 的使节一齐启程；其中五位由泰国继续航行，于一六八七年抵达宁波。礼部当时拟驱逐他们出境，但因南怀仁之请，皇帝谕令保留，命他们去北京。这批人马的来到，为南怀仁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可惜他未能享到亲自迎接他们的欢乐，因为他们到达北京时，他已于十日前去世。

新来的是修养很深的人，甚得康熙的宠眷，其中二人即张诚 (Fr. Gerbillon) 和白晋 (Fr. Bouvet)，被皇帝留于宫廷备用，其他准许任居国内何处。不久当中国与俄人订尼布楚 (Nertchinsk) 条约时，皇帝派遣张诚与葡籍耶稣会士徐日升 (Fr. Pereira) 随使节前往，充任通译；幸赖张诚之从中斡旋，和约乃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缔结。皇帝为酬劳教士，乃于一六九二年公布第一道准许自由信教上谕：从此人民皆能随意信教，一切传教士亦皆能在国内任何地域布教了。次年康熙患病，医药罔效；传教士乃进献奎宁丸，不数日热度尽退，疟疾霍然；皇帝为酬劳治愈之功，乃在皇城内赐地建堂。以后又派遣白晋神父赴法广征教士前来。康熙且继续向耶稣会士研究科学，并使其皇子数人与满洲官吏等也从西人研究学问。

## 十七世纪末叶教会在中国的情形

十七世纪末叶，传教士在中国努力了一世纪的成绩总结如何？此时有三个主教区，即澳门南京及北京。这期间常是葡国以保教权的名义推荐人选，但教宗却保留着任命宗座代牧的权利；至一六九六年已有五位宗座代牧。一七〇一年有一三〇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五九位耶稣会士，二九位方济各会士，十八位道明会士，十五位在俗神父，九位奥斯定会士。教友的数目没有确实的统计；大概有三十万上下。确实的情形则是平民百姓信奉者居多；利玛窦所持归化中国要自知识界开始的大计划，终于未能实现。就大多数来讲，文人学士总算尚未接受福音。一七〇三年某位传教士曾写道：「国家的文武大员：对天主教都重视，他们认为它是最圣善最符合理智的宗教；他们对传教士也表示尊敬，和他们保持着友谊，喜欢听讲道德的原则，有时也加以赞美称羨；但一提到放弃迷信皈依真教，则掉头不听了。贪求世福和害怕有损自己身分的心情，阻碍圣宠完成它的工作。」<sup>⑥</sup>

天主教在中国获得暂时的稳定，完全是因为皇帝重视北京教士们的科学知识。官宪知道皇帝保护西洋教士，这便足以保证各省传教士的自由；如果皇帝的宠眷一旦撤消，一切传教的事业立即便要遭受危险。可惜「礼仪之争」触恼了皇帝，而且对文人学士的皈依无异掘了一道不能逾越的鸿沟。

## 叁 礼仪之争

礼仪的问题，不但在中国，连在传教士所面临一切古老和高尚文化的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越南等都曾发

生过。问题在中国所引起的纷争，是由于用以指真神的各种名称，及敬祖和敬孔的礼节而来。现在我们当把这些问题合并一起来说明。

据赞成人的意见，这些祇是孝道的传统和尊重的表示。一反对派却说：决非如此，因为中国人敬拜祖宗的牌位，视为祖宗的灵魂亲在位置(灵位)。一赞成者反驳说：列位错了；中国学者向我们说，这些礼仪并没有宗教的价值。一反对者答说：请你们来看我们所询问的乡民渔夫和一般百姓，你们便可以明了他们的宗教生活，正是在这些礼节上。耶稣会的赞成者说：你若想了解礼仪的真谛，应当追溯它的起源。请你研究一下古籍，你便会发现在古时这些礼仪一点儿宗教的价值也没有；再进一步研究，你便晓得在古人的宗教意识中：有最初启示的微弱反映。请你根据他们自己的典籍向学者们解释这一层，把历代所加上的迷信除去，你便晓得了他们确是最易接受福音的。虽然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对敬礼圣人和他们的遗骸也搀上了迷信的色彩，可是教会曾为此禁止敬礼了吗？反之，不是祇努力恢复这种敬礼的本来面目吗？

不承认那些礼节真有宗教意义的，特别是那些如同利玛窦在中国和诺比里(de Nobili)在印度一样的传教士，他们首先所注意归化的是知识分子；深信那些为人师表的一奉教，其他的民众势必要闻风向化。主要的特别是耶稣会士，但在其他的修会中也有赞成中国礼仪的，耶稣会士中也有持反对意见的。

争论起于礼仪，实际上却牵涉得很远；双方所对立的其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拥护的一方面，是把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都尽量使它基督化，这就是所谓适应的方式，

历代的教宗早已说明而谆嘱予以利用；反对的人呢，强调皈依就是与以前的生活绝缘，生活的全部更新。⑦

### 争论的开始

上边我们曾见西班牙道明会士黎玉范于一六三一年由菲律宾登陆中国时，便对某些耶稣会士的作风看不顺眼，马上向圣座参了一本。他把他认为耶稣会士作风的情形描述了一遍，然后问罗马那是否可以准许？传信部于一六四五年答复：按照黎玉范所描写的，敬拜孔子与祖先的礼节应予以禁止。

然而被控告的耶稣会士不承认他们的作风象黎玉范所描写的那样，于是便遣卫匡国神父 (Fr. Martini) 赴罗马说明他们的作风，请求圣座裁夺。这次圣职部于一六五六年所给的答复是：按照所说敬孔与敬祖之礼，既然祇是社会的礼俗，并无宗教的色彩，理合准予实行。

以上两种答复，许多人认为彼此矛盾。三年之后，道明会士包朗高 (Juan Polanco) 向传信部请示：以上两种部令，是否后者已将前者取消作废？圣部答称：「两项部令均属有效，各应按照所陈的意义遵守。」这无异是说：如果所说的礼仪，事实上的确有黎玉范所述的宗教性质，则禁止实行；反之，如果系耶稣会士所说纯属社会礼俗的性质，则准予实行。实际上，对究竟有否迷信的问题，圣职部不愿裁判。

### 广州的讨论会

那么，祇好传教士们就地审断了。实际上各修会的神父们也正希望彼此讨论一番，好能达到行动的一致。一六六五年杨光先的仇教，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被官方押解广州的传教士有二十三位之多，监押在一处有五年之

久：其中三位道明会士，一位方济各会士，其他均属耶稣会士。他们讨论了四十天，终于一六六八年全体通过一种包括四十二款的结论，全体签名。耶稣会士请求他们的视察员批准。视察员当时在澳门，从未进入中国国境，他把其中两款的词句加以修改，道明会的长上纳瓦莱神父 (Fr. Navarette) 认为被欺，撤消签署；且潜离广州，乘船至西班牙，又转赴罗马。他于一六七六年出版了他那「中国历史及宗教风俗概论」的上册，后三年又出版该书的下册；这本书便成了反对派汲取论证的来源。这位纳瓦莱以后作了圣多明各 (Santo Domingo) 的总主教，且对耶稣会士很信赖，并邀请他们到他的教区去帮忙工作。

这样一来，便天下多事了：至今祇限于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从此便蔓延于神学家之间，又推而至于知识界，越传越广，成了到处争辩的话题；几乎一世纪之久，在欧洲的舆论间常热烈的争辩着。拥议或反对「中国礼仪」的通讯、书籍，传播极广，问题越来越复杂。好的结果是使欧洲对中国和传教问题都发生了兴趣；但坏的结果却是更大，因为当时欧洲杨森主义和寂静运动正闹得天翻地复，杨森派等本来就是耶稣会的死敌，这样一来，他们更有借口，更加攻击耶稣会士为「道德松懈」的实据了。

### 颜瑯主教的命令

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颜瑯 (Charles Maigrot 即巴录主教临死时所指派的代理人)，这时已任福建宗座代牧，又招来圣座新的禁令。原来他在一六九三年曾给他教区的传教士们下过一道命令：严禁用「天」和「上帝」的称呼，以及敬孔敬祖之礼；对耶稣会士的解释拒绝接受。他把这道命令送呈罗马，请求对问题来一次决定性的审察。

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孔子及祖先的敬礼编辑了一个备忘录，请求康熙皇帝正式声明它的真实意义。康熙乃于一七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批示：敬祖敬孔纯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的迷信。耶稣会士认为争论已决，遂将这些文件寄呈罗马。但圣职部的枢机们认为在有关信条的事上，神学家比中国皇帝更具权威。

圣职部的批示于一七〇四年始到达，不愿裁定中国古籍意义的争论，也不愿驳斥在如此困难的问题上与耶稣会士坚持异议的传教士。「天主」一词准予应用，「天」和「上帝」二词深恐外教人误解，以为奉教人所敬的神祇是物质的天或其中所含的能力，故不准再用；以故堂中所悬康熙御笔所书的「敬天」匾额，应当取缔。教友可保留祖宗的牌位，但上面祇准书写祖宗的名字，不得有「灵位」字样；不得在牌位或坟墓前上供，也不得参加敬孔的礼节，因为在目下的环境中很难避免迷信：圣部愿「远避迷信的一切色彩，及一切嫌疑。」

欲执行这样的命令，就得使中国的教务完全改头换面，罗马并且认为欲保持信仰的纯洁，非如此不可；这可真不容易！中国大部分的教友须要改变他们直到现在认为无可非议的生活习惯，且需要与本国所尊崇的传统断绝关系；这样一来，可能遭受窘迫，甚至财产性命都有危险。

### 铎罗的使节⑧

教宗格来孟十一世已预料这些困难，于是在正式宣布此决议案以前，决定派遣使节至远东，使人明了圣座的意旨，并就地解决传教士间对礼仪的纷争。

对这种微妙的任务，教宗特选了一位他的亲信铎罗蒙席 (Carlo Maillard de Tournon)；在出使之前，先祝圣他

为主教，且锡以安提约基亚宗主教的名衔。他是意大利杜林人(Torino)，父为侯爵，且曾任尼斯省(Nice)总督；为人博学多才，热心出众；但性躁易怒，健康欠佳，为这样一个需要能屈能伸的任务，可说非适当的人选。

他先在印度停留了几个月，以便料理一种和中国类似的问题，然后到达澳门，再转广州，而于一七〇五年十二月四日抵达北京。康熙初次接见，礼仪隆重，态度和蔼。但一听说铎罗特使来华的目的之一，是禁止教友遵守中国礼俗，遂改变了态度。铎罗特使以颜珰为顾问；此人晋谒康熙时，康熙面询他研究中国何等经典？他连中国字都不识，康熙因此大怒，说他既不识字，何以竟敢妄论中国礼俗。最后皇帝将铎罗送至南京，驱逐颜珰及使团内的数位神父出境，并谕令凡愿遵守利玛窦的成规而终身留居中国者须领「票」，又派遣两名耶稣会士至罗马，向教宗说明为什么皇帝反对取消敬孔敬祖的礼仪。

铎罗到了南京，认为圣职部一七〇四年的决议案已是公布的时候了，于是给传教士们发了一封公函，指示对皇帝的质询应持的态度。康熙一晓得了这项决议，认为对自己是一种侮辱，立即命令把他禁闭于澳门，直到皇帝所派遣赴罗马的神父回来才准离去。但出使的人永远不会回来了，因为他们在到达欧洲之前，已因复舟葬身海底；次年所派遣的两位神父也无返回之望，因他们都在回程中患病死了。⑨

铎罗在澳门又遭葡国当局的敌视，不承认他为教宗的特使，因此被拘禁起来，不得和外间自由来往；倘他稍事退让，便可恢复自由，但他毅然不屈。卒因病魔缠身和出使的失败，于一七一〇年逝世于澳门。

然而有些传教士相信可以请求「永居票」，并上书教宗控诉铎罗的南京公函；教宗格来孟十一世却批准了特使的公函，并于一七一五年三月十九日公布「从登极之日」(*Ex illa die*) 诏谕，命令所有传教士一体遵照，否则遭受绝罚。面对着教宗这样清晰的意旨，众位传教士皆俯首听命，毫无例外，不过想使教友改变习惯，则奈难办到；同时外教人也对教友煽起了仇恨，康熙已往本来对教友很好，此时对他们所遭遇的迫害也不愿反对了。

### 嘉乐的出使⑩

教宗格来孟十一世为挽救时局，乃有二次遣使之意。这次遴选了一位精明的外交家，意人嘉乐 (Carlo Mezzabarba)，先升他为亚历山城宗主教；他虽手腕圆滑，不象铎罗那样躁急，但也未能获得更幸运的结果。他于一七二〇年十月十二日抵达广州。康熙在接见他以前，先欲明了他出使的目的，他承认是来劝教友遵守罗马对中国礼仪所作的决定。皇帝答以「既然如此，天主教在中国行不通，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嘉乐特使教人明了，他虽无权废止教宗的诏谕，但能酌量减轻。于是便拟了八项准许呈上，康熙略显和缓，始准接见，前后召见了十三次。他见无法转变康熙的态度，乃请准回罗马，报告教宗定夺。临行前在澳门发表了一封公函，分致各传教士，言明本人无权更动教宗诏谕的一文一字，祇能予以八项解释，即前面所提的八项准许。今照录如下：

- 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祇许写先考先妣的姓名，两傍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 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是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
- 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灵位等字样，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 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的棺材前叩头。
- 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 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的棺柩前供陈果蔬；但应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
- 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
- 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但俱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

嘉乐的出使，并未能比铎罗的出使，给中国教友获致更大的平安。按照八项准许，敬孔与敬祖的礼节，如果非宗教性而祇是社会性的，准予实行；但并未解决一世纪以来所争论的问题，即此等礼仪究竟是纯社会性的，抑搀杂了流俗迷信。何况准许的采用也是随意的，传教士并未能行动一致。

### 争论的终点「自上主圣意」诏谕(一七四二年)

为理清这团乱麻，罗马圣座于一七三五年决定彻底研究问题，审查了七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卒于一七四二年发布了「自上主圣意」诏谕(*Ex quo*)，重新确认「自登极之日」诏谕，并将嘉乐特使的八项准许废除。

这是数位教宗，在问题深长的研究之后所作的结论：他们声明照当时所行的敬孔敬祖之礼，不能没有迷信；或许在开始时，那些礼节的本身，祇是社会性的，就如耶稣会士依据学者们的证明所想的，罗马座圣起初不愿把问题

廓清。但实行它们的人民逐渐加上了宗教的意义，皇帝的正式声明并不足以改变人民的思想。必须先把人民错谬的思想廓清，圣教会才能准许新教友实行；这却需要长时期的演变呢。①

这项禁令，给中国教友招致了最困难的牺牲：这样一来，谁也不能希望进考场得功名了，仕进之门给教友关闭了，财产名誉自然也受到莫大的损失，因为这都需要拜孔啊！教会当局却认为为保持信德的纯洁，这些牺牲是必要的。

## 肆 十八世纪中国传教的情形—— 一个教难的世纪

自铎罗出使以后，以前对天主教的优待便大为减低：从此祇有由皇帝领到「永居票」的传教士才准居留传教，也祇有应许遵循利玛窦的成规的人才肯发给「票」。一七一七年已有四十七位传教士领得了这种票。

康熙于一七二二年驾崩，雍正继位（一七二三—一七三六），情势愈益严重。雍正一朝，对教友总没有象康熙那样和善优容过。福建福安知县上书闽浙总督满宝，告发教士建堂，满宝下令禁止传教，封闭教堂。他还呈请皇帝批准这项命令，雍正次年批准（一七二四），且将它推行全国，将几位认为于科学工作有用的神父送至北京，其余驱至广州；一七三二年且驱至澳门。此后除与朝廷供职的教士有友谊者外，任何教士不得居留中国；有敢偷渡或潜藏者，一经查出，非发配即处死。

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六）即位后，对教友尚无恶感，仍用耶稣会士在朝供职，在他在位六十年间，始终未

衰，传教事业也未被干扰。看来教会的情形，与罗马帝国在第二世纪的情形有些类似：教会的敬礼和福音的宣传所以遭反对，纯粹是因为它与社会的习俗格格不入；迫害的威胁常在教友头上悬着，法律的施行与否则在地方上的官吏；如果贿赂充足，他们便闭上眼睛，佯为不知，有的便否认地方上有教友，有的把拘留的教士放开，以节省解送北京的经费。反之，有时长期平静之后，忽然在某些省分又兴起了剧烈的教难。就如一七四七年，道明会的桑主教 (Msgr. Sanz) 在福建被捕而斩首，其他一同被捕的道明会士则于次年论绞；同年也有两位耶稣会士及两位中国传道员在苏州受绞刑而死。

最普遍和最严重的教难，是自一七八四年至一七八五年。方济各会士被派遣来代替耶稣会士忽遭逮捕，是引起教难的机缘；在广州搜查时发现了载有当时传教士名单的文件，于是被捕的有十九位欧籍神父，和七位华籍神父，背教的教友人数未提。被捕的教士全数递解至京。欧籍教士判处终身监禁，次年邀得释放，但六位已死于狱中。中国神父被黥面发配边疆。皇帝也出了严禁一切宗教活动的上谕。经过了这一次教难，中国的教会完全瓦解了。

### 北京的传教士

虽然不断有禁教的谕令，但清帝为了他们的技术，却仍留西洋教士在朝中供职。一七〇八年康熙曾委任耶稣会士绘制全国地图。为完成这项工作，他们的足迹十年之中踏遍了全国各省。这为他们倒是一个慰问教友，和鼓励他们忍受患难的机会。⑫

领导这件工作的是巴多明神父 (Fr. Dominique Parenin 一六六五—一七四一)，法国人，一六九八年来

中国，是当时在中国最著名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华语华文，能说能写，比当时的任何欧人都好，且对满州语更象本国语说得那样流利。康熙对他倍加宠眷，二十年之久，每次出巡必带他同行。嗣后雍正也曾召集汉满子弟多人从他学习当时欧洲国际间通用之辣丁文，以储备外交人材。他虽未能制止教难，但他以德以学对皇帝之影响，得保中国教务，不至全部消灭。

除领导钦天监外，耶稣会的神父和修士得在宫廷中，随皇帝的兴趣，从事所派遣的一切工作：如建筑宫殿园囿及喷泉，修理钟表乐器，制造傀儡木偶（如自动的狮虎）等。擅长绘画的应装修宫殿，绘制宫廷的人象，或描写狩猎和战争的图画（如御征新疆图）。⑬

这些修士从事这种工作，无异宫廷中的「囚虏」，工作紧张而吃力，与传教并无直接关系；他们所以肯接受的原因，乃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是保障传教士在中国居留的一种方法，至少在北京的教会能享自由，外省也可获得些优容。当教宗解散耶稣会时，遣使会士继承了他们的工作。

### 外省の教团

在北京及其附近的神父们仍能自由传教；在外省则不然。一七七五年全中国不过八十三位神父：外籍四十九，国籍三十四。他们如何能填补被驱逐的教士所留下的那些空缺？外籍神父祇有赖于偷渡了。栽培本地神职人员也感困难重重；在中国开办修道院似乎在当时是办不到的；有几位神父是在北京和澳门培植的；有时也利用前世纪所给的特许，祝圣不懂辣丁文的成年人为神父，祇要他们对神学的知识足够应用便成。也有些青年被送至国外去完成学

业：有到暹罗(泰国)的犹地亚京的，那里有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为远东传教区所立的一座修道院<sup>⑭</sup>，有送至纳坡里或巴黎的。

教友和传教士们都非常谨慎，稍不经心，便可引起教难。神父们都是在私人住宅行圣事作弥撒。教友都是些平民百姓：例如木匠、农民和渔夫；为便利传教工作，并为减低背教的危险，神父们试图把他们组成与外教人隔离的独立村庄；神父视察教友的次数也很少，没有定时，而且常是偷偷的。神父到一处，却是异常忙碌：训练望教的。给他们授洗，教训教友，举行婚配，听告解，与传道员(华北多称会长，即教团的领袖人物)长谈，讨论应行事宜，调解争端及家庭间的不睦；此外还当训练代替神父继续活动的人员。为最后一项，往往在一孤立的村庄，甚至在船上，暗地进行。

在这种情形下的教会，除了少数的例外，很难添新教友；这是一种防卫战，散在后方各据点苟延着残喘，祇赖少数偷渡的神父们维持。既然无法编入这个混乱时期的中国传教历史，我们祇把这些在千难万险中挣扎的英勇传教士中的几位描述一下，以概其余便了；赖他们支撑着中国教务的残局，期待着光明。

### 李 安 德

我们先说一位国籍神父李安德(一六九二—一七七四)；他生于陕西汉中一个明朝末年的老教友家庭，被送至暹罗犹地亚修道院完成了他的学业；一七二七年晋升铎品后，便派往四川。一七四六年的教难迫使外籍教士到澳门避难时，他一人四川支撑了多年，除了依恃天主以外别无办法。他在长上敦促之下写日记，持续了十八年之

久：用的是流利的辣丁文，记述了他的工作，他所遭受的种种危险，和他两次坐监的情形。他支撑着四川的教务垂三十年；不祇在那危机四伏的年限中维持现状，还能尽力使它发展。一七六四年有人建议他为主教，但他年已七十二岁，不能担此重任了。范依圣又名博四爷 (Msgr. Pottier M. E. P.) 于一七五六年来华，成了他的朋友，范氏不久便被祝圣为主教。李安德将他的末年献身于栽培有志作神父的青年。他把七八位青年召集在成都附近荒山的一座茅屋里教授，名之为「圣诞修道院」，意即仿佛白冷之马栈也。

### 玛尔定·慕雅

李安德去世前三年，玛尔定·慕雅 (Jean Martin Moye) 来四川传教，他是一位具有不平凡的谦逊和刻苦精神的法籍神父。他进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前，曾在本国尽司铎的职务十七年之久，并为教育儿童创建了「主顾姊妹会」，现已发展至全球各地。他来中国时已四十三岁，他具有语言的天才，到达后数月，便委他管理一个庞大的教区，包括四川东部和云南贵州。第一年便被捕下狱，受刑几乎丧生。以后他在中国十年的岁月中，积极传教，不惧危险，救灵心切，他常想些新计划新花样传教；他所从事的种种尝试，影响颇大。

他到中国后，发现夭折的婴儿甚多，尤其在荒年，甚觉痛心；他努力救活的不少，如果不能救他们肉体的性命时，至少给他们付洗。他真堪称为「圣婴善业」的前驱。

此时女子的教育完全谈不到，读书是男子的专利品；因此女子能阅读教会书籍的真是凤毛麟角。慕神父既曾在法国创立了教育女子的修会，在中国他也要照样做；这是

前所未闻的。其时有许多奉教的女子宁愿守贞不嫁，不过她们祇是度一种祈祷补赎的生活而已；习俗反对女子从事外间的活动。慕神父不怕排除众议，用奉教的贞女们教授教义，不但教幼小的女童，也教成年的妇女。起始不免有人说长道短，但女子往往比男人更热心，对教会帮助很大，这种作风已逐渐推行到全中国。

当时教会的书籍都是用文言写的，一般教友很难了解；于是慕神父用浅显的文词编译了些经文，且设法印行传播。那些经文很美，中国许多地方至今尚在通用。

慕神父刚到四川时，该省国籍神父很少，他认为派送修道生到国外去诸多不便。他也和李安德一样，不顾一切困难，决心让他们在中国受栽培；为实行这个计划，他召集了不少的青年。他虽没把这个事业办成，但有外方传教会的同会弟兄们以后重拾旧业：他们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处成立了一座修道院；如果这省有教难，便逃到那省去。在三十二年的期间，这座修道院陶成了二十七位国籍神父。

最后慕神父心力交瘁，于一七八三年返回欧洲休养；一七九二年在照顾患疫的病人时被传染而死。他于一九五四年被教宗比约十二世列入真福品。

### 南怀仁主教（一七〇七—一七八七）<sup>⑮</sup>

当耶稣会于一七七三年被解散时，在中国最著名的耶稣会士是南怀仁主教（又名莪德 Msgr. Gottfried von Laimbeckhoven）。他出生于奥地利的维耶纳城一家望族，一七三八年到澳门，不久便开始了他那四十九年继续不断的各处奔走传教的生涯，走遍了湖北、湖南及河南三省；为了害怕外教人反对，他常在夜间活动。教友们齐集

在一位教友领袖家，讲道以后听告解，黎明时作弥撒，天明便回到船上去他往。他一年之中旅行十一个月，八个月在水上，三个月在山上，他曾写道：「教友争先供给我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对自己司牧的感情与尊重，是我称颂不尽的。」

他过了四年这样的生活，便感觉筋疲力尽了，关心他健康的上司，想把他派往北京担任钦天监的职务，但他恳求他们让他死在他的新教友们中间；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又继续了四十四年这种奔走劳碌的生活。

一七五二年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因为他已被任为南京主教，但三年后始得在澳门接受祝圣典礼。随后他便设法返回他的教区去鼓励遭难的教友，因为当时有五位传教士及教友多人刚刚被捕下狱。他曾写道：「这个教会遭受了最剧烈的教难旋风的蹂躏；牧人被打击羊群逃散。侥幸逃避了前此教难的，而今也被扫荡一空。自我返抵教区以来，我用尽了各种方法试图安慰教友，用我的访问稍微平息他们的焦虑不安，把那些因受刑不过而叛教重返迷信的再领回来。可惜！白辛苦一场！为了恐怖，人们已不敢在他们家中收留我了，在这样辽阔的省分，我竟连一家都找不到，使我可以在那里略事休息。两年以来，除了逃亡以外无法休息；我祇等待天主把我召回到祂那里去了。」

嗣后又加给了他一种新的职务：代理北京教区的教务。一七七五年，正当另一次教难迫使他在在一间茅屋躲藏时，他获知耶稣会已被教宗解散。为一位全心热爱他的修会的人，真是一个特别难堪的打击，何况他还应该以主教的名义，服从教会，亲自去正式宣告「自己母亲的死刑！」

然而任何灾难也不能把这位老人打倒：他在古稀之

年，且又多病，人还见他穿着一件粗布短衫，被警察追踪缉捕，他疲乏已极，日夜受蚊虫的骚扰，仍是不停地东奔西跑；人见他坐在船上，神出鬼没到处讲道，祈祷、安慰信友。一日他为混入苏州城而不被发现，竟乔装一名抬轿夫。

他那些同会的老弟兄们都已相继去世，一七八五年只剩了他一人同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神父，在江南一带照顾着残余的三万多教友。他这位热诚的同伴，先他而离去了尘世。最后他感觉终期已近，便退居到松江附近的一个小堂口去，在那里安逝于主；给他送终的是一位老耶稣会士姚神父。

亘一世纪之久，维持中国教会生命的，就是这样的人物。教友的数目无疑已大减：由十八世纪之初的三十万左右，已减去了半数，或者更多。<sup>16</sup>但这些仅存的硕果，在教会重获自由时，还要继续蕃殖。

### 高丽开教

中国的保护国高丽(今韩国)，在清朝和中国一样，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禁止外人插足。十七世纪时，传教士曾多次试图进入传教，均归失败。信德的种子还是由中国传入高丽的。

高丽每年遣使到北京进贡，并领受历书。高丽的使臣因以得识北京的耶稣会士，并由他们获得了天主教的书籍；有几位学者由这些书籍得识天主教的真理；其中一位姓李的于一七八四年随使节来北京，曾在北京受洗，洗名伯多禄。他返回本国后，曾劝多人进教。不料刚产生不久的教会便受到了迫害，曾有多人殉教致命。新教友祇靠书籍的帮助深感不便，于是便向北京主教请示；主教回信指

示办法，并许派遣司铎至高丽传教。

直到一七九五年始有一位中国神父周文谟(雅各)进入高丽；他发现已有四千信友；经过了七年的英勇传教后，信友人数已达一万。在一八〇一年的教难中，周神父和三百名教友英勇致命殉教。自此直到一八三四年，高丽的教会在缺乏神父的状态下继续生存。

这支无传教士的媒介，而由中国教会所产生的新枝，恐怕是天主教传教史上惟一的例子。

## 结 论

在中世纪末叶近代行将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圣教会所应战胜的危机，恐怕是自第四世纪亚略异端以来最严重可怕的了，尤其是因来自教会的内部，所以更加严重。这种危机，肇端于西方的大分裂，教友不慎，染上了自由思想和异教古代伦理学家的风气；又因当时道德水准低落，甚至波及到教宗宫廷的内部。及至马丁路得起而反抗天主教传统的道理时，遂致人欲横流，一发不可收拾；在社会的扰攘中，北欧大部的民族都脱离了罗马。然而建筑在教宗这座磐石上的教会，在信仰上是不会动摇的。她在特利腾公会议中，庄严而勇敢地，面临着全世界自行检讨；众位主教在教宗代表的主持之下，再次论断了教义，立定了法规。于是在忠实于天主教的国家内，展开了革新的工作。虽说在一切努力之后仍存在着些弊端，但最大多数和最严重的弊端却已绝迹。由于实行特利腾会议的决议而复兴和刷新的教会，仍在普世继续她那圣化人灵的工作。

她的活动并不限于老教友的国家，传教的精神，自圣方济各·沙勿略以来常生气勃勃；十六世纪的新地发现，给她展开了新的活动园地。传教士跟在发现者之后，有时

甚至走在他们前面，给新民族带去了福音；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期间，中美、南美和菲律宾群岛都投入了圣教会的怀抱。在亚洲，福音由圣方济各·沙勿略，自印度一直传到日本；利玛窦叩开了中国的门户，甚至进入北京宫廷，陆德神父更在安南创建了教会。罗马圣座在一六二二年建立了传信部，把指挥远方传教之权收回，更给了它新的推动。

天主教在十七世纪更新之后，对全世界的影响力，无疑在十八世纪有些衰退。新的异端邪说：杨森主义、寂静运动激起了无尽无休的争辩，吞噬了她与信仰的仇敌搏斗所需要的毅力；问题已不在教义的某点某端，乃是信仰基础的本身。以前藏头隐面的不可知论，和唯理论现在却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深深地印入了西方知识界的脑筋；除了人的理智所显然能理解的以外，他们都承认，一切启示的宗教都在抛弃之列。

在这十八世纪的末叶，教会的命运好象大受打击：知识界的所谓优秀分子都跟着弗尔泰、卢骚以及百科全书派远离了教会；教宗的声威也大打折扣。奉教的君主，以保护教会为借口，实际上是利用教会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甚至压迫教宗，硬教他解散两世纪以来最支持圣座的修会。

传教区的前途也不甚乐观：传教的兴奋，在十六十七两世纪是那样突飞猛进，现在无疑地也大为降低。西方修会的精神衰颓，传教的圣召也随之降低，东方又起了不幸的礼仪之争……而耶稣会的解散实为其主要的原因。

在这十八世纪将终的时期，一切都预示着为教会将有更艰难的时期。危机忽于一七八九年爆发，那就是法国大

革命；它推翻了君主政体，取消了贵族和神职界的特权。教会的制度，既从许多世纪以来便与社会的秩序紧相联系，那么教会的本身不是也要从此颠覆吗？她既已大见削弱，反对者也预言了她的末日已近，她还有抵抗这种风暴的能力吗？然而再次证实了基督的许诺：「恶势力决不能战胜她」。最堪惊奇的恐怕是她经过了这些考验之后，物质方面固然是贫穷寒酸了，但把她同政权连系在一起的锁炼却被打断了，从此她更能自由自在地全力从事超性的职务，拯救人灵；她的领袖的威望更要不停地继长增高，教会在他的领导之下，也要重新开始加强整顿内部和征服世界的伟大事业。

注解：

- ① 当时还没有中国神父，但可利用这个准许先将日课和弥撒经本译成中文。这种工作，半世纪后始由利类思神父 (Fr. Buglio) 完成；但以前既未实行，便又向圣座请求追认该项准许；无奈未蒙允准。(参阅下面南怀仁条)
- ② 金尼阁在旅途中，将利玛窦在北京所写的回忆录译成了辣丁文；以后又被人译成欧洲各国文字，曾一度重版。
- ③ 李之藻和当时的耶稣会士，谁也没有想到「景教」其实就是天主教的别支聂斯多略派，因为当时无论欧洲亚洲，都把聂斯多略派中世纪在亚洲盛行的历史，忘之九霄云外了。
- ④ 教宗自一六〇〇年，便准各修会派遣会士至中国传教。那时圣座让各修会会士在同一地区工作，以后发现这种措施诸多不便，传信部便将传教区分为若干地域，将每一地域委任给一指定的修会。此法延至今日，仍在实行。
- ⑤ 请参阅罗光主教所著之「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六十二页。
- ⑥ 这是耶稣会士卫方济 (Fr. Francis Noël S. J.) 致耶稣会总长信中的词句。
- ⑦ 彻底说，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灭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
- ⑧ 罗光主教译为「多罗」，但肃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及方豪神父的「中西交通史」都作铎罗；本书从众。  
罗光主教所著「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 ⑨ 由此可见这种不幸的争论所以延长这些年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距离罗马太远。在我们这交通便利的时代看来，由中国到欧洲的行程往往需要两年，有时还更久，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如果中国向罗马有所请示，四五年后才能得到答复，有时甚至六七年，还得传信人不死于中途。由此可以明白，当传教士遇到困难，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所作的

决定，以后竟遭罗马驳斥，是多么难堪了！

- ⑩参阅罗 光主教所著：「教廷与中国使节史」一五一页。
- ⑪这种演变终于在二十世纪达成。因此圣座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将十八世的教宗们所出的禁令取消。这种解决礼仪问题的步骤，与前教宗的禁止并无抵触：因为它证明「数世纪以来，习俗和思想都大有改变」；它的结论也很逻辑：因教育与学术的进步，以前禁止的礼仪，今日在舆论中已丧失以前所含的迷信，故此已无再行禁止的必要。
- ⑫参加测量绘制地图者有下列诸人：雷孝思 (J.B. Regis)，杜德美 (Pierre Jartoux)，费隐字存诚 (Fridelli)，白晋 (Joachim Bouvet)，冯秉正 (J.M.A. de Mailla)，德玛诺 (Roman Hinderer) 及山遥瞻 (Bonjour)。
- ⑬最著明的画家是王致诚 (又名巴德尼 Denis Attiret) 及郎世宁 (Castiglione) 二位修士，他们的作品，有多帧现珍藏台湾故宫博物馆中。
- ⑭这座修道院以后迁至印度旁地治利 (Pondichery 在印度半岛南端东岸)，一八〇五年又迁至马来亚槟榔屿 (即檳城)，至今犹存。
- ⑮慎毋将这位南怀仁与其他两位同名同姓的著名传教士相混：最早的一位是曾作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S.J. 一六五三——一六八八)；另一位是圣母无玷圣心会的创立人南怀仁 (Theophile Verbist 一八二三——一八六八)。
- ⑯根据一七六五年传信部秘书波尔日亚主教 (Msgr Borgia) 的报告，当时中国教友的数目是十一万五千。

# 天主教史

(卷二)

◀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

编著者：穆启蒙

译者：光启出版社

出版者：生命意义出版社

通讯处：香港西营盘

邮政信箱50384号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